野百合花丛书

我这个狭隘的中国人的想法，从另一方面，即从世界史
的角度来衡量，也许并不算是狭隘的。
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个大文明
系统中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
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
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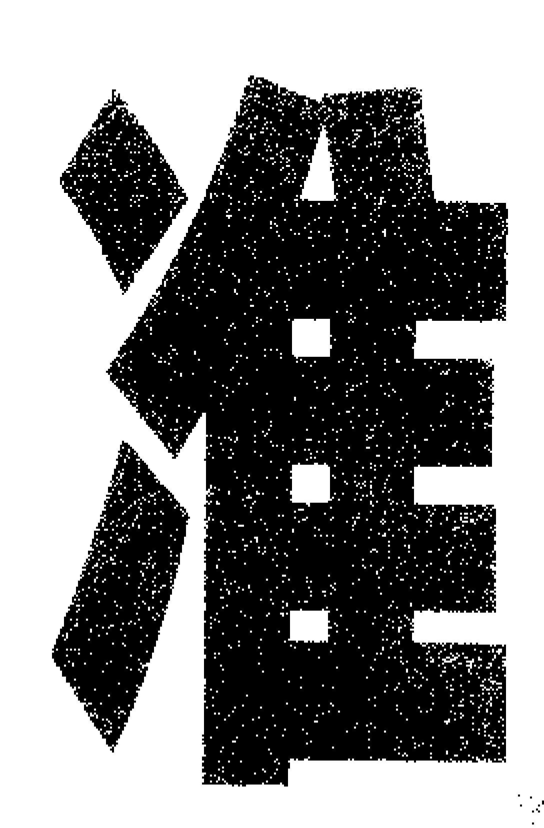
顾准

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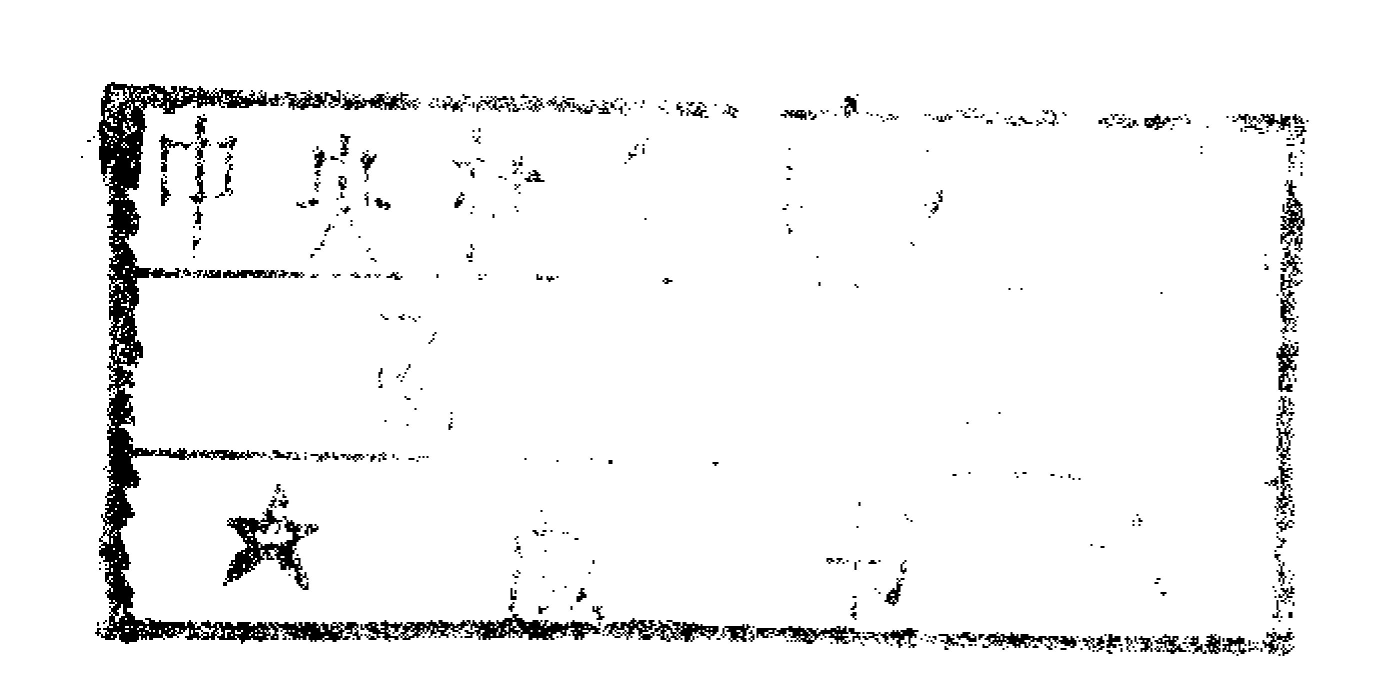
顾



准

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罗银胜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

(野百合花丛书)

ISBN 7-5006-3348-3

Ⅰ.顾… Ⅱ.罗… Ⅲ.①顾准-生平事迹②顾准-文集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71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25 印张 3 插页 205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16.60 元



顾　准

目　录

顾准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

罗银胜

《顾准文集》[1]、《顾准日记》[2]已经相继问世，深受国内思想界、知识界、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顾准同志在建国以后，长期身处逆境，“三反”中被错误撤去上海市首任财政局局长之职，后来又两次错划为“右派”分子。但他不顾横逆，究竟探索，充满睿知，对中外政治、哲学、历史、经济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对真理不懈追求的那种“普罗米修斯”精神，令人敬仰。

作为我国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理论研究、会计审计研究、税务理论研究、中外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著述颇富，且长期湮没无闻，本书力图经过剔抉梳理，希望在《顾准文集》、《顾准日记》之外，将两书未曾收录的顾准一些佚文遗稿，完璧成章，蔚为一体。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比较全面、简捷地反映顾准学术思想的文选。

顾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现代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著名的思想家，我国财经战线上的卓越领导干部。字哲云，又名绛枫、吴绛枫、立达、小方、怀璧等。1915 年 7 月

① 《顾准文集》，陈敏之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 9 月出版。

② 《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9 月出版。

1日（农历五月十九日）出生于上海南市顾家湾的一所宅院里。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亲的顾姓。

顾准出生的那年，恰逢《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刊，4年以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中国历史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潮开始漫卷全国，东西文化互相碰撞、交融。顾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与众多的仁人志士一样，很早便投身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的双重变奏之中，激情、亢奋、呐喊、困惑、质疑、彷徨、纷争、搏斗、批驳、解说……扑朔迷离，难以尽述。

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竖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大旗，而后来顾准的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和中国“史官文化”，正是“五四”精神的延伸。

顾准父亲原是江苏苏州人，他祖父是个染坊工人，早年亡故，生有儿女四人，长子陈蓉生，次子陈文纬，即顾准生父。陈文纬生于1873年，因家贫早年失学，后经自学，学会了做生意，当帐房先生，并且钻研中医。辛亥革命前，他因熟谙岐黄之术，被延聘到湖北的一个衙门里当幕僚。

顾准的伯父陈蓉生，年轻时来到上海江湾一带，向当地棉农收购棉花，然后经加工再转手出售给棉纱厂作原料，赚了不少差价。时在1890年前后。

陈蓉生多才善贾，经营得法，事业颇为顺利。大约在民国初年，他写信给还在苏州故地的弟弟陈文纬，携母亲、弟妹迁居上海，生活在一起，合做棉花生意。

顾准的外祖父顾老先生在苏州经营一家扇庄。它的规模不大，雇用的伙计最多时，也不过二三人。陈家生计困难，祖母就到顾氏扇庄领做一些扇子活。陈顾两家邻居就是这样熟识起

来，以后成为儿女亲家。

顾准外祖母生过许多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姊妹两人，其中妹妹顾庆莲即为顾准生母。他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姐夫跟小姨的恋爱。顾准兄弟姐妹 10 人，他排行老五，小名双伍。顾准的大母（即母亲的姐姐）生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生母有 5 个孩子，顾准是他母亲的长子。

如同当时上海许多城市市民一样，顾准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带有过渡形态”的亦新亦旧的家庭。这是上海特殊的群体。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对此有一段中肯的论述，这里不妨照录：

> 在近代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上海出现了各种新兴阶级与阶层：买办、侨民、产业工人、中小商人、职员、城市公务人员和各类无业游民；同时破产的农民、落魄的文人、失势的官僚也不断进入上海。在他们被改造成近代城市市民之前，还保留着不少旧式特征。这些新旧阶层在本质上与旧时代或内地封建秩序下的官、绅、士、民各等级都有很大区别，但又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与之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过渡形态的城市市民。①

在顾准出生之前，由于外祖父已经去世，其经营的扇庄已无法继续经营下去，最后只好把多年积蓄的八百元交给女婿做棉花生意。于是顾准的父亲拿这笔钱独立开了一家棉花行。起初，家道小康，因此，顾准幼年生活是比较宽裕的，他的父亲

① 《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728 页。

还有“包车”（即自备人力车）。到1924年，棉花行因经营不善，只得歇业。这时，“包车”没有了，住处另迁了，住得狭窄了。1926年，顾准父亲经常整天不出门，要他们兄弟几人拿家里值钱的东西上当铺典当，然后养家糊口。

随着家庭的破产、没落，顾准渐渐开始懂事了。

顾准是5岁时开蒙的。1920年起，他在其小姑母办的私塾读了两年，他姑母曾在清心女中上过学。1922年，顾准7岁，插班转入他家附近的留云小学上三年级，他的二位异母哥哥也在那里念书。这是佛教寺庙“海潮寺”所举办的私立正规小学，当时的校长是王志莘（1896—1957年，是我国现代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他和国文教员殷亚华对顾准弟兄三人很注意。特别是聪明好学的顾准，颇得他们的青睐，他的作文常被评为优等。这时，他们不光读四书五经，也将视角投向黄宗羲的《原君》、《原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以及同盟会成员林觉民的遗书等。顾准幼小的心灵得到民主、自由气息的浸润。

事隔半个世纪，晚年的顾准对他的母校仍然记忆犹新。他说：

> 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母校——留云小学的校歌，开头几句是：“滔滔黄歇潮，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我学会唱这首歌，是在1922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①]

顾准1925年离开留云小学的时候，他的家庭已贫寒式微，

①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321页。

1926年秋，由中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新学年开始之际，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顾准弟兄三人只好同时辍学。小学老师殷亚华知道这一情形后，便主动向已在中华职校任职的王志莘提议，请学校对顾准的学杂费予以减半的优惠，对此，王志莘允诺。减半以后，一学期约需20元，在他外祖母和母亲的“私蓄”拼凑下，又再度复学，时在该年10月上旬，距开学已六个星期了。

这时，顾准也许是幸运的，家庭的破落毕竟没有使他辍学。更重要的是，顾准就读的初中是赫赫有名的拔中国职业教育之头筹的中华职业学校。当时一般学校教学与实际脱节，收费又高，多为富家子弟而开。中华职校则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以“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为标识，学以致用，注重质量，收费低廉，因而在沪上声誉鹊起。

该校的校址在小西门外陆家浜，距顾准家不远。学校学制为5年，初级班（相当于现今的初中）2年，高级班（相当高中）3年，分设工商两科。顾准则选择商科就读。

中华职校的教学是有特色的。其一，课程设置除基础课外，还设有专业课。学校考虑到上海是外国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商科学生就业后与外国人接触较多，因此将英语列为学生学习的重点，其英语水平高于普通中学。顾准的英语基础就是在这里打下的，后来再经过刻苦自学，长进迅速，能阅读英文报刊、图书。其二，扩大与上海工商界的广泛联系，注意学用结合。其三，学风扎实、稳健，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其四，职校教师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介绍帝国主义依靠租界特权、胡作非为，以及不平等条约带给我同胞的种种灾难等。青年学生经过这些教育，无不引为奇耻大辱，发奋图强，爱国

之情油然而生。”[①] 这些教学特色，对少年顾准的成长，无疑是有裨益的，不少内容，终身受用。岁月流逝，对顾准当年在中华职校的学习情景，已经很难在这里再现，这是令人抱憾的。

顾准在中华职校的时候，已感精神上的困惑，一则是家庭的纠纷和经济的窘迫；另一则是社会的变革和时事的演化，真应验了一句古话：“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者的烦恼，大概还容易对付，后者对年轻的顾准则冲击很大。两者交织，是促使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

1925年，顾准经历了“五卅”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首次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平等权利的革命运动。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反对增加码头捐！”“取消治外法权！”“反对越界筑路！”“收回洋人在华一切租界！”等口号，与外国巡捕发生正面冲突。各界群众的义举，激发了顾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和同伴声援声势浩大的“三罢”运动（罢工、罢课、罢市）和抵制外货的运动，打着旗帜，拿着竹筒，走街串巷，为罢工的工人募捐。至此，“五卅”运动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儿童在内的遍及全国的反帝浪潮。对此，瞿秋白称之为“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他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文中是这样叙述的：“‘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穷乡僻壤，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

① 蔡铁伦：《回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载上海文史选辑第59辑《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454页。

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1] 而这时，顾准才10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顾准知道的事情更多了。1927年左右，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又爆发了。工人纠察队进占了顾准家附近的一个警察所，顾准感到非常兴奋：他亲眼看到佩戴红色标识的工人走到警察所门口，夺下门岗手中的枪，取下警察头上戴的帽子扔在地上，长驱直入，到内部收缴枪械，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一幅情景。就在北伐军攻克上海以后的短暂时间内，顾准分享了人民大众建立新政权的胜利的欢乐，他和三哥二人结伴来到黄浦江滨董家渡，在警戒江面外国军舰的沙袋工事中，看到了架在那里的重机关枪，并和驻守的官兵交谈。当听说他们部队也有小孩子当勤务兵时，当即要求他们收留当勤务兵，但被谢绝。

在这以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动政变。上海变成了国民党的天下。这时，顾准也快要成年，即将从中华职校毕业，进入社会。

1927年夏天，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顾准在中华职校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停止学业。这时，他由小学教师殷亚华推荐，并经已在银行供职的王志莘介绍，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王、潘两人系留美同学，1921年同时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由于这一缘故，他们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从1927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十四个

① 原载《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25日。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1版，第397页。

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与潘序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术高峰。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囿于世俗的偏见，拘泥什么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从一个练习生，顾准很快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授、会计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教师、事务所稽核员、编译科副主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等，并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角转向顾准的良师益友、立信的创始者潘序伦身上，从中发现两人密切的师友关系。

潘序伦（1893—1985 年），江苏省宜兴县人。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他生前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和名誉校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中国会计学会和上海市会计学会顾问、上海市社联顾问等职。三四十年代，还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经济部常务次长，为时极短。纵观他的一生，他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有人称其为“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①，洵非过誉。

本世纪 20 年代前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用毛笔书写的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经济活动，已难适应，会计革新在当时已势在必行。为此潘序伦在 1927 年春天，创办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7 月中旬，顾

① 此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潘序伦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题词。

准通过王志莘的介绍，进入事务所。这时事务所是初创时期，所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员除潘本人外，还有两位专职职员唐荣山、俞晋贤，两位兼职职员丁震、顾洵，一位“茶房”（即勤杂工）徐秀林，加上顾准一个练习生，共有六个人。

潘序伦在中国现代会计史上，创办了富有特色的融教育、办理各种会计业务、出版社于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

在这一事业的架构中，顾准既得益成才，也贡献殊多。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 1983 年）还念念不忘，他说：

> 顾准同志在我国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在 1927 年就参加了我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一名练习生，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他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①]

① 潘序伦为顾准遗著《会计原理》一书所作的序言；《会计原理》，知识出版社（上海），1984 年 8 月第 1 版。

事隔多年，潘顾两人的友情并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蚀，透过上述言语，人们仍能体验到潘序伦对顾准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

1927年至1940年，顾准12岁～25岁，这是他在立信的十四年。这十四年，是顾准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立信是顾准成名成家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加革命工作、搞地下斗争的场所。对于顾准在立信的这段经历，他的胞弟陈敏之有一段平实中肯的论述，谨以录之：

顾准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也是在这里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会计学家的。在这十四个年头中，顾准的成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他必须勤奋地学习和工作，通过刻苦自学，他很快从一个对现代会计学一无所知、所知不多的练习生，成为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教师、会计学著作的著述者（三十年代已有不少会计学著作出版，其中有些与他人合著；有些未署自己的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被列为“大学丛书”的《银行会计》就是1934年写成的），大学讲师、教授；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日屈膝妥协，对内矢志剿共，震撼全国；亡国的现实危险，唤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觉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顾准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采取实际行动，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进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为一名忠诚

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会计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人。从事会计事业，当时在他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掩护，并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目的是实现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①]

顾准初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由于人员精干，一个人往往需要身兼数职。当练习生的顾准，每天除了接待应酬，给来所联系业务的客人让座倒茶，到银行送缴款子等之外，有些公司登记和代办商标注册的正式业务，潘序伦也让顾准去做，这样顾准锻炼得很快。

1928年春季，潘序伦创办了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顾准成为该校首届学员。同届学员人数很多，事务所原有教室不敷使用，只好移至河南中路吉祥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校舍，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顾准在这所夜校利用业余时间，念了一期簿记，对会计有了初步了解，成为他会计生涯的启蒙。在此之后，他学以致用，当过事务所的会计员、查帐助理员，并升任文书科工作。

潘序伦在办学实践中考虑到，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立信补校创办伊始就重作业，课卷多，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

---

① 陈敏之：《一件往事的追忆——纪念顾准逝世二十周年》;《上海会计》1995年第6期，第3页。

一位助教辅导。[1]从1929年秋天开始，顾准被潘序伦选作助教，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和批改作业，年纪虽轻，阅历虽浅，但他勤勉笃实的工作作风，深得潘序伦的青睐。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是潘序伦的成名作，由其主编，并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从1929年起，该书随写随印成讲义在夜校中使用。潘序伦让顾准利用夜间工余抄刻铜版，每张1500字，每天晚上可刻2张左右，他边刻边自学，对商业簿记这门学科熟稔起来。这年年末，也就是该书编写后期，顾准成了专任助理编辑。俟全书定稿誊正，他就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跑印刷所、当校对等。这本列入“大学丛书”的会计书籍，一炮打响，十分畅销。通过这二三年的锻炼，顾准初步掌握了会计这门学问。

1931年下半年，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招收了许多学生，班次得到增加。潘序伦让顾准担任一个人数较少班级的教师。此时，顾准毕竟只有16岁，年龄实在太小，还不如有些在座的学员，加上稚气未脱，上课不到一个星期，便被学生轰下台。又过了一年，他又担任一个班的老师，这回站住了脚，并受到学生欢迎。

潘序伦主持的立信学校，采用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来普及会计知识。除了夜校之外，还开办了函授学校等。顾准在夜校兼课以后，又开始负责函授行政工作。他办事干练，并擅教学，在上海的会计界、教育界已小有名气。

1934年，顾准编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会计专著——《银行会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以此为教材，又讲授该课程，并

① 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34页。

且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据立信老校友丁苏民回忆，顾准的这门课程非常出色：“我与顾准同年。三十年代初，我在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攻读，并兼《成本会计》课助教，而他是《银行会计》课教师，从此相识。他教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当时，这些同学大都是银行界小职员、练习生，与顾准同志相处甚欢，气氛非常活泼。顾准同志年轻有为，学识渊博，同事们和同学们都十分爱戴他，也是我平生最敬佩者之一。”[①] 这时的顾准不是以教授自居，傲视他人，而是大家觉得值得信赖的朋友。

1934 年初，就在顾准初出茅庐之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中国会计革新运动，发表文章，积极争鸣，为使中国会计早日国际化出了不少力。

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由于“实业救国”思潮的积极影响，民族工商业出现了勃兴的势头，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传统簿记，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那些毛笔楷书的上收下付，项目又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财务资金活动，显得力不从心。古老的会计事业，遇到了新的问题，会计学科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会计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科学性较强的西式簿记，必将取代科学性较差的中式簿记。

因此，当时会计界涌动着一股改革与改良的思潮，而会计革新运动便是这一思潮的直接产物，因而发生了一场是否以科学的西式会计取代传统的中式簿记的论争。其中一派是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派，后者则当推以潘序伦为旗手的引

① 丁苏民：《顾准同志是我最敬佩者之一》，1995 年 5 月 30 日《立信校友通讯》，第 39 期，第 2 版。

进西方会计的改革派。平心而论，这两个学派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其主要分歧在于所选择的道路或方法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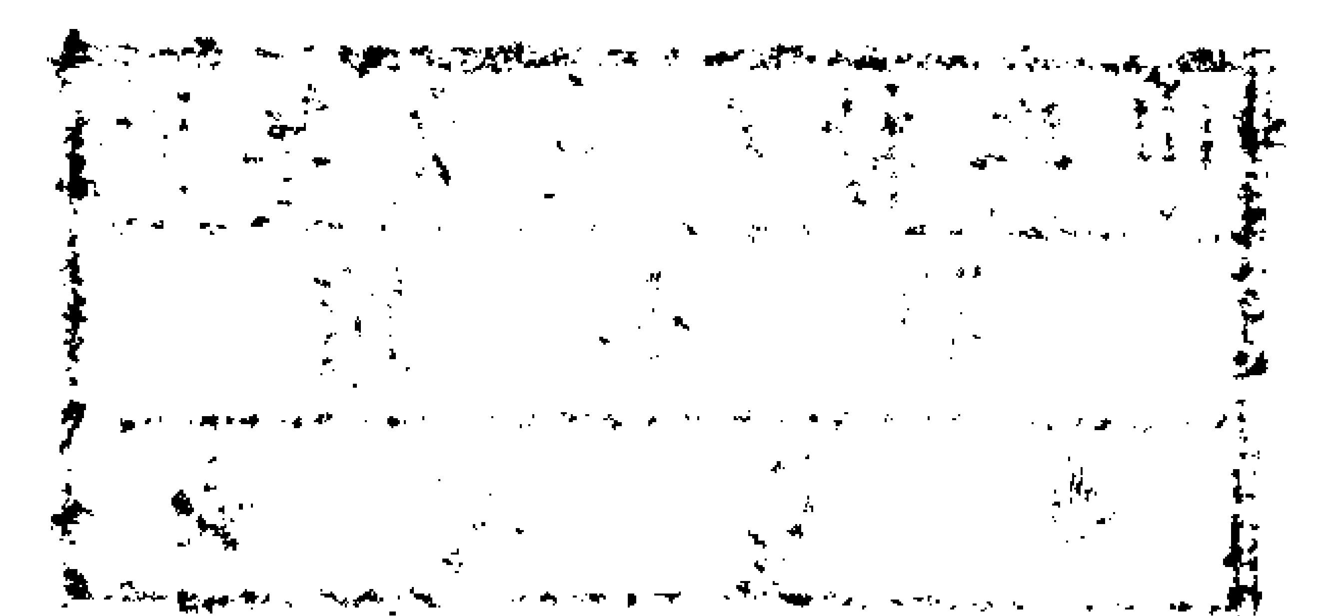
首先，由徐永祚发表了《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全面推出十条“改良大纲”，他认为中式簿记虽有四大弊端，但“不仅在形式上，有维持之价值，即在实质上，亦有保存之可能”。针对这一观点，顾准与立信的改革派一起，予以反驳。他撰写了著名的《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一文，发表于《立信会计季刊》1934 年 4 月第 2 卷第 4 期。

顾准的这篇文章是继潘序伦的《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后发表的，它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基本原理从原则上加以否定，从而使对改良中式簿记的批评纵深化。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他首先表明：“在本文中，作者的目的在于说明改良中式簿记之一般理论及方法，如何能适用到我国这个时期中，又根据一般会计理论去批评，改良中式簿记中有如何谬误点，因此决定在一般簿记推行完备以后，改良中式簿记会失却其重要的性质的。”接着，顾准在简要地阐述改良派的基本观点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站在一般会计的立场上，对于这个改良中式簿记中的收付簿记理论首先有根本上不能容纳的地方。”对这些“不能容纳的地方”，顾准以坚定的改革派（主张西化）的口吻详述了收付理论的缺陷，于是引出了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孰优孰劣，抑或收付簿记与借贷簿记优劣之争。在顾准看来：“我们此刻又不能不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借贷理论在现行社会制度之下，不能不说是最完备的簿记理论。第二，在过渡时期固然可以采用旧时收付理论，但决不能以为这可以永久适用。我们必须期待借贷理论之普及，使收付簿记完全废除而代以借贷簿记。否则会计理论不能昌明，会计学术之进步难期了。”

顾准在文章中虽然例举改良中式簿记的某些适用之处，但他仍以革命者的气魄，进一步强调：“我们仍旧希望改良中式簿记有推移簿记到一般簿记，而造成会计制度统一的作用，并且事实上也必然会如此做的。因为正确的理论，是必然会排除一切不正确的理论的。”这段话，出自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学者之口，不正预示着顾准所要进行“武器的批判”吗？

其实，根据现存史料，顾准发表的第一篇会计学术论文是在1933年，即发表在该年11月1日的《会计杂志》（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主办）第2卷第5期上面的《近年吾国银行关于传票及帐簿之改革》一文。以后，随着他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学术素养的日益积累，论文涉及普通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企业会计、会计名辞规范化等各个方面。并陆续出版了《银行会计教科书》（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簿记初阶》（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文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潘序伦）、《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9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潘序伦合著）、《中国政府会计制度》（1941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潘序伦合著）、《所得税原理及实务》（1941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潘序伦、李文杰）等书籍。这些著述，除了30年代初期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完成外，绝大部分是作者在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之中，利用艰辛复杂的地下斗争的间隙写成的。虽然岁月倥偬，但治学严谨的顾准，立论平实，言必有据，见识超群，为推动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

30年代前后，社会环境变化急遽，顾准处于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引发了他的深深思索，他非常希冀寻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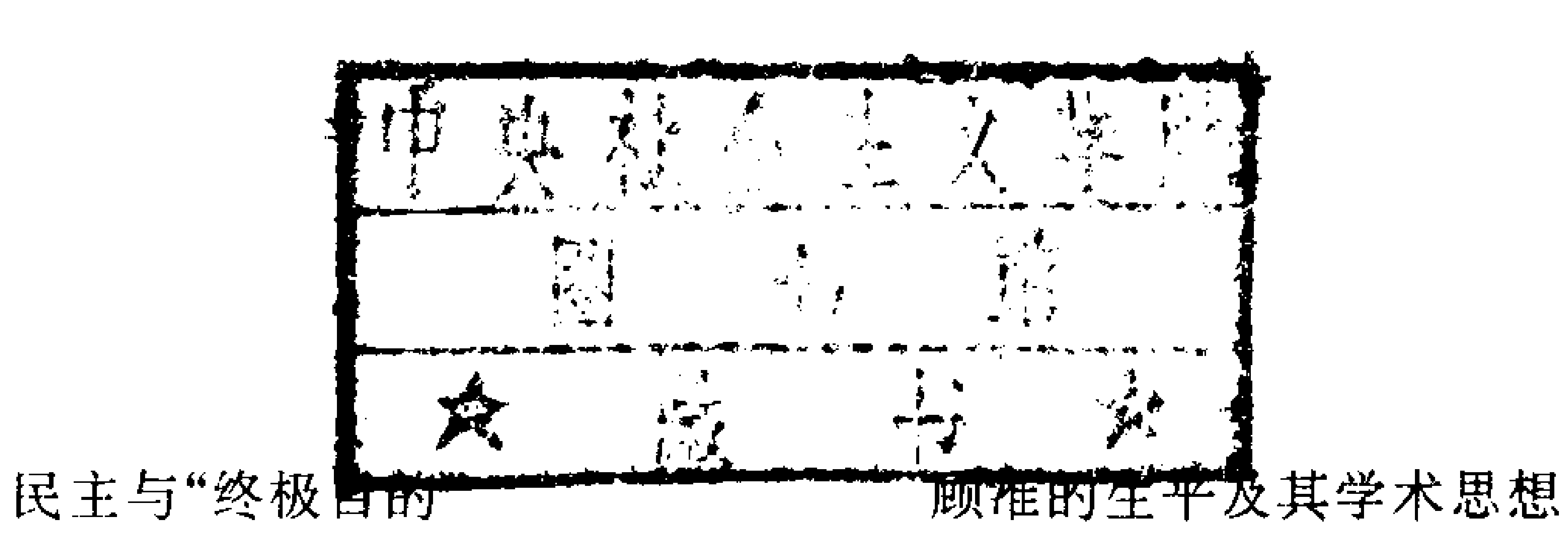
路。在苦苦追索中，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理想，使他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在所不惜。因此，建国之前近二十年当中，他经历了如同他本人所说，“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①。

早在20年代顾准就与热血青年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如原先与顾准一起在中华职校读书的同学甘绩瑞，于1927年秋季进入了国立劳动大学，劳大的前身是校址位于江湾圣堂路奎照路一带的上海大学，后迁至吴淞泗塘桥。这两处地方远离上海市区。顾准每周六下午5点就从事务所出来长途远足，来到劳动大学，周六夜晚就在甘绩瑞的宿舍留下，星期天在那里逗留一天，通常是周日傍晚或下周一凌晨，顾准再赶回市区的立信事务所上班。

劳动大学比较注意让学生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接近工农群众，课程设置也比较结合现实。该校学生社团活动和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都非常活跃，当时被斥之为“议论荒谬、诋毁国民党”的《革命周刊》，即在劳大印刷厂付印并在校内广泛行销。顾准每每到校，即受这些进步活动的影响，并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周刊》等许多进步书刊。受甘氏的影响他借读了李芾甘（巴金）翻译的俄国学者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即《面包与自由》）等书，曾一度很信服无政府主义起来了。

与此同时，1928年江苏宜兴爆发了中共党员万一同志领导的暴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除了潘序伦之外，还有好几位宜兴

① 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47页。



籍职员。暴动以后，他们在谈论此事时，顾准表示热烈赞成暴动，还对同事们说：“我也要托起红旗来。”

顾准年仅十多岁，就承担起赡养家庭的重任。家庭负担的生活现实，埋下了少年时代的革命激情。对这情形，其弟陈敏之在《赠顾准》中曾咏叹道：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
为觅衣与食，独力负重荷。
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荫。
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殂。
兄慧惊不殊，少年结硕果。
狼烟弥四野，从此投干戈。
孤灯照慈颜，夜夜守门户。
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奋发，得兄助最多。
离别三十载，相聚曾几度？
漫步古长城，偕游所独无。
把盏逢故友，共话倾积愫。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
奈何书气生，岂能展抱负？
乐乎知天命，期颐养天年。
情在手与足，悯夫上斯言。

1965年9月8日[①]

---

① 原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99页。

聪颖早熟的顾准，独力地担负起家庭的开支，这一现实，无疑是“催化剂”，从而使顾准开始革命的憧憬。

1930年以后，顾准利用晚间来到东方图书馆去看书，该馆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前去阅览者只需花两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在开架的书柜里任意选书阅读，竟日流连。在这里，顾准读了该馆所藏的古今中外各种书刊，犹如置身于一个文化的宝库，每每收获不少。大约从1930年至1932年之间，他先后读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论修》、《孟子》和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读了一些康德派哲学的书籍，如《判断力批判》等。虽然没有师承，但在东方图书馆仿佛是泛游于书海之中，顾准自此养成了博览群书，好思敏学的习惯，他不但看得多，记得也勤，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满载而归。

据顾准回忆，1932年前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自学，不断补充文化等方面知识。1932年开始编写《银行会计》一书，又读了许多银行学、货币学、银行实务和经济学方面的书。他读过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撰写的《经济学大纲》、马凌甫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他还研修了英文、日文等外语，能读原版的会计书籍。①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的“一·二八”事变，使顾准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在无法忍受。他还通过外商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了解了苏区和红军状况。每当拿到新出版的《中国论坛》，他总是贪婪

① 顾准：《顾准自述》，未刊稿，第18页。

地读着，留意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他对李公朴主编的《读书月报》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十分留心，并搜罗辩证法唯物论之类的理论书来努力研读。思想开始左倾，其时的《生活》周刊、《读书生活》等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顾准受其影响可谓不小。他已开始了从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变的进程。

1934年2月，顾准与几位好友集会，创建了“进社”。进社寓意要求进步向上。参加进社的最初的成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模、李少甫、陈怀德、夏增寿、李燮泉、沈尉平、童志培以及不久后参加的汪璧（原名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

进社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它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34年2月至5月的无领导关系时期，1934年5月至8月的由“远反”领导和青年会读书会时期。

前期进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一次的座谈会，每次都在顾准的家里开会。当时，顾家多次搬迁，最后搬至南市小南门外南仓基街4号。这些座谈会主题是围绕着时局和读书，互相交流。1934年4月间，顾准逐渐觉得这样每周一次的座谈会还是“革命的空谈”，很不满足，他认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革命行动，首先就要找党的领导。于是，开始了一番积极的寻找活动。大家算计各人熟人中谁像共产党员，这样才可以通过他去找党的领导。后来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接上关系，由其负责人刘丹联系。顾准第一次与刘丹见面时，刘丹告诉他，“远反”决定和进社保持领导关系。在刘丹指导下，顾准起草了《进社纲领》。这时，进社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刊物

《前卫》，顾准还被推选为干事会负责人，他们积极参加了当时由李公朴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

1934年8月，由于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后通过读书会甲班干事孙化新（即孙焕然、孙静，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机关刊物《武装自卫》编辑、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的介绍，顾准很快找到了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又与武卫会建立了联系。林里夫决定，进社解散，社员可以转为武卫会会员。顾准同意照办。就在同年9月16日读书会第一期结业式时，特地举行了纪念“九·一八”三周年大会，邀请章乃器、沈体兰等知名人士参加。在这次会上，顾准公开宣读了武卫会成立宣言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提出成立武卫会上海分会的动议，得到在场二百多人中的绝大多数的赞成。

不久，顾准出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兼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2月，经林里夫介绍，顾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他第一次流亡去北平，经历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此时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夫妇自北平回到上海（顾准与汪璧于1934年12月结婚）。

对于顾准这段时间的革命活动，夏衍在其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提及过，这里作一摘录，他的原话是这样的：1935年下半年以后，“我和当时‘社联’负责人钱亦石去找周扬，讨论‘文委’失去了和中央联系之后，如何才能适应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问题。几个月来，‘文委’所属各联都在单独作战，都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建立了新的阵地……特别是‘社联’的工作有了划时期的发展，他们的活动范围早已经超过了

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圈子，而已经在职业、妇女、学术团体、高级职员乃至法律界建立了各自的小组。例如由店员、职员、中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蚂蚁社’，就是一支很强大的队伍，据我回忆，王纪华、袁庶华、顾准、李伯农、徐步等，都是这个团体的积极分子，也是‘一二·九’以后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的前身。”[①]夏衍作为当事人，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至于顾准何时成为“蚂蚁社”的成员，尚待查考。“蚂蚁社”又名为“蚁社”，原称“青年友社”，亦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开展活动。

1936年2月，顾准一回到上海，很快就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认真学习了不久前从国外传来的报刊，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报》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发表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这些文件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以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等内容，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地下党，“正像大旱遇到甘露”（夏衍语），他们认为这是党中央和第三国际的声音，开始认识到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转变上海地下工作策略、工作方法，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顾准退出了“武卫会”的领导职位，转到“临委”系统，担任“职救”党团书记。

---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88～289页。

情况是这样的：面对空前发展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江苏省委、区委遭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重建后的“文委”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1936年2月，由邓洁、胡乔木、王翰、丁华和王新元等人组成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临委成立后，面临的任务就是推动上海正在掀起的救国会运动的发展。临委以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为工作基础，并按救国会系统管理党员。顾准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工作，任党团书记。在顾准领导下，上海职业界爱国救亡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环境的险恶，顾准在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前，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又多次流亡。

1937年7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电示，由刘晓、冯雪峰等暂组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

对这段时间内，上海党组织的重建以及顾准等人重新接上关系，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在上海》一书有如下的叙述：

> 在派遣刘晓赴上海工作前的1936年春，中共中央已派遣冯雪峰到上海了解各系统地下党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作准备。冯雪峰对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后遭到破坏的情况以及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作了初步了解，并组织了一个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为恢复、重建地下党作准备。刘晓到上海后，与冯雪峰接上了关系，听取了冯雪峰的介绍。7月初，刘晓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党组织重建工作的指示，和周恩来在西安谈

> 话的精神，同冯雪峰等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着手对“临委”联系的党员，逐个进行认真的审查。林枫、顾准、刘峰、王任权、沙文汉、陈修良、马纯古、唐守愚、冯定、孙冶方、赵伯华、关建夫、钱柏森、王洞若、陆志仁、张美道、朱启銮、吴仲超、赵先等20余人先后通过审查，接上组织关系。[1]

中共上海三人团成立未几，全国形势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终于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上海，全市军民全力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从此开始。

“八·一三”抗战的炮火，掀起了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大家普遍认识到，只有英勇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上海各界人士在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发动下，纷纷组织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蔚然成风。

9月12日，在顾准为书记的“职员临委”推动下，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在前职业界救国会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扩充，宣布正式成立。当时职协的会员，主要是广大店员和职员，同时也吸收经理、工程师等高级职员以及工商业者参加，它还邀请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担任一些领导职务。顾准认为，应当争取团结这些上层人物，使团体更加公开合法，变阻力为动力，这样有利于广大店员和学徒能够参加进

---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103—104页。

来，壮大群众基础，这也就使当局不敢贸然压制。

1937 年 11 月 12 日，“八·一三”抗战结束。上海沦为“孤岛”。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等人组成。针对上海沦为“孤岛”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江苏省委及时分析了其时的形势与特点，指出：“上海沦陷后，千百万群众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杀、饥饿、流浪的痛苦，将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绪……日本在租界的势力必将加强，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也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恨与相互间的矛盾，租界当局不能百分之百的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① 省委决定抓紧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合法形式，扩大群众基础，发展党的力量。

在省委领导下，按照不同产业、不同系统，相继设立了党的委员会：如军委、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妇委、难委（难民运动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等。职员运动委员会，就是在江苏省委成立后，由“职员临时工委”扩大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史资料》一书记载：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初，职委首任书记由顾准担任，委员有陆志仁、胡实声；1938 年初至 1938 年 5 月，书记为彭柏山，委员是顾准、陆志仁、胡实声、曾颖（女）；从 1938 年 5 月至 1939 年 9 月，顾准任书记，陆志仁、吴雪之、张承宗任委员。由此可见，上海孤岛前期的大部分时期，职委工作是在顾准领导之下的。

---

① 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合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 8—1987. 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06 页。

孤岛时期，顾准参与领导的上海职员运动，是在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总方针和党在沦陷区的斗争策略、救亡运动方针指引下进行的。顾准审时度势，认为党的工作必须为了适应孤岛的斗争环境而有所改变。他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考虑将当时上海职业界工作的重点放在金融保险业、洋行、海关、百货业职员、店员及部分上层人士。他认为这些行业的职工是租界内在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坚守阵地的群众。如何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是摆在职委面前的紧迫问题。如果继续沿用“救国会”、“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之类名称，都不大合适。顾准经过深思熟虑，并联系前段时间的斗争实践，针对职业界的实践情况，运用前几年组织“立信同学会”的经验，决定改变群众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联谊会”、“俱乐部”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将群众团结起来，更广泛地发动职业界人士，便于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于是，基于孤岛的条件，职业界陆续成立了各种联谊会，对外是敦睦友谊，联络情感。这一做法与上海中小职员的生活习惯相吻合，又适应白区工作的特点，也符合党对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党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时期，在顾准筹划下，前后成立的职业界联谊组织有：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由银行学会、银行业务联谊会、交换员联谊会和华益会等金融团体联合组成）；益友社（为商业系统各业店员的群众性组织）；上海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系上海洋行职员联谊组织）；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是上海保险界职员以保险界战地服务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中国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等。这些组织相当活跃，

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利用当时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公开合法的条件，广泛发动职业界人士投身救亡活动中来。

顾准负责的职委，利用孤岛前期日寇统治暂时不稳的时机，积极稳妥地健全和完善党组织。职委根据省委指示，积极而谨慎地创造条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行业内部，先后在金融业（包括银行、钱庄、保险）、海关、电讯及洋商企业、大百货公司、各业商业店员等行业系统的基层建立党支部。为加强统一领导，职委于1939年初组建了金融业工作委员会、百货业党委、洋行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店员工作委员会，各委下辖41个支部。[①] 到1939年7月，职委系统的党员人数发展到150人之多。

但是，顾准的这些做法，也曾招致一些缺乏实际经验的同志的反感。正如沙文汉夫人陈修良后来所述，顾准倡导的这种组织方式曾被斥之为“联谊会路线”，遭到个别同志的反对。但是，顾准的做法，“使党和广大职员群众加深了联系，为党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顾准的创举，后来在中共‘七大’时得到中央的好评。这是上海党在苦难岁月里打破关门主义组织路线后发展壮大起来的经验，在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党在白区工作已趋成熟。”[②]

针对孤岛的特殊环境，为了更好地利用合法形式开展“非法”的革命斗争，党员必须尽量做到具有公开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指出，“越公开越秘密”，实行党员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顾准积极贯彻这一精神，有的放矢，做到“勤学、勤业、交

① 详见《中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

② 陈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上海滩》1993年第7期，第27页。

朋友”，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继续站稳了脚跟，分别出任编辑和教授职务，并争取潘序伦以及许多立信同仁的同情、支持乃至参与。

直至80年代，已届耄耋之年的潘序伦还记得：“因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培养会计人才，对那些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年，我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总是爱护备至，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像顾准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他十九岁就受聘到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执教，在会计学术方面有很多的著作和译著，我曾一心打算培养他为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①] 这其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曾经告诫潘序伦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明知顾准的“色彩”，然而他对国民党的警告却不予理睬。如果没有甘愿担当一定政治风险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以采取这种正义的态度的[②]。

由此可见，顾准能够比较从容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与潘序伦等人提供的条件是分不开的。后来，《顾准自述》也说过：

> 这三年中，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

---

① 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45页。

② 陈敏之：《会计事业的生命是无限的——庆贺潘序伦先生从事会计事业六十周年》；《犁地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79页。

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①

顾准擅长文字工作，在这段时间笔耕不辍，非常勤奋，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贡献殊多。他写的许多时论，由于时间久远，颇难搜集。但发表在上海职业界《职业生活》报上的文章，现存十余篇，弥足珍贵。《职业生活》是在职委领导下，于1939年4月15日创刊的，该刊由顾准主编，以英商《译报》增刊的合法形式公开出版，每周出版三期。顾准在上面化名为“小方”、“怀璧”、“立达”等，撰写了不少颇有创见的时评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上海职业运动的方针政策。许多文章如《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九四〇年的展望》、《远东局势与抗战前途》、《欧战以来上海经济及最近将来趋势之预测》、《论日本内阁》、《苏联内战史的研究》等等，立论翔实，预见准确，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顾准1939年化名“立达”发表在《职业生活》第1卷第1期至第4期上的《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文，长达近万字，以大量客观的材料，详细地简述了上海职员的状况和开展职业运动的积极意义，他是从“职员与工人阶级”、“上海集中了哪些职员”、“旧式商店的职员”、“外商企业职业”、“民族资本经济机关中的职员”、“上海职员运动之回顾与前瞻”等方面，展

① 《顾准自述》，未刊稿，第54页。

开了全面的论述。他中肯地指出：“自一九三七年起，职员运动是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兴起的，它曾经对于抗战尽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锻炼了职员自己。可是在整个这一时期，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做自己主要任务之一，这就使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参加抗战工作，运动本身因而非常狭隘。最近两年，职员运动比较的已特别注意于改善职员的业余生活，因而得到了较大的成就，这一经验，是应该善于运用与善于发挥的。”①

顾准在前面所述的《自述》中所谈到的“有的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包括《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于1939年7月15日出版）。关于这本书的大致情形，建国后编纂的《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一书作了介绍：该书“由中共江苏省委刘长胜主持，‘工委’刘宁一、马纯古、张祺分头负责，由顾准整理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出版，全书60万字左右。全书以上海劳动者为对象，收集了纺织、交通、邮政、印刷、机器、卷烟、食品、各业职员等22种产业部门，涉及60万左右职工的情况，包括各业职工的历史、人数、待遇、负担、文化、生活习惯，过去和现在的活动情况。这是党对上海工业、经济、工运史的一次系统的综合性的初步调查。”② 当时，顾准主编的《职业生活》报也开辟《书报介绍》专栏介绍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他撰文指出：“这本书里面并没有非常趣味化的描写，因为它并不是文艺通讯。相反，里面

① 原载《职业生活》，1939年第1卷第4期。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沪版），1989年1月第1版，第508—509页。

倒有许多干燥的管理系统，与一些数目字。因此也许有人会感到枯燥。这本书也并没有高深的理论，这里叙述部分超过了理论部分很多，因此也许有人觉得它价值并不大。但就我的意见来说，我以为他提供给我们以很多的实际材料，这些实际材料告诉我们中国产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告诉我们职工运动的过去与现在的状况。假如我们是应该懂得更多实际材料来充实我们了解的话，这书不仅应该懂，并且应该很严肃的去谈的。”[1]

1937 年 11 月，上海沦为孤岛后，在中共江苏省委设立职委的同时，决定重建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为孙冶方、副书记为曹荻秋，委员有王任权（巴人）、梅益、夏萤、于伶等。在文委领导下，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顾准是于 1939 年 9 月，由江苏省委决定，从职委调任文委副书记，从此，顾准与孙冶方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对此，孙冶方 1979 年撰文说过：“1937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夏衍、钱俊瑞都调到大后方，曹荻秋也离开了上海。以后参加过文委的有唐守愚、梅益、王任权、姜君长、林谈秋、顾准等。顾准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职委调到文委担任副书记的。”[2] 曹荻秋于 1938 年初离沪后，文委副书记一直空缺，为了给孙冶方配好助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想到了顾准。沙文汉认为顾准与原救国会上层文化人士关系融洽，文章脱手快，

① 《职业生活》，第一卷 19 期，第 330—331 页。

② 孙冶方：《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9 月第 1 版，第 2 页。

声情并茂，多产量优，他看过不少顾准的文章，常为之击节折服。因此决定调顾准去文委工作。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33年就与陈翰笙、薛暮桥、徐雪寒、骆耕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从事左翼进步文化活动。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孙冶方和顾准主持的“文委”工作，贯彻了党的文化工作的指示，主要将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他们的做法是：第一，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第二，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广泛组织群众性的业余剧团，即在职业界各联谊团体演出，宣传抗日救亡。他们首倡的小剧场活动，事后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称赞。

岁月流逝，曾在“文委”工作过的姜椿芳生前为后人留下了顾准与孙冶方并肩战斗在孤岛的吉光片羽，他以《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为题写道：

> 在整个工作中，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组织上变动多，领导人也常变动。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一九三九年秋，顾准向我宣布成立一个文化总支部（“文总”），下设几个支部：(1) 新文字支部，先后有许中、张浩、王益、王洪、艾中全等同志；(2) 文学支部，有王元化、钟望阳、蒋天佐等同志。下面有文艺通讯员，文学界刊物。党员有束纫秋、赵不扬等同志。(3) 戏剧支部，有胡大中、吴小佩等同志。戏剧支部下面有三个小组，我

任文总书记……[1]

大家都勤奋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孙冶方后来对这段工作，曾有如下的估计：“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我们当时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绩是不算小的。”[2] 的确，上海虽然沦为孤岛，但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进步活动，其影响会波及全国。

当时，顾准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对党的文化工作十分投入，深受同志们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不少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的记忆之中。著名学者王元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我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化部门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 1939 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讯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年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3]

1940 年 8 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因工作需要并根据顾准的意愿，顾准结束在文委的负责工作，被调往苏南抗日根据

① 该文载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 年第 7 期，第 15 页。

② 转引自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知识出版社（沪版），198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43 页。

③ 王元化：《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09—510 页。

地，开始了新四军的军旅生涯。

顾准的这一行动，给人们震动很大。仅举陈敏之的追忆为例：

> 当他决定离开上海时，他职业所在单位的同事们对他这种突然的行动感到迷惘不解，有的还善意地加以劝留。他答之以“志不在此”。在三十年前的当时，作者之所以要去学习、掌握，后来又从事会计学著作的撰述，都不过把它当作一种谋生和掩护革命活动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把自己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至于抛弃优厚的薪水、舒适的生活等等，这在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并且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员来说，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在一般人心目中往往是难以理解的。①

就这样，顾准告别了妻子，离开了上海，奔赴苏南。

在新四军根据地，顾准转战苏、皖、鲁等地区，先后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直接在谭震林、李一氓、黄克诚等新四军有关领导人的领导下工作。

1943 年 3 月，顾准奉命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红都充了电，使他在政治上更成熟了。1944 年 3 月，顾准应时

---

① 陈敏之为顾准遗著《会计原理》所作的《写在前面》；载顾准《会计原理》，知识出版社（沪版），1984 年 8 月第 1 版。

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之邀，在其开办的会计训练班任会计教员，从此，两人结下了友谊。对顾准的教学水平，陈云给予很高的评价。

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顾准回到华东解放区，苏皖边区行署主席李一氓、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曾山让他出任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后来，顾准又出任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渤海区行行公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处处体现了他的才干、懂行、有思想、热忱、细致，使他成为根据地理财的佼佼者。

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抑或是对顾准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人民民主专政。顾准本人从1931年投身革命生涯，千辛万苦，冒死奋斗，如今天将大任落于斯，顾准即将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长，他固然精通经济、长袖善舞，但前面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好像是英国诗人济慈说过，境界就像不断聚散的云彩：当我们开怀大笑时，祸种已经播进了滋生各种事件的广袤耕地；当我们开怀大笑时，它萌芽、生长，突然结出我们采摘的恶果。顾准的结局与此所说非常巧合。

上海解放前夕，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集结在丹阳，接受教育和培训，顾准任青州总队队长，这是一支专事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干部队长。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到达上海甫定，顾准作为军管会成员之一，负责了上海市直接税局、市货物货局、市财政局、市府会计处、审计处和市地政局等原国民党财经部门，工作繁重而显得驾轻就熟。据时

任中共上海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修良回顾：

> 解放初期，顾准真是席不暇暖。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面临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支援抗美援朝）和争取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艰巨任务，但他责无旁贷，竭尽所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政绩有目共睹。
>
> 上海的财政问题，关系全局；顾准主持上海财经工作，应该说是上佳人选。他对上海工商业情况相当了解，本人又精通会计业务，加以其革命经历，是解放初期市府职能部门难得的红色专家，难怪陈毅市长对他的工作完全信任，极为支持。可以说，顾准任重道远，大手笔刚写了个序幕。谁能料到，祸从天降，顾准突然被撤职，结束了他在上海方始打开局面的事业。
>
> 1952 年 2 月 28 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顾准耸人听闻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
> 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征税的方法问题上。
>
> 按照某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征税，应实行纳税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但顾准观点不同，他认为上海不同于小城市，不能纯靠纳税户民主评议；上海大部分工商业户都有帐册可查，应当依法交税，其他分散的个体户可以定期定额纳税，即所谓“依率稽征，专管查帐，职工协税”。顾准的意见既得到陈毅市长首肯，1951 年陈云同志也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表过

态：“顾准对税收方法的意见是对的。”但到了1952年2月，却裁定顾准坚持的税收方法是违法乱纪，顾准于是成为“三反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尚方宝剑”落到了这位无辜者的脖子上。

退一万步，即使顾准的观点不尽合理，但他与领导之间的争论也只限于方法；他虽善于独立思考，也许确也有点骄傲自大的表现，然而以之“上纲”为“反党”，确实匪夷所思。其实，顾准当年在财经工作上的观点就是到了今天，还能令我们叹服他的预见性。例如1952年“三反”前，他曾坚决反对机关生产。他认为，在解放区的机关生产是自力更生，限于农业生产，目的是改善机关工作人员极其艰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不是剥削。但是，“工商业范围内的机关生产单位不带上浓厚的资本主义气味是不可能的，建议市委不要搞……”这个意见被市委采纳，并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对此也表示：“从此机关生产名誉扫地了。”

顾准的观点正确与否，历史自可作出公断，但在1952年2月，他却只能被撤职，调离上海，并背上了无法甩脱的包袱。①

当时，许多同志对顾准这样一位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也感十分不可理解。仅举当时曾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工作的陈丹晨的一段话为例，他说：“就是这样一个上海财经界的重要领导干部，在三反运动初期的一个早晨，人们打开报纸看到忽然被

① 陈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上海滩》1994年第6期。

加以莫须有的可怕罪名而撤职了。这对机关上下的人们震动实在太大而都惶惑不可理解。同时被撤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等七八个人，都是上海各界的重要人物。当时开展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报纸所说的这几个人的罪名都与这三个方面毫不相干。从此再也没有人在财政局的党内党外向人们作个半点解释和交代。这样，一个人就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①] 毫不夸张，从此开了党内无情斗争的先河。

顾准自己也认为，他的撤职，确与“民主评议”的争论有关，“民主评议”不可避免地带有随笔性，而顾准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帐征收”，并下大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制度（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沿用至今），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以顾准的去职而告终，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陋习即“随意性”。而事实上，按照顾准的做法，1952 年 3 月，上海入库的税收达 3 亿万人民币（旧制），较 1950 年增加 10 倍。这难道是“民主评议”能够办到的吗？

50 年代中期，顾准曾写过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经济学论文（详后介绍），它是斯大林模式的否定，而当时还是把斯大林“神化”的年代，因此，老同志张劲夫在评论这一件重要的史实时说道：“这在 50 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②]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戴园晨由此而感发，他认为：

① 陈丹晨：《喃喃自语——〈顾准日记〉读后》，《博览群书》1998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② 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1993 年 7 月 9 日《文汇报》，第 5 版。

> 当然，顾准的难能可贵并不限于这一篇。解放初期在税收工作中通行的做法是“民主评议”，即由税收机关提出税收任务，然后组织评议每个纳税户负担，负担轻重有很大随意性；时任上海税务局长的顾准却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依法查帐征收，并下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员组织。这种“不依法”还是“依法”，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可惜《文集》（案：指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未收入有关文献，未能反映另一次重要的“难得”。①

现在能够差可告慰读者的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经多方寻觅，终于在上海市财政局宁静的档案室库房中，查到了顾准当年在财税局长任上所撰写的大量文稿，涉及税务理论者为数不少，这样便可弥补戴园晨心头的“难得”之见，使之重见天日。

顾准这批文稿刊登在《税务通讯》上，这是一份由陈毅亲笔题词的刊物，于 1950 年 4 月创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发行对象是税务系统内部工作人员。设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张雪澄任主任，由局长顾准直接领导。

它的任务是报道税务系统各单位任务完成情况；交流工作经验；传达政策与统一法令解释；组织政策业务学习等。刊出

---

① 戴园晨：《历尽艰困终不倦的经济学家——读〈顾准文集〉》，《经济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42 页。

具体内容有：社论、论文、短评，工作指示，重要公告，处理案件原则，法令解释，业务讨论，工作报告，工作建议，批评与表扬，人事、业务动态，转载苏联与东欧各国税收工作的经验与理论翻译，市场动态，工商界反映。还刊出副刊“税工生活”。1950年7月，上海市长陈毅应顾准之邀，题写《税务通讯》刊名。1951年11月，该刊出完174期后停刊。

顾准在《税务通讯》发表了许多独具慧眼的文章，内容精练，文采斐然。比如顾准在强调“要做到依率计征，必须控制计算”，加强核算之后，提出控制计算，必须注意依靠群众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指出：

在控制计算中，应该具有一定的技术业务水平，但不能单纯技术观点，必须依靠群众。为什么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业务水平呢？比如，如果不懂得酿酒的一定的智识，他一定无法提出控制意见，只好听人家报多少就是多少。又如，如果不懂会计，他一定不能提出要各厂设置三种记录簿。因此，控制计算要具备一定的业务技术水平，否则是没有办法的。但为什么又要依靠群众，而不能单纯技术观点呢？因为如果以为仅仅税务人员懂得这一行的内情，会查帐，就能克服逃税，那也是不可能的。逃税的人，他会想尽方法抵抗查税，查税的人克服逃税的最好办法，只能是依靠职工、依靠群众。从逃税的厂商的内部去了解逃税的情况，从与纳税人日常生活在一起的群众那里去

了解逃税的情况，逃税才制止得了。[①]

顾准还非常强调税收稽征的现场控制，他撰写的《基层负责制度与现场检查制度》一文认为：“加强基层组织，必须使基层组织按照负责制度的原则来进行工作。这就是各税的统一管理，控制计算与加强纳税人历史记录（稽征手册）的应用，处理违章案件时首先经过纳税人互助组的讨论，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集中在一个稽征组内统一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稽征组逐渐地积累起对专管户的知识，达到联系群众严密控制，堵塞偷漏的目的。负责制度是基于对劳动人民，即基于对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信任之上的一种制度，缺乏这种信任的基础，决不会也不敢按照负责制度的原则来组织我们的工作。但是，这种负责制度，必须与严格的现场检查制度结合起来。应该承认，全局同志对人民革命，对我国建设事业的无限热忱，激发了自己对工作的积极性，缺乏这点，我们过去一年来工作将无法前进一步。但同时应该承认，任何时候严格的检查工作，是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是纠正工作中过左、或迁就倾向与疲塌现象所绝对必要的。我们反对那种对劳动人民不信任的“内部控制组织”。但我们也反对那种工作中只有计划，没有检查的自流现象。因此，切实贯彻各级工作的检查制度，是加强基层工作的中心环节。[②]顾准的一番话，真是击中我们国家长期以来

① 顾准：《控制计算与依靠群众》，1950年10月19日上海《税务通讯》，第32期，第337页。

② 顾准：《基层负责制与现场检查制度》；1950年11月23日《税务通讯》第81期，第901页。

存在的弊病，值得深思。

顾准在“三反”中被撤职数月后，到1952年6月，华东财委曾山向顾准传达上级决定，分配他到正在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任办公室主任。他参与兴建了曹杨新村等工人住宅以及蕴藻浜大桥的建设任务。

1953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建工部亟需大批技术人才和领导干部，副部长周荣鑫到沪特地找顾准谈话，告诉他，国家建工部决定调他到部里任财务司司长，他的妻子也随同调去。到京期间，顾准在陈正人部长、万里、周荣鑫副部长等领导下，工作很有起色。正是因为如此，后来国家要在洛阳兴建一批重点工程，万里代理部长亲自点将，让顾准去担任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副局长，负责洛阳拖拉机厂、洛阳玻璃厂等大型工程的兴建。

1955年9月，根据顾准的要求，中央建工部送他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中央党校原称马列学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月1日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中央党校），杨献珍任校长。顾准进党校学习的这段时间，正是被人们称之为是“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1]，可谓恰逢其时。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的任务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设两种班次，顾准被编入普通班，学员主要来自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中央和地方的司局厅级干部及与此相当的大型厂矿

---

① 安子文语，参见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70页。

厂长、党委书记一级领导干部。当时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被称作“十六字”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

党校的学习环境，使顾准得风气之先。他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历史观点。特别是他通过悉心钻研与观察，发现中国政坛上交织着正确与迷误的复杂过程，并对经济工作出现的急躁冒进状况，已看出端倪。不过，顾准不盲从并勇于直陈己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值规律作了可贵的探索。同时，就“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一尖锐问题，苦苦追索。

在顾准的记忆中，杨献珍的《唯物主义》、孙定国的《辩证法》、艾思奇的《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印象深刻。对于党校的课程，顾准还追忆道：

> 《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龚士其主讲，内客是《资本论》摘要。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系统读完《资本论》，感谢他的讲课，推动我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也是我系统读马恩著作的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由苏联专家主讲，开始时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本尚未出版，印发讲义，讲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是完全一致的。听讲课时随时摘记了一些对讲课的疑问，后来有些成为写我的《试论》（案：即《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时的“原料”的一部分。
>
> 第一学期有联共党史这门功课，讲课的是苏联专家，教研室主任范若愚经常到课堂来照料。专家的讲

稿大纲当然完全根据《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也添加了一些毫不影响讲课大纲的结构的史料。讲课完全按照讲稿照本宣科，专家绝不同意在讲课前先发讲稿。这一门功课才讲授完，苏共二十大的消息文件以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公布了。一年以后我谈起这件事，说这是一场讽刺。

还有一门分量较少的功课《世界通史》，由一个年青的苏联专家讲课，从希腊罗马讲起，并没有突出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奇怪的是，党校没有中国史这门功课，尤其感觉缺门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史。

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是张心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门课所占时间极少，也没有印发讲义。《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许邦仪，讲课内容用了大量联共教材，课程分量也不多。①

以上所引，就是顾准在中央党校第一学期的大致概况。

顾准是一个勤于思索，不盲目随从的人，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涯，通过大量阅读马列经典、阅读历史，肩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重任，为他奠定了成为一位思想家的基础。

顾准在1956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强调：“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在他眼里，“不做长期间的科学的劳动，而以一两个无须证明的实义来构成整个体系的所谓科学工作是不值钱的，我们现在正在反对这种学风，我自己必须以此为深戒。”他接着又说：“因此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必须死心塌地钻

① 顾准：《顾准自述》，未刊稿，第278—279页。

研下去，并且决心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这里不仅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而且必须以充分的时间与严肃态度来对待实际经济问题。要找一条路走，过去的路程走过来了，应该这样走的，评价如何，只要俯视无愧也就行了。一切问题的根本之点，在于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际，过去在这方面冒失，这倒是今后应该郑重记取的。”[①]

同时，顾准还追求“思想的细密化”，他认为，“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楣。这种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1955 年 10 月 24 日）[②]顾准的追求是可贵，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随着思想禁锢日益扩大化，顾准的悲剧也终就不可避免。因为知识分子在以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当代学者林贤治著文说：“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幕僚知识分子，葛兰西称为统治集团的管家；二，技术知识分子，也称‘技术专家’；三，人文知识分子。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是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可以很不相同。幕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分别为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所吸附，唯人文知识分子留在原来的知识谱系内，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做实际事务；谋求世俗利益，往往显得不同流俗，不切实际。”“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工作更多地带有乌托邦性质。所谓创造，也只能是思想，一种具有道德价值的象征物。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对现实不满，因此，总是站在现存秩序相对立的位置上，施予严厉的批评。”“他们不能接受

①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未刊稿（现存顾准之子高梁处）。

② 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未刊稿，第 15 页。

权力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操纵，不能扮演别人分配的角色，不能屈从于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谎言。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新的知识分子’。”①

林文的分析，虽然还不够细密化，但总起来看，顾准大概可以归属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吧。

对自己的思想定位，顾准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在《党校日记》（1955年11月25日）曾写道：

> 新的课程开始三天了。两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我原计划一定要读完《资本论》的，看来时间不多，有些困难，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计划。特别是关于再生产理论和地租论，货币论，要为我解决一批问题。这应做，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籍，大约有三千页至三千五百页，其中小部分要做摘录。其次是苏共党史的学习，连同《共产党宣言》、《列宁文选》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许多材料，大约也有三千页以上的东西要读。时间是到明年四月上旬为止。这样干，颇有拼命主义之概，但我想紧张一些，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
> 自一九四〇年以来，长期间没有进行这样的学习了。而回忆一九四〇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

① 林贤治：《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原载《黄河》1998年第1期，转引自《读书》1998年第5期，第156页。

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这就使读者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思想方法方面，既不知逻辑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了解一些什么，是报章杂志之学加上直观、臆想，全部知识水平，其实是停留在Clerk（案：即普通办事员）的水平上。庸俗的白领子工人，事务所职员，只配实用主义哲学，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断语的马列主义知识拿掉，剩下来的不是这个又是什么呢？目前面对着系统的学习，开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这倒实在十分有用的。

这样说来，目前的学习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三年半来，气质是有些变化的，七月份以来的变化更多些。目前，只有极小成分的个人思想之念，实在已无足轻重。回顾这些思想历程，也许对气质的变化还是有若干用处的。

想起那种事务所职员的庸俗气氛和高傲自大，甚至还有燕雀妄比鸿鹄的想法，看来也实在滑稽。[1]

顾准在这里似乎拿着锐利的解剖刀，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读书的经历以及反思过去，觉得“昨非今是”，实在令人敬佩。如此学素涵养丰富的学者，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知识积累，而且是到了毫不留情地责备。唯其具有这样旷达的自省，

① 顾准：《顾准党校日记》，未刊稿，第27—29页。

才能够登上思想的巅峰！

我把这些披露出来（这里要感谢高梁先生及其他顾准家属），无非是让大家了解顾准的心路历程，丝毫没有贬低事务所职员和办事员的意思，倒是那些动辄引经据典的所谓“学者”看了以后，应该有所汗颜。

1955 年至 1956 年的党校学习生活，使顾准成为一个怀有忧患意识的思考者，读书不倦，浮想联翩，在他的笔下，充溢着对时事的关怀。比如 1955 年 10 月 20 日开学他的日记有如下这些文字：

> 记录一些脑袋里涌越的问题：
>
> A. 要研究并回忆 1949 年，二中全会以来，到总路线，到合作社运动的政策上的脉落，并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照印证起来；
>
> B. 详细考虑一下这么几件事：一、统购统销，梁黄叫嚣；二、增产节约，工农联盟的一个方面的调整；三、合作化运动，工农联盟的最精细方面的措施；四、合作化运动中所决定的对“巩固团结中农的措施”，与对农业生产的增产与减产的影响；五、对农村中新投入的资金，与这些资金对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增长的作用，对工业生产的增长的作用；六、对五年计划的修改的影响——a. 一般工农业生产指数；b. 农具（拖拉机）基本建设的速度；c. 与农具相关的工业（例如石油）与交通运输的变化；
>
> C. 自己的思想方法，似乎会抓主流，往往忽略（不是往往，而是习惯的、自觉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

具体分析。

D. 我们的五年计划，开始编制时的速度总是“增长率的渐减趋势”，主要原因就是对生产、技术、产品及其原料工具间的联系的知识不完备所致。

经济上的预见性，与规律掌握运用之不足，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资料的年度太迟与储备资料之不足；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不足。——除这些困难，还有什么？

第二个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如何？[①]

顾准在这里绝不是“杞人忧天”，须知经济建设是有客观规律，不是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所能替代的。

顾准对经济建设中的“速度”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也作了非常周到的研究。有一天，他“中午睡不着，还是很兴奋地考虑我们的进步速度问题。事情不仅在于农业方面合作社发展的步调大大加速一事，还有的是：（一）今年丰收，使明年的财政是比较乐观的；（二）会有一部分技术与轻工业的输出；（三）大城市过剩生产力的加紧利用与工商界改造步调的加速；（四）预料得到基本建设的速度，特别是交通运输的速度会加快。特别使我神往的是上海人力物力的充分利用与上海人力的向西输出问题。公私合营加速了，在机械工业方面必然会发生新建厂的人力骨干之利用力量的问题的。交通运输方面的步调加速，预料也会更多的利用上海现有的人力。纵然我曾经被标为假马克思主义者，纵然我现在无缘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无论

① 顾准：《顾准党校日记》，未刊稿，第14页。

如何这不能不令我神往”①。

说来真令人寒心，上述文字能出自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吗？从这里可以看到，提倡政治民主、党内民主确乎重要，同样，人们也从中窥见顾准拳拳报国之心。他接着还写道：

> 到北京已经三年半了。过去二年至三年中看到基本建设与改造私营工商业及利用上海人力与技术的脱节，这终究是短期间的事情。
>
> 同样，在二三年间，所见到的国民经济方面的总规划，有自上而下的重工业的技术规划的宏伟规模与执行中的坚毅意志，可是从政治政策方面充分发掘一切潜在能力，从而使生产发展的速度加速一事，看不清其间的脉络。1955 年，藉着合作化与丰收，藉着国际关系的新的动向，这看出来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一切是联系得如此巧妙，如此艺术。这是毛主席的亲自参预与集体智慧发挥的结果。
>
> 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
>
> 伟大的中国的人力，终究会使中国获得难以置信

① 顾准：《顾准党校日记》，未刊稿，第 17—18 页。

的发展速度，困难只在于技术人才，而这一点兄弟国家会予我们以帮助，十年之内，大批新人也会补充这个空隙。可以预料，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大学生将达一百万人以上。那时资源方面的资料也会比现在积累得更多，我们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速度决不会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星期日在家时与采秀讲到，现在比以前更为热爱这个国家了。个人干些什么是十分不重要的事，肯定的说，总是有事情干的，再不然，埋头读书一事，在最近三五年也是必须干的一件事。国家的发展，与其面貌之将变得一天天难于辨认，这才是最大的事。[1]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并未如顾准预言一般，健康发展，顾准本人的命运难卜。

不过，顾准此时对中共的革新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中国之避免教条主义毛病一定比苏联是要快些。原因是得要快些。原因是苏联走在前面，而我们年轻一代，经历的革命事变多，丰富我们的历史智识的过程是更短的。五四前后，中国人多么大胆勇敢的抛弃一个又一个的陈旧渣滓，在思想上接受新东西的本领又是多么热心，理论思考的能力，自从掀掉了孔家店这一座大山以后，又是多么汹涌澎湃的发展起来，这些都会预示我们今后的路会走得更快的。"[2]

① 顾准：《顾准党校日记》，未刊稿，第88—89页。

② 顾准：《顾准党校日记》，未刊稿，第40—46页。

一年的党校生活很快便结束了。顾准离开建工部，来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6 年 9 月，顾准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劲夫（1914 年生，“文革”后任国务委员）接待了他，张劲夫有意让顾准当经济所副所长，但顾准谢绝了，他想摆脱行政事务，静下心来搞研究工作。其实，顾准第一次进经济所只呆了不到两个月，即奉调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资源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副主任。对此，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的吴敬琏（1930 年生，著名经济学家），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顾准 1956 年和 1962 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

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初来的时候，担任我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留下的经济学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的（案：1962 年顾准重返经济所后也进行了不少会计、经济学著述）。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

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企业改革。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平，所以可以说对顾准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①]

顾准撰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虽然发表于1957年《经济研究》第3期（当时该刊为双月刊），但早在1956年，顾准在中央高级党校和经济研究所时，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

触动顾准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研究，是他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启发以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刻反思。酝酿时间较长，正式动手则开始于1956年9月以后。为了写好这篇《试论》，他曾与好友孙冶方多次交谈请益，由此

① 参见刑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4期，第50—51页。

演绎了一出“学林佳话”。

1956 年上半年，顾准已经认真通读了《资本论》，这时他与孙冶方时有过从，有一天，他向孙冶方指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7 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顾准和孙冶方通过见面和电话交谈，相互启发，碰撞出可贵的思想火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试论》和《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两篇文章。因此，顾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确实较早。由于顾准不幸于 1974 年早逝，顾、孙的学林佳话的主角只能由劫后幸存的孙冶方来“担纲”。

事情是这样的：

> 1982 年 9 月，孙冶方抱病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83 年 2 月 22 日，孙冶方溘然长逝，死后备受哀荣。
>
> 孙冶方临终前，交代后事时，一再叮嘱他的两位学生、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同志：将来替他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把刊登在 1956 年第 6 期《经济研究》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的后记原文附上，不能遗漏。原来，他

在后记中写了四段话，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的笔名）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证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问题作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性问题对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对于孙冶方临终嘱咐的这件事情，张劲夫同志曾以《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①]为题发表文章，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提出过他的看法，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指《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引者注）时未附上这一后记感到有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上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价值规律”在今天听来，是一个连中学生也会耳熟能详的名词。然而在50年代这样受传统思想禁锢的时候，却有人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冲破束缚，真正认识并且重视价值规律，的确是一桩惊世骇俗的事情，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可是，在当时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洪

① 此文发表于1993年7月9日《文汇报》。

水猛兽”，无怪乎受到各方面的无情批判与指摘。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的“异端”，小平同志1984年在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①]而顾准、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实在具有“超前”意识。[②]

顾准在《试论》中对下述观点，颇不以为然：有些著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被两种所有制的交换引起的；说什么作为商品的产品具有价值，不作为商品的产品就没有价值，或只具有价值形式。他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不无感慨地说：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过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没有提到过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指明社会主义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

①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91页。

② 参阅：罗银胜《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与顾准》；《立信学刊》1998年第1期，第50—53页。

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①

顾准的上述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应该赞同顾准的观点，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展。江泽民同志说得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②

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筚路蓝缕，薪火不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56 年 11 月，顾准到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任副主任，其时主任由副院长竺可桢兼任。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气象、地理学家。他们两人在综考会共事期间，配合默契，堪称党内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典范。

1957 年，顾准等人与苏联科学院生产力配置委员会联合进行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就是这次考察活动为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埋下了祸根。据吴敬琏回忆：

---

①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张问敏、张卓元、吴敬琏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 2 月第 1 版，第 50 页。

②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4 页。

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都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采取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谨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行记下来，报到北京去。正赶上“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时也因为“严重右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顾准的具体过程，只知道在科学院范围内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①

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被迫下乡劳动。1958 年 5 月上旬，顾准来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从 1959 年 3 月至 1960 年 1 月，顾准又随中科院部分“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左”字开口，“斗”字当头，生产下降；“饥饿——浮肿——死亡”，乃至饿殍遍野，满目惨象，已经公开出版的《顾准日记》收录了他的《商城日记》就是这

① 刑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百年潮》1997 年第 4 期，第 51—52 页。

“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1]。

披阅《商城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其中震撼心灵的巨大力量。正如上海一位作家沙叶新撰文所说：“顾准正是本着‘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察家’的精神，使他的日记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那段悲惨的社会史，也真实地记录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苦难的心灵史。使人读后心颤不已，泪流不止。”[2]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灾害时期，河南信阳是全国出名的重灾区（《人民日报》曾作多次报道）。顾准留下的《商城日记》，记录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时刻——1959年冬季。

在那高唱“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实际祖国上空回旋的却是“饥荒奏鸣曲”。《商城日记》的一大主题，就是记录了当时农民和劳动队员的饥饿问题，至今读来惊心动魄。请看：

>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
> 刘行芝的父亲死了。
>
>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
>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
> 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还有多少人死亡呢？

---

①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0页。

② 沙叶新：《泪眼读顾准》，1997年12月3日《文汇报》第8版。

学会饿肚子……（1959年11月4日）[1]

“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1960年1月9日）[2] 他还强调：“确实，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这是区别家雀与海燕的东西。”（1960年1月10日）[3] 同时，他曾写道：“高尔基还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数，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日）[4]

顾准是一位热爱真理、尊重事实的思想家，是民族苦难的见证人。俄国作家萧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时代“畏惧是当时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我也摊上一份”。因而可以设想，“顾准是人不是神，可能也有畏惧，但他还是说出了真相。我忍不住想象顾准当时的情形：一个人在异乡，远离妻子儿女，饱尝思念之苦。寒冷，饥饿，写日记要借写思想改造笔记作掩护。写了又写，若被发现，则罪加一等。但如果不写，顾准将不复为顾准，良心不复是良心。”[5] 但是，有良心的顾准，正因为洞察一切，而备受磨难。

《商城日记》对时事政治的评论，无隐而恣肆，充满忧患意识，因而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比如：

顾准针砭当时的“反右倾”，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从外

① 《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2页。

② 《顾准日记》，第105页。

③ 同上书，第70页。

④ 张卫民：《苦难与良知的见证》，《博览群书》1997年第11期，第32页。

⑤ 张卫民：《苦难与良知的见证》，《博览群书》1997年第11期，第32页。

面来的，上面来的，所以问题特别大。从下面看，反右倾鼓干劲，声势浩大。其实正如战略投降所举实例，色厉内荏。我曾估计局面要变，前三十天昏昏沉沉的，对此思考不周。清醒过来，考虑一下，局面非变不可。”（1959 年 11 月 1 日）① 又说：“大会堂在开群英会，趁粮食还有，今冬大抓水利，这都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要与本钱。过此以后，又将如何？”（1959 年 11 月 4 日）②

> 1959 年 12 月 6 日记：按照苏联的现阶段所提倡与反对的伦理观念而言，可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偷盗小帐是不可免的。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的畸形。
>
> 如此而已。
>
> 应该说老实活。那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史前期而已。③

顾准在这里真是“一语中的”，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日记中如此记载还有不少，恕不重复。

1960 年 2 月初，顾准结束了在河南的下放劳动返京，不久

① 《顾准日记》，第 11 页。

② 同上书，第 13 页。

③ 同上书，第 37—38 页。

又到中科院所属的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帮助工作，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在孙冶方等人的关心下，顾准于1962年5月，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孙冶方非常欢迎顾准的到来，将他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为他提供十分优越的科研条件，给他的任务是会计研究。几年后在“文革”中，顾准写自述时说：

>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五月上旬那一天来所，见孙冶方报到，谈话完毕后到政治经济学组，然后陈德全同志把我带到四楼31号，告诉我这里给我准备的单人办公室，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来到经济所搞会计研究，并不完全合乎我的理想。可是这到底是经济所，是六年前我企求进来、已经进来，因为不想当所长而不得不离开的“和尚庙”或“神圣殿堂”，几经曲折，到底还是进来了。这里是研究工作的环境，它比我前四年抓时间读书的环境多么不同！这不过是第一天的感受。在这间办公室耽的时间愈长，这里的优越性愈为明显。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对待我，我在这间办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人民大学找来的一些会计书籍和期刊而外，我还埋头读了几本这里那里借来的、前所未见的经济、历史著作，译熊彼特的书（案：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就是这最初的一二个月中动的念头。[1]

[1] 《顾准自述》，未刊稿，第336页。

孙冶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专家型领导，所以他为顾准提供看来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工作环境，并不出于私人的感情，而是他懂得顾准的价值，顾准思想的重要性。在当时乃至今天仍然是国内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经济所，顾准的心情是舒畅而愉悦的，对此，他十分感激孙冶方，毕竟这里与下放劳动的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有人在“文革”中也说顾准在经济所“心情舒畅”，确亦如此。

顾准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埋头工作，决心在会计研究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想利用这个环境来继续自己的探索，但是这是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探索不成功，不想去影响别人”，并要“在经济研究上作刍荛之献”[①]。因此，顾准重返经济所的两年多时间，并未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会计研究，还作了大量经济研究和翻译工作。

如顾准自己所述：“初期，我花了约一年时间，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又经济所的环境，决不是在农村劳动抓业余时间来读书时那种孤陋寡闻状态，这里可以读到外面无法买到的期刊《译丛》、《动态》，可以读到学部的《外国学术资料》，可以读到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各种期刊和资料，还可以读到外文期刊，还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仅以政经组的学术讨论而论，在扩大思路方面的好处，就是闭门读书时期无法想望的。这样，在经济所，我恢复了和实际经济的接触，恢复了和经济学界的接触，尤其在后期，即1964年内，我又搞起经济研究，写了价格讨论会的两次

① 《顾准自述》，第337页。

发言稿，写了内部研究报告《粮价问题初探》等。”[①]

熊彼特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生于1883年，是奥地利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人称他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熊彼特是学识最为渊博、思想倾向最为复杂的人物，他是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来到人间的，同年诞生的还有凯恩斯。在思想的深邃和著述的丰盛方面，熊彼特是凯恩斯所无法企及的”[②]。顾准翻译的熊氏著作，至1979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在经济所期间，顾准的会计研究也从未间断。鉴于会计这一门学科，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也用得着，而当时又面临着提高和改革的形势，顾准虽然脱离会计实务已达20年，然而他对会计理论和技术早已烂熟于心，一旦重新进行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他又驾轻就熟。顾准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顾准结合多年来实际工作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立志编著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学巨著，计划写七篇，后来只完成了一篇，即《会计原理》，加上一部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会计几个理论问题》（两本均在顾准逝世后于80年代初出版），他的研究工作终因遭到政治上的再次横逆和“文革”的冲击，而被迫中辍。

顾准在《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既充分考虑会计技术的细节，也涉及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他要求将社会主

① 《顾准自述》，未刊稿，第335页。

② 张佳平、伍晓鹰合著：《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三联书店，1989年3月第1版，第109页。

义企业会计改革的立足点，放在“成本——利润”计算体系，这无疑是切中时弊的，而绝不是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但是在顾准能够敏锐地作此主张，是甘冒一定风险的。他指出：“企业会计的科目体系，就其基本结构而言，综合了经营基金循环和成本利润计算两者，而这正适合于企业经济核算制的特点。企业会计要从经济效果的观点，尽可能对企业一切经济活动作出经济估价，要网要一切有关的实物量和劳动时间在自己的体系之下，并发展成为一种极重要的经济管理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会计就是经济会计。但是企业会计同时也是财务会计，因为它负责管理日常的货币资金收支，而从经营基金循环和成本利润计算出发，也容易拟定精确的财务计划，作出精确的财务计算。”①

同时，顾准还强调：“作为经济计算体系的会计，必定同时是作为经济管理工具的会计。因为会计计算的结果（会计报表）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过为经济分析提供分析资料的工具，只有经济分析，才能检查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才能对经营生产过程作出总结，才能找出改进工作的途径。”②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顾准的一番苦心与梦想，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得以实现。

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已在经济所展开。运动的矛头直指顾准、孙冶方、张闻天（时任特约研究员）。当时，康生、陈伯达欲把他们打成“反党联盟”，对他们反复批判、揪斗。本

① 顾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来，对学术问题展开正常的论争和批评，是完全允许的。这些作者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正是切中时弊，其基本观点至今仍然闪烁着夺目的光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顾准从 1956 年开始，就注意到市场经济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具有超群的政治眼光。

顾准等人及其文章的命运，不是一个人及其观点遭受磨难与挫折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受到的磨难与挫折。后人应该牢记这个教训。

不久在 1965 年 9 月，顾准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接受劳动改造。

1966 年下半年，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顾准在劫难逃，他被造反派揪回了经济所机关，这时他已经不能回家，遭受了妻离子散、家人远离、百般打击的无情痛楚，但顾准仍然“九死而不悔”，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

起初几年，顾准除了参加各种批斗会、游街、监督劳动，还要不停写检查交代、罪行交代等，甚至还要不停地接受各方面的外调。从如下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顾准品德的高洁。

据顾准本人回忆：1967 年三四月起，外调逐渐增多。1967—1968 年冬春达到高潮，最多时一天接待过三四起。外调内容，属于 1940 年前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的约占一半，1940 年以后也不少……我自己，羞于说我的经历，有那一二次，我也想说说我的“故事”，他们连听都不想听。如果我说《沙家浜》（案：“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之一）的县委书记是我们一起搞起来的老战友，他们也许还会嘲笑我这个右派想攀附烈士、英雄的英名来给自己梳妆打扮哩！——既如此，我也就乐于把记忆

深深埋葬起来不去触动。现在，每天有人来调查，不回忆不行，有时简直是生活在回忆的世界里了……我对外调人员用"老实交代"的辞句来询问过去的历史，就会发生强烈的反感……有一点是我始终坚持的：凡是我知道的事，我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陈述。"①

即便如此，顾准还常常被外调人员斥责呵斥，由于有时回答"不知道"，竟被认为态度恶劣，动辄发火喝令顾准"滚回去"，这样谈话不欢而散，但是后果却是严重的。因而他常常会因此而挨打。曾经身临其境的经济所的同事赵人伟后来追诉道：

在"文革"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外调人员向顾准调查他以往同事们的历史问题，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因不能迎合某种需要而挨打，但他决不通过胡乱咬人来求得个人处境的暂时改善。②

顾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伟人，即使挨打批斗，他也情愿不说假话，他的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战友心中。

就是"文革"如此残酷的环境，顾准还是孜孜不倦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等一系列问题，心中牵绕着"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大问号，从他所记载一份书单中可见他临危不惧，从容钻研的气概：

从 1966 年 9 月起，到 1968 年 8 月监管开始为止，

① 《顾准自述》，未刊稿，第 375、377 页。

② 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改革》1998 年第 2 期，第 59 页。

我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

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 年 8 月监督开始搁笔。①

透过这张书单，可以窥见顾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感兴趣的，只是运动要找到他，使他受迫害。他博览群书而非食古不化，他的目光远大而视野开阔；学有所得、精益求精，由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益发清晰。这里补充一点，由他翻译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一书，在他逝世后，于 1984 年由商

① 《顾准自述》，未刊稿，第 374—375 页。

务印书馆出版。

不幸的是，令顾准十分难受的事终于发生了，1968 年 4 月，不堪磨难的妻子汪璧自杀身亡。这一噩耗，过了一年多，才告诉顾准。此时已是 1969 年 11 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全部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1969 年至 1972 年，顾准开始了艰苦的干校生活。

在干校期间，顾准始终是思想上的强者，即使写写交代，“改造表现”好一点，至少是想少连累家属，他没有低下他高傲的头。他在 1971 年的日记中写道：“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因而他发誓：“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①]所以“去他妈的自满情绪！”可能是他的真实心态。

吴敬琏也是 1969 年与顾准一起下放干校后，才对顾准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从此结为莫逆之交。据吴敬琏告诉笔者，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吴敬琏从顾准那里获得很大的教益，这对他以后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方法以及为人处世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顾准正以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的身份，在劳改队从事体力劳动。顾准把身受的侮辱和损害视为身外之事，在劳动之余仍然一意不乱地阅读学习。而吴敬琏则因“怀疑康生”获罪，被定为暂不戴帽子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打入劳改队，他在顾准的启发和帮助下，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并博览群书，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广泛讨论文革的发生，品评古今，虽然两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

① 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61 页。

却因为能够互相启发而感到无比欣慰。[1]

现已问世的《顾准日记》，第二部分即是《息县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顾准从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从"北京—东岳—明港"的经历，主要的内容是学部干校的生活实录，从中已闪烁出后来顾准在与其弟通信中所阐述的那些独立思索与见解。这些日记，不仅是顾准思想形成的心灵轨迹与政治文化背景，而且是特定的荒诞时代的真实反映，一个民族遭受的"痛史"。

这份日记仅是顾准苦难生活的一个片断，中间有对劳动改造的记录，又有对共和国命运的忧思。有一种舆论，对《息县日记》存有反诘，认为观照出"两个顾准"（林贤治）[2]，又谓是"伪日记"（沙叶新）[3]，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顾准就是顾准，世上只有一个顾准，日记中某些假话、空话，只是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须知那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你得随时应付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你头上的突然袭击，所以读《息县日记》恐怕要注意到这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份日记中，顾准决意告别会计学。早年，顾准是以会计学研究知名于上海滩，年纪轻轻就是一位会计教授。在干校劳动时（其实已是他的晚年），他认为会计学固然重要，会计事业是永恒（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取消经济核算），但它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在顾准眼里，紧迫的问题是社会和现实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建

① 根据1989年7月4日采访手记。

② 林贤治：《两个顾准》，1998年2月6日《南方周末》，第16版。

③ 沙叶新：《泪眼读顾准》，1997年12月5日《文汇报》，第8版。

设的道路如何走。

顾准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①]为什么呢？在同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理由：“回忆1968年8月前读书二年，1968年12月起释卷，迄今也已二年半左右了。一旦摘帽，方毅那里信是要写的（案：顾准准备致函方毅，是想建议国家成立总会计局），关于会计、管理的‘文章’则不准备写了，因为实际状况的变化，据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而且今后我究竟在哪一方面有所效力，尚不确定。会计、管理固然是一个方面，倘若沾手，会占去我全部精力，1963—1964一年间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现在想想我几章‘会计学’草稿，实在一无是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还确实要有一个班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准备长期搞下去，并不是‘浅尝辄止’所能解决的，这样，陷下去容易，拔出来就难了。”所以，顾准打算先从事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他继续写道：“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笔来了，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所认识，还必须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16—17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二个拳头打二个人，甚至妄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么？”[②]

这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顾准仍在不倦地思索。

① 《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73页。

② 同上书，第239—240页。

稍许堪慰人意的是，1972年顾准随经济所人员一起返回北京后，所处环境略有改善。据骆耕漠回忆，别人都在忙于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所以对顾准等人的看管已经不是那么严了。从这时候起，顾准继续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他争分夺秒，想要彻底研究东西方的历史，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的角度来审视近百年来在中国发展的这一切。

顾准系统地阅读、反复地思考，“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1] 王元化的这番话于十年前的1989年，至今还是发聋振聩。他的评价并不过誉，随时间的推移，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回京以后，顾准有家不能回，他只好蛰居建国门内5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八号楼。由于长期的煎熬与迫害，造成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据当时相处一住的吴敬琏说：“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

[1] 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509页。

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① 就这样，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

从《顾准日记》我们可知，1974 年 2 月 12 日起，顾准开始撰写希腊史笔记，即《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他去世后 198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顾准文集》。整个写作过程，大概持续了三个月。它虽然是一份读书笔记，却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笔记共分六章，顾准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未及完稿，便不幸病逝。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对许多似乎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中，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

比如，顾准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他通过严密的分析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其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语）截然不同，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虽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②

现代西方文明因袭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这已为举世公认。早在干校期间，顾准便立志研究希腊史，没有经过多年的积累，1974 年他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的。而他所做的一切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服务于自己立下的下列目的：

（1）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

① 吴敬琏：《何处寻求大智慧》，三联书店，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380 页。

②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 12 月第 2 版，第 23 页。

义；

（2）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

（3）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顾准沉潜下来，默默地从事这一艰难费力的研究与探索呢？与顾准相处达十年之久的吴敬琏对这一时期的顾准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我想，一个人只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插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终于写出这部连西欧史专家

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①

现存的《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完于1974年10月17日，两年时间，记载他读书的轨迹。他读了《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日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述》、《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考古》、《国外科技动态》、《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食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西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以上书目只是顾准阅读的一部分，仅此可见他之勤奋好学，涉猎之广，令人叹服。其间，还翻译了大量外文文献，与弟弟陈敏之秘密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陈敏之在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说：

---

① 吴敬琏：《何处寻求大智慧》，三联书店，1997年3月第1版，第386—387页。

“这本集子是作者（案：指顾准）和我 1973 年至 1974 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 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 年 11 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 年 10 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 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接近 10 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诉我是‘五一’（1973 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陈敏之接着还说：“1972 年至 1974 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语），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作这些笔记的

主旨。”①

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可以看出在顾准眼里，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为了破除旧世界可以采用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因此，顾准昭示人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②

顾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演变，他说过：“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在这篇《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更进一步深刻而尖锐地认为：“马克思当然不满意雅典存在着奴隶这件事，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金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这是不待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实现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

① 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28页。

② 《顾准文集》，第424页。

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顾准接着指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①话说得可能有点尖利，但是的确是事实。

顾准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不会以忧国忧民之心，以其胆识、智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从彻底经验主义转变过来。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强调的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都是在充实和丰富马克思的理论。

早在1989年，王元化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后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编集自己

① 《顾准文集》，第256—258页。

> 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是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①]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②] 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峰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③]

---

① 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07 页。

② ③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507—508 页。

顾准的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曙光说得好:“读文集比读专著好,文集是作者思想精华的荟萃,专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被兑了白水，像被稀释的醇酒。”他对《顾准文集》非常推崇:“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一个高瞻远瞩的瞭望者姿态,在20年前讲出了我们现在有些人未必理解或接受的东西。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问题在今天看来,现实意义仍然很大。”①

的确顾准的这本书文字凝炼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发人深思。

顾准拖着病躯，顽强与死神赛跑，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一部“真的书”，正如钱理群在1998年第5期《东方文化》杂志发表的《鲁迅与顾准》一文中指出:“正是为了反抗精神死亡，我曾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郑重推荐《鲁迅》与《顾准文集》，我这样写道——这是本世纪两个‘真的’写的‘真的书’。”② 正因为如此，顾准英灵不死，顾准精神永驻。

1974年11月初,顾准实在病得严重,被送进医院治疗,11月中旬，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讨论，正式宣布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

临终时刻即将到来，顾准显得十分冷静而理智。据吴敬琏回忆:“因为大夫在查房时用英语说明顾准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在这以后，他把我叫到医院去，非常冷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久就会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动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

① 原载1995年7月15日《中华读书报》，第2版。

② 参见1998年10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第2版《书评一角》。

了。他说，我认为中国‘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来东西报效国家。”

在同篇文章中，吴敬琏谈到顾准的最后日子时说：“后来果不出顾准所料，他很快就因为癌肿堵住了气管而说不出话来。入院才两个月，已告病危。也许是预感自己行将不起，有一天，顾准让人带话给我，……希望我能去陪他。当天下午我去医院，这时的顾准已经处在临危状态，癌肿几乎把气管完全堵死，他只靠全部力气从高压氧气瓶中抽进的一点氧气维持着一缕如丝的生命。他的兄弟陈敏之为他梳妆完顿以后离去，我独自坐在他的床前，握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够入睡。大约到了 11 点钟，他挣扎着用完全听不见的声音和手势示意我打开行军床休息。他刚刚迷糊过去，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声所惊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电话通知的是陈敏之和他的妹妹陈枫。”“打完电话，我就和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起送顾准去太平间。在推车去太平间的路上，顾准临终前的一幕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①

顾准的忌日是 1974 年 12 月 3 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顾准历年受到的错误处分被彻底推翻，得到彻底平反，重新恢复了政治名誉。1980 年 2 月，在北

① 转引自刑小群：《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顾准寻思录》（陈敏之、丁东编），作家出版社，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359—361 页。

京为顾准和汪璧召开了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顾准的遗著和思想，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在思想界，顾准研究将成为一门久经不衰的“显学”。

（本文的撰写和本书的编选，得到了著名学者、顾准之弟陈敏之先生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

（一）

我们通常所称的职员，是指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机关中从事非筋肉劳动的服务人员。它常常包含了很多的阶层，工厂里面，上至经理、工程师，下至办公室的练习生，都是职员，大小商店里的经理、店员学徒、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报馆的编辑人等等也都可以称做职员。一般讲来，在这筋肉劳动与精神劳动并不统一的社会中，职员的劳动多少偏向于精神劳动的一面，因此职员这一层，多少带有知识分子的意味，虽然事实上店员、练习生、学徒等等的劳动，常常带有很多的筋肉劳动。

职员虽然分布于一切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机关中，但其中最大多数集中于经济机关。公务员、编辑人等等，数目比较少，而且本质上与经济机关中的职员也有不相同之点。特别在上海，职员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是在工厂、商行、交通机关、金融机关之中。在这些经济机关中，职员与工人的地位，实在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同样是雇佣劳动者、同样为资本的利润而服役，

他们劳动的方式，虽然有相当的差异，他们的利益，实在是相互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由于工人与职员之间，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差异相对的减少，由于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相对的提高，工人阶级与职员的关系很密切，这即从那些国家内职工运动中，工人与职员常常共同参加一个职工会，为了争取职工的福利而举行罢工运动时，工人与职员常常采取一致的行动等等都可表现出来。法国总工会的会员中，包括了公务员联合会、保险业职员联合会等职员的组织，法国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几项大罢工中，各业职员与工人更共同参加大罢工，都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至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工人与职员更是密切无间的共同工作、共同娱乐，更无丝毫阶级之分了。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职员，在一切方面的差异与距离，显得特别大些。一般工人，不是仇视职员，便是对职员客气，他们所以仇视职员，是因为工厂里的管理员与办事员，处处帮助经理、厂长来剥削他们，欺凌他们。他们所以对职员客气，是因为他们看到，职员是社会上比他们好似高一等的人物。至于职员呢，除了少数人以外，确实有人把工人看得比他们低下一些，尽管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时还不及工人。这就使得工人与职员，在一切运动中联合起来的可能就会减少，就使中国的“职工”划分为“职员”与“工人”了。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这种情形呢？这是因为中国近代产业的兴起，还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在农村分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多数来自贫农，职员多数来自地主富农。前者所受教育较少，后者所受教育较高，加以我国需要复杂技术知识的熟练劳动者的产业较少，这就形成工人与职员间文化水平的偏差度相当的

大。中国传统的社会习惯，重视长衫阶级，轻视劳动阶级，于是无形中划分为职员与工人两个不同的阶层。自然，在产业落后的我国，职员与资本家及经理之间，所保持的封建关系比较更浓厚些，以至经济上的统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与职员划分开来，以便驾驭职员去统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与职员两者之间的距离。

从社会地位与职工福利的观点上讲，工人与职员是绝不能划分出来的，他们结果会属于同一阶级，也应该属于同一阶级，虽然工人是直接的价值生产者，而职员除最少数高级职员如经理、工程师参加分配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普通一般职员，或者为附属生产过程中价值的生产者，或者为商业资本家保障分取剩余价值。因此，职员的劳动，也是我们这社会的经济构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剥削者。在目前一般讲来，职员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技术知识，这些文化与技术知识，帮助了资本家获得利润，但也帮助了社会的生产。明天，这同样的文化与技术知识，将会发挥更多的社会生产的福利，也会帮助职员工人在文化技术上消灭现有的偏差度。至于就职工运动的利益上讲，职员与工人两方面，合作则互利、分离则大家不利，这已经从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职工运动得到证实，也已从一九二七年来十几年中的运动得到证实，更无须详细说明了。

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上海职员以前，所应该首先做出的结论：“职员与工人阶级是不可分离的，职员是工人阶级的兄弟。”

上海职员的数量，居全国各地的第一位，粗略的估计一下，人数约在二三十万左右，这些职员分布在哪些机关里面呢？

如果从上海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应该说上海职员最初是

分布在旧式商店与外商企业里面的，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还未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只有范围很小的商业资本经济，一百年前，英法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在华经商，上海出现了外商的进出口洋行，棉纺织及烟草工厂，以及他们的金融机关、银行、保险公司等。这时所谓职员，自只有旧式商店与外商企业中的华人职员两部分，而这两者之间，一般讲来，接触很少，根本似乎属于两个社会中间的人物。三四十年前，开始出现了民族资本经济，于是从旧式商店职员和新式学校学生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去，形成了许多民族资本的产业、银行和大商店的职员层；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商业的集中，外商企业与旧式商店也跟着增多起来。到现在为止，“上海二三十万的职员，除了一小部分分布于市政机关、警察机关中外，其他就是分布于洋行、资本主义化的民族资本经济组织和旧式商店中的。”

在上述三个部分中间，大概旧式商店的职员，所占数目最大。因为上海的经济构造，虽然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集中的程度一般说来还相当低，若干种原料与商品的贩卖，以至一小部分的手工业制造，还都在旧式商店中。至于日常供给消费品的许多小商店，更到处都是，所有这些旧式商店的职员，估计起来，人数至少有十五六万，其次，外商企业包括外商的进出口洋行、工厂、交通事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等的职员，所占数额也当在五六万左右。人数最广泛，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民族经济机关，连同工厂、商店银行等等，全数在内，职员数额，大概不过四五万人。至于其他各种机关的职员，不会超过一二万人。

以上各部分的职员，各有不同的出身与来源，从而他们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也各各不同。可是经过二三十年来，中国

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种种变革，使不同部门的职员，比较的已有了在某种程度内的团结一致与联系。

上海的旧式商店，一般可以分成以下各种行业。

（一）属于衣料贩卖的：

棉花业　棉纱棉布业　绸缎丝茧业　针织棉织业　衣料零售业　西服军服业

（二）属于食料贩卖的：

粮食业　茶叶业　地货业　南货业　酱园业　药材及参燕业　饮食业（酒馆饭馆茶食等）烟丝业

（三）属于建筑及装置用品贩卖的：

木材业　五金业　电料业　木器业

（四）其他：

柴炭煤业　日用品（牙刷化妆品等）业　钟表眼镜业　印刷业　文具书籍业　旅馆业　照相业及照相材料业　其他各业

在以上各业行业中，无形中还可以分做高下的等第，职员的劳动条件与待遇也就跟着不同。一般说来，做批发生意的商店比较零售生意的商店范围更大些，职员的待遇也要好些，如棉布批发庄比衣料零售业高出一等，粮食批发庄，比米店高出一等都是。当然大的零售商店常常兼做批发生意，而大的批发店家也时时自设门市部，但其间的区别，一般讲是存在着的，因之，旧式商店职员生活最苦的是一些零售店的店员。

零售店的店员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十二小时以上。早上八时开门做生意，晚上至少八点才能停止营业休息。在营业时间以内，不管有没有生意，总是不能离开店门一步，至多只能看看报纸，不准看书，也不准写信。营业十分繁忙的季节（大概在春秋二季，衣料零售业等秋季大忙），十二小时的工作

时间之内几乎是一刻没有休息的，至于薪工多则每月十余元，少则每月二三元，遇到生意好加上年底分红，中等职员平均每月所得不会超过二三十元，小职员则有一二十元已经很好了。至于生意坏的时候，除了微小得可怜的薪水以外，其他则什么都没有。职员的膳宿，多数由店内供给，膳食多半很刻薄，睡觉大多是摊地铺。

批发商店职员的劳动条件比较好些，营业时间也短些。营业范围很大的批发店家（如棉纱布业，粮食业等）赚钱多的时候，职员有时可以分到相当多的分红，但这类店家在旧式商店中只占了极少数的一部分。

旧式商店的职员，大都要经过学徒这一阶段，学徒的年龄：大半在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左右，年轻的甚至十二三岁就去学生意。进店做学徒的人，多数只受了一些私塾教育或初小教育，受过高小教育的人就很少，照一般的办法，学徒要三年才满师，但时间延长至四年五年的也有，他们在学生意期间，没有薪水，只有“月规钱”，还是预备剪发洗澡的，每月约一二元，多不过三元，少则四五角钱，初年的学徒，要给经理与职员装饭，预备洗脸水，上排门，下排门，倒痰盂，甚至给老板娘抱孩子。总之要起身特别早，睡觉特别迟，但所做的事，与他所要学的东西是无关的，一直等到三年满师了，才派些不重要的事情做，算是升做职员，但是薪金比一般职员还特别低，在我国旧有文献上，描述学徒苦痛的很多，这些苦痛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并没有消除掉。

学徒制度决定了旧式商店职员的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旧式店员们所受到的学校教育特别少，据不很正确的统计。在衣料零售业职员中，高小未毕业者占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初中

毕业的占百分之一至二，未受新学校教育的占百分之十左右。要注意，店员们的来源是学校教育最发达的上海和江浙，而且职员这一阶层，相对的讲，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层的。第二个特质是，旧式店员与经理老板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师生”的名分；不仅仅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这种情形，在封建时代的欧洲行会组织中也是有的，商业资本当它还未变成产业资本的附庸时，便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店员与老板之间，存在着经济以外的关系，自然也是事理所必然。

（二）

因为旧式商店组织只有以上的特点，所以店员与老板之间，有着一种家属的关系。在那里有着一种奇特的惯例，未结婚的店员，或虽已结婚而家眷不在一起的店员，纵在营业时间以外，也不准跑出去。假使有人时常跑出去，那叫做“脚须散”，等于“不守规矩”。老板之所以限制店员出去，是因为店员如果一直留在店内，可以照料店事，同时如果店员们时常跑出去玩，说不定会养成他们挥霍的习惯，弄得舞弊卷逃，这种惯例，在很多行业内施行得很严格，有些行业比较好些，但初级店员与学徒不准出去，则几乎是一律的。

于是店员们的视域与思想，不得不因生活范围而狭小起来，他们终日所见、所做，不外是这一种货物与那一种货物，这一个行市与那一个行市，除此以外，读些“秋水轩尺牍“书算大全”等等已算是勤奋之至了。空间时做文艺鉴赏，则不外乎

《三国志》、《西游记》、《七侠五义》等等之类的东西。他们很缺少世界眼光，其中落后的一部分，则只要自己生活过得去，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他们也不加关心。当然，旧式店员们这一种特别狭小的生活与思想的小圈子，部分的被决定于商业资本本身的封建性质；自从经过了“一·二八”战争与“八·一三”战争惨痛的教训，大部分店员已异常关切国家的命运，特别是这二年来的抗战，所予他们思想上的影响为尤大。

由于旧式商店的零细与分散，店员们不如大产业职员之能在生产中受到合理化的技术训练，他们的群集生活的习惯，也随而没有很好养成的机会。他们一般的文化娱乐生活并不充足，旧历新年假期，看戏，赌钱是普通的娱乐，平常有机会跑出店门时所有的娱乐也不外这些。其中如跑街之类，开旅馆，玩女人的也不少，至于集团的正当的文化娱乐生活，极端缺乏，体育生活则几乎没有。这就影响他们缺乏团结起来，为改良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后，大部分行业的店员曾有工会的组织，也曾经得到生活改善的部分的胜利。几个月以后，这些工会名存实亡，再到后来，索性连仅存的名义都取消了。自此以后，长长的十几个年头中，旧式的店员没有任何的职工组织。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抗敌后援会曾有组织各业员工战时服务团的计划，规定各业同业工会为一总单位，以主席为服务团的首长，各店铺为一基本单位，以经理为首长，把全体店员都组织在战时服务团之中。但计划还未实现，国军即已西撤，两年以来，旧式店员参加到各种业余团体中的为数很多，也已有个别行业，组织起自己的文化娱乐团体来。抗战的火焰，民族革命的锻炼，生活上的煎逼，已经使旧式店员们从商品与算盘，转移眼光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经使他们

从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向团结与组织的道路了。

不能否认，旧式商店职员们是零细与分碎，保守与落后，但在上海职员中他们所占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们不得不成为职员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因为如果旧式店员站在职员救亡运动之外，职员运动就不得不成为残缺不全，充其量只有一半作用的东西了。

因为外商企业大部分称做洋行，所以外商企业职员，习惯上称做“洋行员”。

上海的外商企业，以他们所属国籍来分，可以分做英、美、德、法、日等几个国家，其中英商企业势力最大，美日两国次之，法商企业限于法租界一隅。德商企业限于进出口贸易，工业投资极少。总说起来，外商企业通行文字为英语，法语、日语次之，德国的企业一般的也通行英语，所以德语范围很狭隘，至于少数其他国籍的商行，势力很微，一般讲，并不占重要地位。

外商企业以他们的营业性质来分，可以分做进出口商行，一般工业品制造（烟草、棉纺织等），交通事业（轮船公司），市政公用事业（如电车，公共汽车，电力，自来水，瓦斯等），金融机关（银行、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等等，范围很多很广。其中范围大的外商企业，兼带做多种营业的很多，如英商怡和洋行，有各种进出口贸易、轮船业、纱厂、毛纺织厂等即是。而因为外商企业的资本非常雄厚，营业范围很多，每一企业雇佣的职员数量也很多。如上述怡和洋行全部职工，当在万人以上，除去工人、职员的数目，至少也有一二千人，至于雇佣三四十个职员的进出口洋行，一般已是小洋行了。

外商企业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与他们特别用于

殖民地经营的巧妙办法，因之，中国职员的薪金一般的比较旧式商店要高些，但除固定薪金以外，没有什么分红之类的额外报酬。同时企业内管理十个初级职员的高级职员大都用洋人而不用中国职员，洋人的薪水都用外币（金镑美金等）计算，折合国币后，比较中国职员的薪水要高出四五倍，多至十几倍。外国职员地位既高、薪水又大，日常享用，中国职员是望尘莫及。而公事上对于中国职员的颐指气使，实足显出洋大人的威风。这样一种管理方法，使中国职员一方感到洋行员的生活比华商机关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做事情；另一方面，高的职员既多用外国人，这使中国职员永久处于被指挥的地位，技术的掌握都在外国人手里，来防止他们这些企业的“太阿到持”。自然，这种情形，不仅在上海、在香港、印度、东北都是完全一样的。

为了外商企业通用英语、法语、日语，中国职员应该学习一些外国语言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职员，所以外国人在上海设有特别的教育洋行员的教育机关，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的格致公学，聂中函公学，华童公学与若干私立的学校，如圣芳济学校，一些什么英语，专修学校等等，都是训练洋行员的机关，某些教会学校也尽了这些使命。法租界有许多法商的企业与工部局巡捕房等机关，需要通法语的洋行员，于是有了一所中法学校与震旦大学。所有这些学校，除了教会学生以英语法语与一些不能算做专门技术的专门技术，如打字会话等以外，其他关于中文的教材料便尽量采用四书五经等东西。凡关于近代我国民族运动的材料都尽量避免，上海的洋行员，多数就是经过这些学校特别训练出来的。

上面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洋行员，他们的出身，与所以会

去受那些特别训练的机缘，也表示出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一般的说，洋行员中年轻的一代，他们的亲属中，总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洋行员，或者是外国人的仆人，马夫、阿妈之类的长辈。他们上一代的亲属曾经给外国人做过事情，于是，或者是外国人“眷念”他们的功绩，给他们的子弟以上进的机会，把他们送进洋行或者送进训练洋行员的机关。有时是他们上一代的亲属为子弟谋出路，于是特别把他们训练成为一个洋行员。所有外商企业，并且采用了与旧式商店同样的选拔职员的方法，他们大批吸收会讲几句英语的、家庭非常清寒的年轻人，做类似仆人的练习生适当的洋行员训练，但做了几年以后，就提拔他们做职员。这样初级职员的薪金都极其低，做了七八年事的职员，薪金才不过三四十元。大规模的洋行，分工很精密，初级职员的职务，不过是些机械的工作。高级职员即多数是外国人，中国职员是自无须很好的技术训练，升仆人为职员，在外国人看来既不会降低办事的效率，又可以节省经费，还可以使职员十分感谢外国人提拔的恩典，不应说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方法吗？

经过上述各种训练之后的上海洋行员，便形成了若干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懂得外国语，他们在大产业中做职员，但他们不能掌握职业上的技术。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创造出来的办公室中的劳工，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又阻止他们学习资本主义中一切优良的科学方法；第二，因而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的都不高，他们虽然懂得外国语，但是他们绝不会利用这工具去学习，甚至外人特别办的他们自己的机关报与杂志，如字林西报与商业与金融（Finance and Com eice）也不会读。他们一般的对于国际贸易、金融、产业等等，都没有什么了解；第三，

他们自己对于外国人有些愤怒，但生活上对于外国人的依赖性很强，民族革命的意识不很高；第四，因为几十年来外商企业在华始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因为国际资本强力的支持，企业的倒闭破产，很少听到，形成他们自己职业地位相对的稳固，因此幻想他们的职业，可以十年二十年的做下去，于是进取心比较少。要是说有进取心吧，只有在他们刚进洋行的时候，拼命再念些英文，上海人对于洋行员有一个很带侮辱性的称呼“洋行小鬼”，实在是指以上各种特点而言的。

（三）

由于所影响于洋行员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一般的，他们都在自己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因而带了另一种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不大关心。但因他们与外国人生活享受不均的强烈对比，他们大部分收入很低，家庭负担很重，于是这个月的收入，上个月已经花完。每到发薪这一天，买东西所赊的帐，零星的借款一还，薪水已经完了，下个月开始，重新再借债过日子，至于收入比较高的人们，开房间、打麻雀、跳舞，也是今天不管明天，于是据说借印度人“印子钱”（极厉害的高利贷）的洋行员为数并不很少。

洋行员的业余生活中，群集生活也占相当的地位，若干大洋行中，职员人数较多的，常常有些体育的组织，打球队之类，但规模较大的文化娱乐组织的一般较少，应说洋行员的群集生活，比较旧式商店职员要多些，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也大些。这

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固定，也比较短的缘故。

洋行员生活上的以上特点，在经过了二次上海战争以后，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八·一三”抗战一起，虹口、杨树浦、闸北、南市各地居室被毁，财产损失的很多，而三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各国在华贸易与投资的大量损失，所给他们失业的威胁也是百年来历史所无，深刻的民族觉醒与严重的生活威胁，已使洋行员不得不卷入抗战救亡的漩涡中去，这是洋行员阶层中新的现象。

严格的讲，职员运动在洋行员方面的发展，也已经有了相当时期的历史，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几次大罢工的时候，上海个别洋行的职员曾参加了这一罢工运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左右，上海洋行员曾有洋行员抗日会的组织，“八·一三”组织以后，上海各外商企业的职员参加募捐救济，救护的为数很多，到了现在，十余年来民族革命运动的传说，相当深入于洋行员这一阶层，自觉的起来进行救亡的职员运动已经成为普遍，并且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了。

由于我国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商企业及其雇佣的职员为数极少。特别上海是英美各国殖民地经营的中心，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武装占领了江浙各地以后，对于上海及其附近的“开发”会特别加强起来，这就使职员运动中洋行员所负的责任特别重大，应该说洋行员本身具备着大产业中锻炼出来的具体观念，他们不是零细分散的一群，他们特别有可以组织起来的一切前提与条件的。

在外商企业机关中，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日商机关职员。一般说来，日本在沪的经济势力，不如英美商那样的根深蒂固。战前日本在沪经济机关，势力特别大的是纱厂，其次是进出口

贸易，其他还有航运业与银行，其他如英美商特别占优势的市政工业，地产投资，烟草工业等．日本人没有很大的势力，二十六年十一月国军西撤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纵然用尽方法进行他的“中支经济振兴”设立了华中振兴会社，但由于它脆弱的经济势力与我国工商界的拒不合作，成就还极有限，其中只有没有了的苏浙内河航行，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等比较还算有些“成就”。日本帝国主义在沪经济势力的脆弱，尤其因为在沪的投资少，因而上海日商企业职员人数，也比较占少数了。

上海日商企业职员人数的稀少，还因为日本在沪经济机关，使用日本的人比例较之英美商人使用英美人的比例大，日本帝国主义又一般说是帝国体系中落后的薄弱的一环，他们对华的经济特别穷极无聊，所以它在上海经济力量虽然较弱，而日本在沪侨民，即在战前，也居外人在沪侨民人数的第一位，于此可见日商机关的中下级职员，也多使用日本人而少用中国人，估计起来上海日商机关职员，总数不会超过一万人。

这不到一万的日商机关职员，又可以分做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抗战以前已经设立的日商企业职员；另一部分是战事发生后日本所夺取的我国民族工业的职员。前一部分在战事发生以后，许多英勇的牺牲职员，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其中也有很少的一部分落后的人们，在国军西撤以后，到战区内跟了日本人去发横财。日本在沪的华人间谍，就有许多由这类人充当。至于我国在沪的民族企业，被日本人用武力接收的，接收时都曾有过英勇的全部撤退的事情，如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上海电报局、上海市银行等，前两个机关日本人在接收时，职员全部退出，以致后来到无法经营的地步，后者因为职员撤退缘故，日本人无法接收。这些被接收的机关，与战后日本人机关新录用

的职员，与旧有继续经事的职员，大多数是为了无法维持生活，才不得不勉强为日本人工作。他们受了抗战的血的洗炼，必不免的将成为总反攻时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上海的有力一个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一般说是从外商企业与商业资本二者中孕育出来的东西，她的历史最多不过四十年，比较大规模的发展，还是从一九一四年欧战以后才开始的。就在这短短二十五年之间，民族资本还遭受了不少的挫折，所以纵然在这民族资本集中地的上海，民族资本经济机关的职员，总数还远低于外商企业或旧式商店。

民族经济机关职员，所受的学校教育比较的多。这所谓学校教育是指一般的公立或私立学校，如省立或私立中学等等。大概他们的教育程度，以初中毕业为普通、初中以上毕业的也还不少。自然，其中另一部分从旧式商店转过来的人们，他们的出身与旧式店员无异，不过为数颇少。而需要职员很多的企业，大批招收年轻人当练习生的，练习生的教育程度，有高小毕业也已经很够了。

这一部分职员，比较旧式店员与洋行员，民族观念要深刻些。因为第一，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对于帝国主义有深刻的依赖性，但在许多地方不得不与帝国主义，特别于日本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矛盾，这足以影响与刺激职员们民族革命的情绪；第二，他们中间年轻的一代，曾经亲自在学校内经历或参加近十多年来的反帝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当时确曾震撼了他们，所以他们具有比较深刻的民族革命传统。但以上只是比较的说法，应该承认，民族经济机关中的职员，不过在民族观念上比较洋行员与旧店员进步些，他们一般的意识形态，还是完全小资产阶

级性的。

关于民族资本经济机关职员们的生活情形，还可以分做下列几个部分来说：

一、民族工厂的职员　民族产业资本的职员估计起来不过二三万人，人数分布于纺织、烟草、橡胶、火柴以及各种小规模工厂制造厂中。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在工厂内工作，与工人很接近。另一部分在管理处工作，做的是普通的事务。大的工厂中，发展得比较早的，新职员的录用，都用招考的制度，招考的资格，练习生须为初中毕业，因而职员的教育程度与出身比较的一律。同时那些工厂内部的管理方法，极端资本主义化的也很多。一部分工厂，录用职员依靠情面的也不少，甚至老板是哪省人，职员就充斥了哪省人，这些地方的管理方法，大率不甚严格。

职员的劳动条件，在管理处的大概每天工作八小时，六小时的也有，在工厂里面做事的，因为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每天也要做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的工作，薪水制度各机关不同，有的采取洋行的方法，除固定薪金之外，不另发给分红，有的采取旧式商店分红制度，其中以采用分红制度的为多。

职员的所得连年底所可得的分红在内，有三十元一月薪水的，已经算做中级职员，小职员不过一二十元的薪水。自然薪额高低各厂不同。一般说来厂愈大的薪水愈高，厂愈小的薪水愈低。平均数目，大概：练习生十元以下，初级职员二十元左右，中级职员三十元左右。

上海各华商工厂所处地域距离很遥远，同一行业的厂家又很稀少，因此很少组织行业制的业余团体的，就职工运动的利益讲，同一工厂的职工，应该废除职员与工人的界限，共同组

织各厂自己的职工会，才能发挥强大的力量。

二、大商店商行职员　大商店商行职员，是指新式大规模的商品运输公司与大规模的百货公司而言。我国规模极大的商品运输公司，不过华南米业公司等几家，他们在营业上有足以左右市场的能力，但他们所雇职员为数极少。职员人数最多的，应该首推那几家百货公司了。

上海著名的百货公司如永安、先施等公司，每家职员都在六百人以上。而且因为百货公司最基本的售货员，无须复杂的劳动技术与文化水平，所以他们的薪水都很低。据说有一家百货公司，全体六七百职员中间，四分之一是月薪三四元的练习生，二分之一是月薪八元至十八元的普通职员，就是说这公司中四百五十个职员，每月薪水不到四千五百元，四分之三的职员，平均薪水每人每月不过十元，可见百货公司职员薪水之低了。

这样低额的薪水，即加上公司所供给的膳宿（部分职员不供宿），每月也不过十一二元至二十元。工厂里面，即使是不熟练工人的工资，有时也许比他们高些。旧商店的薪水虽然很低很低，但那里还存在一种封建关系，还存在着一种可以分红的希望，还存在着一种“将来也去开一家小店”的希望，可是在这里是什么希望也没有的，有吗？就是做了一年，加一元半元的薪水而已。

劳动条件，每天工作十一至十二小时，练习生与初级职员，大都住宿在公司所供给的寄宿舍内。膳食由公司供给，但营养一般不很足够。每天作完毕后，进补习学校念书的很多，其余时间，因为没钱做正当娱乐，所以闲荡马路的很多。

三、金融机关　金融机关的职员，如银行保险公司等，特

别是银行，被大家看做很高贵的职业。拿几个大银行来讲，待遇确也很不坏。如中国银行的初年练习生，每月就有三四十元的薪水，可以与小机关的高级职员相比较。行员的住宿，银行又可以低廉的价格供给，甚至每天办公时间前后，有载客大汽车在银行与宿舍间往来接送，行员连车钱都无须耗费。造成的结果，便是行员们一天到晚的勤劳行务，一部分人则过着糜烂的业余生活，多数打牌，少数玩女人。但是如此优越的待遇，究竟是少数。许多大银行的行址很华丽，设备很舒适，练习生每月仅有七八元的薪水，一般中级行员每月不过五六十元的薪水，到底还占多数。比较起来，银行员较之工厂职员自然更舒适些，这舒适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因为银行的当局，比较的注意关于一般金融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也还有部分银行员相当注意职业技术的研究。此外，银行职员的一般文化水准，比较他业职员也似乎高。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缘故。保险业职员与银行职员大致差不多，但各个人的文化气息低些，商业气息高些。就职工组织来说，一九二七年上海曾有银行业职工会的组织，很快就取消了。最近数年，银行保险两业职员的业余团体有很大的发展，到现在止，人数均已达到一千以上了。

（四）

回溯上海职员运动的历史，应该说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时，已经有了先声，那时旧上海的各行业，都组织了职工会，

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并且与工人携手，英勇的参加了闸北的巷战。许多外商企业的职员，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合作进行罢工运动。但这一时期，上海的职员，一般说来是在浩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间，被号召了参加这一民族革命的，上海职员本身革命的自觉，实在还嫌很薄弱的。

一九二七年以后，上海职员在饱受了革命运动的锻炼，与不断的参加了自学校进入职员生活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纵然政治上有了一个很长的沉静时期，上海职员中仍逐渐形成了进步的革命的势力，其间予上海职员以最大的政治刺激的则是一九三〇年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与以后无数日帝国主义侵略与进攻的历史。

“九一八”与“一·二八”两次事变，所予全国民众的刺激是如此的大，以致曾掀起了一九二七年以后所未有的许多城市中的反日运动。在中国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曾不能不使运动连结于国际主义，所以就是这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政治生活，使在小资产阶级中拥有多数读者的《生活周刊》，及其后身《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等杂志，把反日斗争联系到国际主义上来，连同后此创刊的《世界知识》与《读书生活》等杂志，把职员的文化政治教育提到较重要的阶段。一九三三年与一九三四年全国民众，遭受了政治上最苦闷的时间，就在这时候，申报图书馆，与申报补习学校（后来的量才图书馆，量才补习学校）创办了，它对于职员文化政治教育的提高更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华北学生的两次示威行动，卷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空前的高潮，加上过去三四年内文化政治上的基础，使大批的职员，参加了救亡运动。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

职业界救国会成立，上海职员第一次有了他自己的大规模综合的政治团体。直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为止，职业界救国会一直是上海各救亡团体的中心力量。这时候职业界救国会一般说来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与当时一般救亡团体相同，只包含了许多先进的职员，因此范围比较狭窄。第二，它在成分上并不全部是职员，还有许多工人在内，因此可以说这时期的职业界救国会，是工人与职员的综合救亡团体。之所以这时候没有工人阶级的救亡团体，除了当时许多政治上与技术上原因之外，工人阶级与工商界的矛盾比较尖锐，也曾相当阻碍它的成立。

“八一三”抗战以后，上海各独立的职员救亡团体，曾联合组织了“职业界救亡协会”，当时曾发行《救亡周刊》一种。国军西撤以后，公开的救亡工作不得不停顿起来，但职员们自己努力于展开自己的阵地，与工商界合作以进行种种直接间接的抗战工作，自然没有停顿过一天的。

我们假如研究一下过去十几年职员运动的历史，应该指出，一九二七年时代的职员运动，实在是当时整个职工运动的一部分。自一九三七年起，职员运动是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兴起的。它曾经对于抗战尽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锻炼了职员自己。可是在整个这一时期，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做自己主要任务之一，这就使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参加抗战工作，运动本身因而非常狭隘，最近两年，职员运动比较的已特别注意于改善职员的业余生活，因而得到了较大的成就，这一经验，是应该善于运用与善于发挥的。

更应该指出，带有民族革命传统的职员运动，它仍旧不得不是职工运动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目前整个职工运动都服从

于“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也因为职员中间很大的一部分（华商与洋商的工厂职员）只有在与工人们共同行动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因为整个职员层与工人阶级同样是雇佣劳动者，他们与工人阶级在利益上、在组织上是不能分离的缘故。

原载《职业生活》1939年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

远东局势与抗战前途

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已大致形成下列几个趋向：

第一个趋向是由美国所发动的对于中日战争的调停，已经失败，因而美国式的和平至少在暂时不能形成，由美国所发动的对于中日战争的调停，它的公开化始于美国国务院对于九月二十七日王宠惠外长谈话的反响，它发展的最高点是十月下旬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氏在东京的演说。这个调停的发动，在美国方面虽未有正式的建议而只表示了姿态，但现在已经得到日本的答复。十一月一日，日本兴亚院会议议决，收拾中国时局应尊重中国之独立自由，故“新中央政府”，以“自立”为原则。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新中央政府”之建立，不惜在各方面加以援助云云。兴亚院会议的决议，已经十一月四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于是“新中央政府”在本年内即将成立。这一事实，已很明显的表示出：日本对于美国调停的答复是，日本只要“新政权”式的“和平”，不要美国所调停的和平。

第二个趋向是日本已借建立中的“新政权”为工具，开始进行美日英日谈判，借以造成美日英日的妥协。十一月四日，日本外相野村与格鲁大使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两方意见虽然不一致，但发表的公报则是“会议包括全般关系，在互助空气中进行”。美国与日本在目前情况下开始谈判，以及第一次谈判在互

助空气下进行，证明了美日妥协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向来的估计，认为美国远东政策以九国公约为原则，与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不能相容因而在远东的美日妥协不能成就，反而会造成美日矛盾之日益尖锐。但是自从美国修改了中立法以后，在事实上美国已经参加了欧洲英法集团的对德战争，因此他在远东的动作，不得不受欧洲局势的牵掣。换句话说，美国的远东政策会日益英国化，会日益软弱，因此日美矛盾虽不会解消，但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不会像我们以前预想的强硬。日本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在“新政权”这个傀儡上面加上“自主权”的装饰品，以之作为工具，同时向美英进行谈判，甚至不惜以开放长江与珠江来换取英美的对日妥协。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一向看作主持正义的美国，现在可能走向与日本妥协的道路。我们一向看做神圣原则的九国公约，现在可能由美国方面自动来加以改变，改变到接近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原则。

但是美日矛盾纵有欧洲局势的影响，以及日本准备更多让步的新条件，要希望在最近的谈判中得到彻底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在太平洋上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中英美日三方谁也不愿彻底的让步，因而矛盾无法解消，甚至一时的缓和也还很困难。

第三个趋向是苏日关系经过一度缓和而没有缓和下来，以后的局势还将使苏日关系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诺蒙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苏日交换俘虏的谈判停顿了，苏“满”边界又起冲突了，但莫洛托夫的演说又提到了日苏关系的缓和问题。莫洛托夫的演说发表以后，日本方面的反响是，欢迎莫洛托夫的和缓苏日关系的演说，但希望苏联完全停止对华援助。一句话说，在苏日关系中的关键是：日本畏惧苏联，愿意与苏联调整

关系，苏联为了国际外交形势，不愿苏日关系过度紧张，以致驱使日本与英美在远东造成全面的妥协。但苏日关系的全面接近，无异于苏联承认日本对华的侵略。因此，苏日关系表面上缓和，实际上因为苏联的对华援助正在日益增加而且还会日益增加。因此苏日关系在内面是很紧张的。苏联决不希望与日本造成全面的妥协，日本则利用暂时的妥协以减轻苏联所加于她正面的压力，并借此为与英美谈判的资本。因此苏日关系暂时在不确定之中，以后也将继续不确定下去。

远东局势的以上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第一个影响是，由于英美之可能与日本在中日问题上妥协下来，必不可免使中国的妥协派抬头。这回的妥协派可说是新妥协派。老妥协派奉日本为主人，新妥协派奉英美特别是美国为主人，我们认为，假如美国能够坚守九国公约原则，坚持在日本完全退出华南华中华北与东北以后再谈判和平，那么与美国外交的步调一致起来主张这种完全胜利的和平，全国人民没有反对的理由。但如接受美国修正了的，走了样的门户开放原则，在英美分赃以后跟了美国去求得和平，它还是中途妥协，还是自取灭亡之道的中途妥协，这种新妥协派，也将受全国人民的反对。自然，依据目前的形势来说，日本已经抬出了“新政权”，经过日本内阁议决以后，“新政权”虽未建立，也已可视为存在。“新政权”的建立，对于新妥协派是一个打击。因为在建立新政权以后，英美的对日协调要困难些，英美调停中日战争的主张失去了凭借，而“新政权”之僭窃名位，也使妥协更少希望，但是这样的警戒是不得不有的。

反对新妥协派，坚持抗战，自然同时是反对英美在分赃目标下对于战事的调停。但是，只要中国抗战坚持下去，英美与

日分赃不能成功，英美对日矛盾必继续存在。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须善于利用，所以我们在反对英美调停战争中间仍要继续争取英美对华的同情援助。目前的远东局势是如此变化多端，我们要在坚持抗战的原则之下，善用一切利于抗战的因素与力量。

第二个影响是，日本所建立的“新政权”已被赋予“自主”权，这表示日本对华的政治进攻又进入一个新阶段。据目前日本报纸杂志的反映，日本准备给予“新政府”以兵财二权，准备以其他更良好的条件给“新政权”，以此为武器来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这个政治分化的毒计能够收到多少效果，要看“自主”权的大小而定。如果自主权很大，分化的作用自也增大。可是，日本所以必须利用新政权以统治沦陷区域是由于她力量的薄弱，就是她薄弱的力量，又使她不敢赋予“新政权”以过多的自主权。《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田知花信量，一个著名的侵华急先锋新闻记者，代替日本军部声说了以下的主张：

“彼等（新政权人物）常抱和平应为平等的和平之观念。按和平本可为平等的和平，但决不能忘战争之结果，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已失去其生存力量之半。故若以为中国民族可以自力更生，实为中国自身无自省之错觉……中国及中国民众应切记，惟有日本保持其领导权，新中国方得更生……”（十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田知花信量《事变处理与中国中央政权》）

田知花氏这个坦直的声说，我以为是确实反映了日本统治者群的意见的，所有其他一切慷慨的赋于自主权的诺言，不过是“新政权”这个坤角上台时，别有用心的看客们的捧场喝彩

而已。“新政权”名义上保有自主权，而实质上没有自主权，将使日本分化中国抗战力量的政治阴谋无法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是这到底是一个政治进攻的新阶段，而且到底会产生某些用处的。因此，在新局势下的坚持抗战国策，又必须与坚持进步这个政策联系起来。惟有坚持进步，才能完全消灭日本政治分化中国的阴谋，才能保持全国民众的团结统一，才能抗战到底。反之，若中国政治上并不进步而后退，那么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也就没有保证了。

总之，在新环境下的中国抗战，必须以反对任何妥协，与坚持进步为它的基本政策。必坚持抗战与坚持进步，才能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以后，抗战的前途如何呢？这里的关键有两个：第一是日本的国力能够支持侵华战争到多久，第二是国际环境的演变情形。日本的国力正在耗损中，现在还没到崩溃的程度，最近的将来也还不会崩溃。但是在日本经济情形上，最近已有几个重要的标志，即由于她物资不足，与劳力不足，生产力的扩充程序已被阻滞，生产总指数行将趋向减低。另一方面，日本的财政支出在种种因素之下，还在日益增加，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度日本的预算总算至少在一百四十万万日元以上，目前则公债消化已开始停滞，通货膨胀已在走向严重的阶段。因之，日本将在何时崩溃，现在固不可预测，她之已走向崩溃的道路则是确定的，中国抗战的胜利，基本上将建筑于日本崩溃之上。可是，日本的崩溃与中国的增强，会决定中国的胜利，但不会决定中国胜利的性质。决定中国胜利的性质是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我在《阿部内阁与远东局势》（本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一文内说：

“最近三四年来，有两种新的力量已在逐渐发展起来，足以根本变更过去的远东局势。中国民族在战争以前与战争开始后，正在逐渐增强她的力量，种种力量已使日本军阀两年来征服中国的事业逐渐幻灭；而苏联在远东的实力的扩大，因德苏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与第二第三两次五年计划加强远东的建设而日益显得重要。十余年前九国公约签订的时候，这两个因素没有被考虑进去，今天英国所提议的“公正之和平”与美国所提议的恢复远东门户开放的原则也没有把这两种因素充分考虑进去。然而正是这两种因素之日益成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关键，将使中日战争不得不依照以下两种方式来解决：或者是独立解放的中华民国，或者是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中日战争将永不会依照英国式的，东京英日谈判所议定的“东京方式”而结束，也不会纯粹以美国式的门户开放的远东均势的恢复而结束。我想，中国抗战胜利的性质，大概就如上方所指出那种胜利：中国将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也不将再是英美两国的势力范围，而将获得到达完全独立解放的中华民族的那种胜利。因为今天远东国际形势的演变是日本在崩溃下去，英美两国在对欧战争中将日趋衰弱，而中国在增强中，苏联也在增强中。

《中央党校日记》选

1955年10月20日　上课时间　星期四

记录一些脑袋里涌起的问题：

A. 要研究并回忆1949年，二中全会以来，到总路线，到合作化运动的政策上的脉落，并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照印证起来；

B. 详细考虑一下这么几件事：一、统购统销，梁黄叫嚣；二、增产节约，工农联盟的一个方面的调整；三、合作化运动，工农联盟的最积极方面的措施；四、合作化运动中所决定的对“巩固团结中农的措施”，与对农业生产的增产与减产的影响；五、对农村中新投入的资金，与这些资金对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增长的作用，对工业生产的增产的作用；六、对五年计划的修改的影响——a. 一般工农业生产指数；b. 农具（拖拉机）基本建设的速度；c. 与农具相关的工业（例如石油）与交通运输的变化；

C. 自己的思想方法，似乎会抓主流，往往忽略（不是往往，而是习惯的、自觉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D. 我们的五年计划，开始编制时的速度总是“增长率的渐减趋势”，主要原因就是对生产、技术、产品及其原料工具间的联系的知识不完备所致。

经济上的预见性，与规律掌握运用之不足；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资料的年度太迟与储备资料之不足；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不足。——除这些困难，还有什么？

第二个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如何？

10月24日　星期一　晚

今天准备了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讨论合作化问题的提纲。有机会把各项有关文件详细读了一下，这是好的。三四年来，很少这样做了。

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楣。这种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

做思想总结，也算有了一些基础了。

1955年12月16日　星期五　午

昨天听了十二月五日中央会议的传达。现在反保守主义已整个的提出来，过去反盲目冒进中曾反掉了一些积极性，也提出来了。八大的中心是反保守主义，这样速度问题就提到议程上来，过去许多很难解决的矛盾就会逐步解决了。

来想想这些矛盾：

（一）“大规模建设”与失业解决的遥遥无期。曾经想归咎

于人口之多，可是，马尔萨斯理论不是错误的么？提倡节育，可是女人肚皮还是要大起来，而且即使是好像英国0.65%的年增加率，我们也受不了呀？怎么办呢？

（二）工业不发达，可是大量轻工业设备利用率不高，30万机电工人是“吃不饱，吃不了”。据说是因为习惯修配，技术不高，而目前进行的现代化的建设则技术要求很高，则吃不下去云云。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做几百千瓦以至一二千瓦的发电设备的呀，大批城市与农民，依然在中世纪状态，大量机电工人则无事可做。据说是要集中国家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可是重点建设中倒发生了货弃于地的情况。

（三）深山探宝，准备建立现代化工矿，可是交通不发达。交通要等总规划，总规划又要等摸清情况。于是大量人口失业要等建设展开被吸收的，又一齐搁浅在摸清情况这一点上面，于是一个狭隘范围内的规律：设计赶不上施工，变成全国范围的规律了。

（四）发展教育，结果中小学毕业生据说又嫌太多了。

归根到底，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合，下面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

一、广大的中国农村，自鸦片战争以来，连封建式的文景之治，乾嘉之治都享受不到，已经一百多年了。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更是把中国农村搞到一塌糊涂（从这一点说，坚持抗战前水平作为我们成绩的比较是极不像话的）。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农村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应该发挥神话一般的力量，谁看不见这个力量，谁就不能引导中国向前进。毛主席对此提出了问题，这是极其正确的。

二、工业建设，必须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

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还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这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

历史观点是需要的。英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总共才多少人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美国也划入英国经济范围中去考虑，又总共只有多少人口？当然，我们没有大量的处女地，但（一）我们有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后的农村；（二）我们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工业农业的科学技术力量，好好发挥起来，为什么不能出现英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极度繁荣？

那样的极度繁荣，在英国是神话般的速度，也是神话一般的危机混乱来实现的，但总而言之是实现了。我们不会发生这些混乱，起码现在过剩的轻工业设备，机电工人，与中小学生马上能够得到“效力”的机会。再往上去，即使暂时会出现失调的危险，总之这是压迫我们进步的失调，这是一点坏处也没有的。

三、说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不错，若干需要现代技术，而建设又费时间的工业，延迟一些，是靠农业落后吃饭，但必须看到，不仅工业靠农业落后吃饭，同时也是工业深受农业不发达之苦。这就是现有设备与人力之不能获得充分利用。同时也还有一个问题，即许多现代化工厂是在外遣人员进行学习，为什么不能设想，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与人力，充分获得因需要扩大之故，而能在充分生产，大量添加人员之中获得训练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好处呢？这种现象，才真正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建设是输入的，不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

四、另外，工业企业的经营与经济效率，现在讲究苏联标准，这没有什么不好，而且，确实在过去几年中已经获得了这

方面的好处。但在资本主义初期（就算在苏联建设初期吧），就是那样有效率的么？这里用得着马克思主义了，就是效率高低，是被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社会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超过的叫做高，不超过的叫做低，这完全是历史的，不能建立一个什么绝对的标准。我们现在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是什么情况呢？是世界标准的高效率与中世纪标准的效率同时并存，并且还有多少人因其劳动得不到使用而被浪费着。这样，从底上发掘这些劳动潜在力量，首先使农业中的劳动效率发挥起来，然后充分使用各方面的人力，先使大家站到工作岗位上去，有若干个高标准在那里，把低的一步步提高起来，这样做，我们的国民收入，一下子就会提高很多。我们过去是追求高效率，不高的不要，甚至搁起来不让它进入生产阵地，这是非马克思主义，这是教条主义。

当然，这些都是马后炮，片断感觉到的，不能说是系统的思考，而且确实也不是系统的思考。

观察这个问题之被提起，被认识，也必须要有历史观点。

首先是时间的条件。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才结束，抗美援朝可以说是对外斗争，也是对内斗争，它是对新中国的一个考验。农业中潜在力量的认识，这是一个世界上的新问题。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中国跟印度两个，理解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农民，理解反掉了封建压迫后中国农民的力量，特别是中国农民在生产上的力量，即便是中国人，也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而且，人到底是历史的动物。过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有巨大的创造，可是在现代经济建设中他们能够创造什么，怎样去创造，毕竟历史没有给过什么给我们，因此就必须要花一些

时间去认识它，并且也只能在斗争中去认识它。

其次是，认识这些问题本来不能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靠我们自己去认识。恩格斯说得好，思维依存于客观事物，可是思维还不能不从已有的思维方向开始。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组成部分，重要开端）我们自己确无经验，不能不借镜他国。这是因为苏联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成功了的国家。从思维运动的规律来说，从认识的片面到全面，并且，从现有的思维方向开始，又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客观实际，再提高起来，全面化起来，路径是不能不这样走的。

传达只提示了方向，只是开端，具体的方案连提都没有提起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的形成，有一年时间不算太长。可以肯定的是先不讲号召全国，在实际斗争中反保守主义，就是以制订方案一点而论，也还会经历极其复杂错综的斗争。

这一方案的制订，又是在实际斗争中制订的。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方案的制订，已经不是单纯的从几个要求，若干个现代化的大厂，西南大铁道，西北大铁道出发了。而是农村生产，地方工业，水利，交通建设，从下面翻上来。私营工商业的力量全部计算进去。上上下下要翻几个个儿的。也只有这样制订出来的计划，才是真的从中国土壤上生长的计划，不是外来的，不是自上而下灌注的。

一个月之前，听到外面斗争热闹的消息，还不免有怅惘之感。上星期日在家，还不免有寂寞之感。现在倒确是好。理解问题是要有历史观点的，没有牢骚。“我”怎样，目前就是要好好读书，不会像在延安那样“闻捷则不安”了（杜文伯倒有此

情形的)。并且，我深信，不论在哪一个工作方面，我还不会白费。这将近四个月的学习，确实眼界开阔了，就一定要眼界开阔了，才能正确理解问题，将来也能好好处事对人。马克思站在智慧的高峰，他之批评蒲鲁东，并为蒲鲁东做结论，是多么冷静，深刻呀！想想马克思写信谢谢恩格斯寄十五镑给他，对蒲鲁东做这样的结论，真是高超的圣者。我们只是白领工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者，可是也得取法乎上，仅得乎下呀！

(顾准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日记，由高梁提供)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去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货币、价值规律的作用等问题，国内经济学界有很多讨论。我国自1956年全面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研究这些问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作者不揣浅陋，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大家指正。

一、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与两种所有制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首先碰到的是：目前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存在着的、全民所有制与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是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当“两种所有制”被“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所代替时，是不是社会性质已经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而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骆耕漠同志认为[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代替两种所有制可

① 见骆耕漠：《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过程》一文，《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

以较早完成；而分配原则上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过程将在“更远更远的将来才能完成”，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都假定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不考虑“两种所有制”的存在。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存在两种所有制的历史原因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小商品生产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排除的国家内。小生产合并为大生产的过程既没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完成，就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在社会主义阶段或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内完成。两种所有制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联合小生产为大生产的结果，并且是走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因此，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之后，只要社会的分配原则还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那当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在两种所有制并存条件下，两种所有制之间仍然会有产品交换。解决下面一些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否是商品生产，价值、价格、货币等经济范畴的意义如何，都不免要首先去解决因两种所有制并存而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两种所有制并存是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纯粹形式，那么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价值、货币等问题时，先研究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下的情形，再研究在两种所有制条件下的情形，问题的解决也许会方便一些。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大工业生产方面已集中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它的生产占全部国民经济很大的比重，因而进行这样的研究也是可能的。

二、分配方法与核算方法

1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作了明确的论证。为简明起见，可以把这个分配原则用公式表示如下：

（Ⅰ）社会总产品价值＝国民收入＋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

（Ⅱ）国民收入＝消费基金＋积累基金

（Ⅲ）消费基金＝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份额＋非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份额＋不转化为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消费

（Ⅳ）直接生产者所领受分配的消费基金＝他所创造的价值－应比例扣除的（积累基金＋公共管理基金＋社会保证基金＋科学教育保健艺术基金）

关于分配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再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交换将被废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不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动券。

社会主义各国的分配原则与马克思的论证是符合的。在分配方法方面，表面上看来，依然保存了货币，并以相对固定的工资率和物价表，作为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以及消费基金在不同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分配的杠杆。

在这里，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券到底是什

么东西是必要的。劳动券可以是规定领取一定种类一定数量消费品的领物凭证；也可以是不具体规定种类数量，而以某种计量单位（如劳动小时、劳动工分，或干脆仍用元角分这种货币单位）计算的，可以凭以自由选购各类消费品的凭证。根据恩格斯下述论证，它可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 “……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通过金属货币来实行的……可是在公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上，这些货币，绝不是货币，绝不是尽货币的职能。它们成为真正的劳动券……”①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利用货币为分配工具，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具体途径如何。

一、个别企业利用工资与价值形式进行核算。假如没有其他使产品价值与价格差离的因素，那么产品成本、利润及企业缴纳的各种捐税之和，就是产品的价值；

二、工资是劳动者个人领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社会总的消费基金中分配给他的部分。捐税与利润，归入国家预算体系。国家经过预算体系，将这部分预算收入分配为积累基金及公共管理基金、社会保证基金、科学教育艺术基金等等；

三、在社会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工资率与产品价格两者，决定全部企业缴纳利润及捐税的数额，也决定社会纯收入可供再分配的数额，所以也决定了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间、各类消费基金间分配的比例。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页。

、利用上述分配方法，进行下述各种调节是方便的：

（一）当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可以提高工资或减低物价，使国民收入中分配为消费基金部分不致低于应有水平；

（二）社会应用较大力量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工资的提高或物价的减低，应低于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程度，使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间维持适当的比例；

（三）当某部类生产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高于别的部类时，可以降低这个部类生产品的价格，使价格的运动适合于各类产品间价值比例的变化；

（四）当各部类生产中的工资率，不适合于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差别时，可依不同比例调整各部类工资率。

目前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途径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复杂一些，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论到，现在姑且对此存而不论。假定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消费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会与劳动者之间（“公社及其社员之间”），作为分配工具的货币，除掉保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单位名称（例如元角分）而外，按照恩格斯的原则，就是劳动券，而不是别的。

2

采取货币这个工具来分配消费品，还有下列好处，是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所不能替代的。

劳动者及其家属的消费要求可归并为若干类，如食品、衣服、居住等等，这些种类的消费要求是可以统计出来作为计划生产的根据的。但从具体的消费品的品种、花色而言，由于消费兴趣的多样化，人们必然要求自由选购，反对凭证领取。

个人消费要求的满足，很大部分是用购买物品的方法，但还有不用购买物品的形式的，如：（一）住宅的租赁；（二）个人生活服务如理发、洗澡、市内交通、外地旅行、旅馆服务等；（三）文化娱乐；（四）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子女教育费、托儿所费用等等。满足这些要求，不能依靠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只有用货币来支付。

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在我们社会中是通行的。前者，就是储蓄，后者如分期付款购买耐用消费品。劳动者消费兴趣多样化的结果，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是不可免的。这不仅需要利用货币，并且还需要一个信贷系统，利息也还保存着。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储蓄、信贷与利息不会造成生产资料的名存实亡的状态，因为储蓄的数量，比之公共积累是一个微小的数额，因而是无关大局的。

3

社会主义有没有利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的历史经验呢？从瞿秋白同志下述记录看来，那样的经验是有过的：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每一城市作为一共产社。又一友人告我，俄国现在无物不集中，消费者都以团体为单位，个人名义很难领到需用物品……譬如莫斯科公社——市政工会之类，每月为莫斯科居民运取食粮，消费者凭劳动券领取，劳动券以工作高下为标准分好几等，每等可得若干，十日以前在消费公报登载……

(1921 年 3 月 21 日)”①

“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国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餐便饭唯一的食品……现在丰富得多了，可是非得有钱不可，市场物价因投机商人之故很不稳。然而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1921 年 5 月 1 日)”②

这里所提到的劳动券，按所记录的情形来说，应该是指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因而也就是不经过货币（不经过交换）的产品直接分配。这种产品的直接分配，列宁认为，在当时是“我们力不胜任的事”：

“在 1921 年时，即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中最重要的阶段，并且是胜利地度过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就碰上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极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造成颇大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造成颇大一部分工人的不满……原因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与纯社会主义分配的直接过渡，乃是我们力量所不能胜任的事。”③

① 《瞿秋白文集》，第 1 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06—107 页。

② 同上书，第 119 页。

③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与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984—985 页。

列宁所说的“力不胜任”的事，是指1921年前后。苏联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到现在已有21年的历史，力量是空前强大了，“力不胜任”这样的事应该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苏联现在还利用货币，还没有提到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这至少证明了，在目前条件下的苏联，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还是适合的。

4

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同时也就是利用货币来实行核算。因之，价值与价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存在的。比之劳动时间，价值是一个“相对的、动摇的、不充分的尺度[①]”。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以便彻底消灭价值范畴呢？

在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每个生产企业是一个核算单位。每个生产企业在核算过程中所能确切知道的数据是：（一）支付的货币工资；（二）他企业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三）本企业转移出去的产品的价格这三项。至于所支付的捐税与上缴利润等等，则已属于纯收入再分配的范围了。

企业所支付的货币工资，相当于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扣除社会纯收入部分的余额。根据劳动时间确定货币工资率时，已经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别，换算为单纯的货币数额的差别了。但货币工资一经确定，必须相对的固定下来。如果个别劳动者熟练程度提高了，但还没有“提级”，货币工资仍可不变；又如果整个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在没有通盘调整工资之前，全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6页。

部货币工资率也可以不变。因此，货币工资虽反映了劳动时间消耗的量，虽已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换算为统一的货币单位，但它确实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反映了劳动时间的消耗。

货币工资内，不包括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纯收入部分。纯收入是产品转移出去的价格与货币工资的差额，它不是货币工资的比例附加额。价格则是根据过去经验中所知道的，生产一个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的。因此（一）产品价格大致上适用于不同企业所生产的同类产品；（二）产品价格是相对固定的，不是时时变化的。就第一点来说，劳动生产力高的企业，用同样价格出售产品将获得较大纯收入，劳动生产力低的企业，纯收入会小一些，甚至会亏本。个别企业所核算的，只是核算产品的成本与企业的盈亏。就第二点来说，产品虽有相对固定的出售价格，但产品成本是可以逐渐降低的。因此，一个生产企业到底能获得多少纯收入，不是事先预定的，它只能通过定期的财务结算，相对正确的计算出来。根据这个分析，反过来再来观察价格，就知道：（一）价格是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反映，它是个别企业所费劳动时间的平均，但又与任一企业的劳动消耗都不同；（二）价格是用作核算当前生产中劳动消耗的事先假定（根据过去经验作出的）的标准，不是根据当前生产中劳动消耗的结果统计出来的。由于劳动生产力经常在变动着，价格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绝对正确反映当前生产中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劳动生产力的变化，首先反映为材料消耗与生产工时的变化，它是时时变化着的；从全社会来说，只能相对的、近似的表现在价格中。除了这种直接的变化外，还有一些间接的因素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例如设备利用率的高低，管理费用的

大小，生产周期与流通周期的长短，废品利用的程度，都对产品所耗劳动时间发生程度不等的影响。对个别企业来说，这些因素是间接的、不确定的，即在成本核算中也只能根据一些假定的标准进行分摊计算；对社会产品来说，它对全部产品生产中劳动消耗量的影响更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因此，根据社会统计定出产品的价格，或者根据所有企业的成本计算产品的平均成本，都只能相对的反映平均的劳动消耗量，而不能绝对的反映它。

以上还只说到了一个企业所支付的货币工资与产品出售价格两者。由于生产的社会分工，企业产品价值的大部分是他企业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生产的社会分工愈发展，个别生产企业的产品价值中，本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加入的劳动消耗部分愈小，他企业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部分愈大。因此，某个企业的核算过程中，假定别的企业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绝对正确的，只要新加劳动部分计算得正确，生产资料的消耗比例计算得正确，确切核算本企业产品的价值——劳动消耗是可能的。虽然这个企业所核算的，也还是本企业的成本与纯收入，不是直接核算本企业所费劳动时间，更不是核算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是前面指出过，每个企业的核算结果都只能做到相对正确，产品转移价格也只能相对的代表某项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全部企业的核算，也只能相对正确，不能绝对正确。

这样看来，利用货币工资与预先规定的价格，作为核算的工具，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单位。这个价值尺度只能相对的、近似的、不充分的反映产品的劳动消耗，可是它有两种好处：第一，它是一个公共的尺度，它反映产品生产的社

会必要劳动；第二，它经过个别企业的成本核算，与企业间成本和纯收入的差异，比较各企业生产活动的经济效果——即比较它们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异。缺乏这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这个实行广泛生产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全部核算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社会核算体系除以个别企业为其基层核算单位而外，各生产企业所提供的社会纯收入，经过预算体系实行再分配，预算体系则是独立于各个生产企业之外的。社会纯收入分配于多种用途，它用于购买企业的生产品，也用于支付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报酬。这些劳动者的报酬，理论上也比例扣除应提供社会的纯收入，不过因为他不直接从事生产，所以不表现出来而已。这些劳动者从事劳动，但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不表现为产品价值的增加。因此，这个独立于生产企业之外的预算体系，除掉用公共的价值尺度单位来核算纯收入的再分配之外，使用劳动时间来核算是很难设想的。

5

不管以上所说种种困难，我们还是研究一下，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的劳动消耗，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产品的劳动消耗，首先必须解决复杂劳动换算成为简单劳动的标准。这样的换算只能在社会平均劳动的计算中采用，它不适用于个别企业的核算。其次，这个简单劳动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而它也不能是一个绝对的尺度单位。

一个社会存在着大量普遍的一般水平的简单劳动(譬如说，我国农业中的全劳动力或可认为是这种劳动)，在全社会范围

内，各种复杂程度不等的劳动是可以换算成为这种简单劳动的。但在一个生产企业范围内最简单的劳动，未必是这个全社会水准的简单劳动。一个生产企业的技术劳动的熟练程度是逐渐的但经常在变化着的。因之，个别企业进行核算时如采用全社会水准的简单劳动，在这个企业是已经采用了间接的尺度了。如采用本企业范围内最简单的或最大量的劳动作为基准，各部类企业的核算结果就是不可比的了。同时，每一个企业内部，各种熟练程度不等，熟练程度又经常变化着的复杂劳动，要换算成为简单劳动，也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持续不变的标准的。

个别企业或全社会的简单劳动的熟练程度，本身也是在变化着的。譬如，按我国目前情况，农业中全劳动力的熟练程度，随着农村中文化技术知识的普及，其熟练程度技术水平在逐渐提高；加以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工业运输业等职工数量的大量增加，全社会水准的简单劳动逐渐的将不以农业中的全劳动力为基准。我们完全可以想像，数十年后，在今天看来是复杂劳动的，那时将成为简单劳动；观察社会主义国家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等级的工资率间的距离，就其总的趋势来说是不断缩小的（虽然可以经历一段为了发展技术劳动而扩大各级工资率间距离的时期），这正是反映了最普通的简单劳动逐渐发展成为熟练劳动的过程。

这样看来，以劳动时间作为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的尺度，它本身也不免是不确定的、相对的。

6

以上是社会主义各国现在的分配方法与核算方法的初步分析。根据这个分析，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可是，人们向我们指出，譬如像苏联这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现在还利用货币，是因为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因而有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商品流通。这种货币还是本身具有价值的货币商品，它是商品流通下面的一般等价物，它不是劳动券。这与我们上面所说的就是相反的了。

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

三、商品生产

1

关于商品生产的一般性质，马克思指出：

> “使用对象成为商品一般，只因为它是互相独立经营的私人劳动的生产物……生产者由他们的劳动生产物的交换，才发生社会的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也要在这种交换里面才显现出来。”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55页。

恩格斯指出：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联系，是通过他们的生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的”。[①] 而作为商品生产最高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在社会化的生产中，统治着无政府状态”。[②]

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生产资料将为社会所占有，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这就是说，那时社会将有计划的进行生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不再存在，社会的生产品将直接用为再生产的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不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批评了杜林的经济公社的幻想。他着重指出，企图在实现“劳动的真正价值”的基础上，让“活的劳动……与劳动的产品相交换”，这时，“劳动力……和它所应交换的生产品一样同是商品”，因此，杜林的方案是企图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除去商品生产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进程的弊害。这也就是说，像杜林那样，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劳动的“真正价值”，而不是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于社会生产，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产品于积累基金及消费基金，并分配消费品于劳动者之间；其结果，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仍继续，分散于私人手中的积累终将吞没公有化了的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将服从于近代的工资规律，社会总产品也只有通过交换实现其价值，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④]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84 页。

② 同上。

③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85—298 页。

④ 同上书，第 327—330 页。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公有制下面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

2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下面，社会仍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利用货币进行核算，社会生产是否仍然是商品生产。

骆耕漠同志认为，[①]只要实行按劳计酬与经济核算，就必须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产品就必须计价，那就是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骆耕漠同志接着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及商品生产的定义，“是就一般私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而言……这种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已转为公共财产，除掉在集体农庄市场上还有极个别的残迹存在外，已经是不存在了……商品生产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也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后面这种商品生产，虽然为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所公有，但是他们必须将产品作真正的交换、买卖，即将他们的产品的所有权作真正的转移，那些产品才能算是真正的商品”。[②]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论证过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但这是指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说两种所有制并存时，两种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者，他们之间有商品交换，这种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这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① 参阅骆耕漠：《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过程》一文，《经济研究》，1956 年第 5 期。

② 同上书，第 4－5 页。

题”中所指明的。斯大林在那里接着指出：这种商品生产“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①]（参阅附注）可是为什么两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产品交换，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是不是因为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呢？同书除在个别地方略为涉及这点外（参阅附注），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基本原因。同书曾采取另一个论点，即产品成为商品的原因，是产品所有权的转移。骆耕漠同志认为正是产品所有权的转移，构成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②]

可是，所有权概念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关系只能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它本身不是什么经济关系。[③]社会主义法制承

---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5 页。

②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强调“所有权的转移是产品成为商品的标志”这个论据。该书确认：（一）社会主义生产所以是商品生产，因为存在着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二）个人消费品是商品；（三）一般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该书写道：

“通过收购和采购而从集体农庄转到国家和合作社手中的农产品和原料，以及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都是商品。国营企业生产的，集体农庄和庄员所购买的工业品（主要是个人消费品）也是商品。既然个人消费品是商品，它们也就通过买卖转入城市居民手中。”（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77－478 页。）

上面采取的是类推解释法，“既然个人消费品是商品，它们也就通过买卖，转入城市居民手中”，这是就部分个人消费品为集体农庄及其庄员所购买，因而是商品，推及于全体个人消费品都是商品。但同样的类推解释法也能用于生产资料。应用类推解释法，我们也能达到这样的结论：既然集体农庄购买部分生产资料，因而全部生产资料都采取商品形式。但这种解释法未用于生产资料。该书确认，一般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9－70 页。

认个人是他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所有权者，是按劳计酬这种经济关系的反映，承认集体农庄是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权者，又是另一种经济关系——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反映，两者就不属同一性质。即就个人消费品而言，劳动者用货币工资购买消费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实现他所应领受的社会生产品份额的办法，两者也根本不属同一性质。所以，引用法律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是未必妥当的。

3

所以，我们应该试图分析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经济关系。

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它是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度的。从分配方面说，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区别，表现在：（一）它们的纯收入部分，除税收外，不通过国家预算实行再分配；（二）它们所实现的收入（即产品出售价格的总和，减去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构成他们自己的劳动报酬和积累基金的限界；并且（三）它们的劳动报酬不是如同工厂工人那样统一规定于国家工资制度中。这个区别，就使集体农庄在生产方面，虽要按国家计划进行，假设它们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力量，就会出现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脱离国民经济计划的轨道。但按社会主义各国现有经验来说，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相反的情况是出现过的，就是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造成农业生产中若干部门的生产低落，生产量与劳动生产力两者同时降低。同样，按社会主义各国现有经验来说，规定正确的农业生产计划与农产品价格，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而又防止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

发生那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那是做得到的。

假设一种正常状态，即农产品价格的规定是正确的，集体农庄的生产是按国家经济计划进行的，那么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下的劳动者的分配原则，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原则：按劳计酬。所不同的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劳动者的分配，原则上以全社会为一个核算单位：属于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下面的劳动者的分配，不是以全社会，而是以这个生产单位本身所创造的价值，划分为积累基金、消费基金，并进一步按照按劳计酬的原则，在劳动者之间分配它可以分配的消费基金。但集体农庄的分配，又以税收、国家银行贷款、国家设立的农机站的报酬标准、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等等，与全社会的国民收入相联系着。因为有这种联系，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进行一种带有全社会性质的调节，使工农间收入的差别缩小，使农业所获得的基本建设资金适合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

全民所有制与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交换的价格由计划规定，它反映了全社会的按劳计酬原则，与国家对工农收入间的调节，而不是按照竞争原则进行的，不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自发形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中的一个低级阶段，但不能说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交换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如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私有制下或资本主义下的商品交换。这种交换，在它不会造成集体农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限度内，本质上与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或国营企业与工人之间的交换（如果那可以称做交换的话）具有相同的性质。

自然，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本质，并不是每个时期、

每种场合都相同的。在某一场合或某一时期，它们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弱一些，或甚至达到接近全民所有制的程度；在另一种场合或另一个时期，自发资本主义趋势强一些，或甚至完全不服从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进行生产或交换。但是，除掉那些徒具虚名的而外，在全民所有制占国民经济极大比重的条件下，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服从国家经济计划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只要它的内部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关系，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与私有制下两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

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商品生产的性质的理论，难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两种所有制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

4

如果承认两种所有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指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那种性质改变了的商品交换与货币经济，那么用"特种商品生产"来指明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不能认为是错误的。

困难是在于"特种商品生产"这个定义，不仅与相互进行"商品"交换的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有关，而且也与"经过流通过程（买卖交换过程）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个定义有关。而据说商品流通的存在，又必然要复活资本主义（参阅附注）。按照这个定义，只要产品经过流通过程即买卖交换过程的，它就是商品；不经过买卖交换过程的，它就不是商品。因此，只有在实行产品直接分配时，即废除目前广泛应用着的"货币"这种分配工具，变为采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或者不要劳动券

也可以，反正是实行产品直接分配制度时，商品生产才会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复活的危险才会完全消灭。

不难看出，这不是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后所得出的结论。这是一个从商品流通的外表所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定义从商品流通的外表上得到，所以，阐述这个观点的人，就会依靠所有权的转移这种法律关系的论据，来支持这个结论。

按照这个结论，也还不免产生另外一个理论上的难点，那就是：全社会生产品有的是商品，有的不是商品，完全以其是否经过流通过程为准。可是大家知道，社会生产是一个不断的流，所有社会产品，不论它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结局总是变成消费品分配于全体劳动者之间；所有生产品中活劳动的消耗部分是以当年分配的消费品抵偿的（还应该注意，全社会所消耗活劳动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积累基金而不是全部以消费品来抵偿的），所消耗的过去劳动部分结局也是以消费品抵偿的，不过抵偿的时间有先后，抵偿的过程复杂得多而已。把这个不能分割的社会生产之流，分割其中一部分称之为商品生产，另一部分称之为非商品生产，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就被支离割裂，无法理解了。

5

归纳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各国现在利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与核算工具这种制度，如果称之为特种商品生产，以标志其形式上存在货币经济，实质上不同于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是可以的。认为这种制度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下也将继续下去，也是正确的。但认为这种商品生产的特征是流通过程（买卖交换过程）的存在，产品所有权的转移，这是可以怀疑的。

同样，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的流，如果承认有所谓公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的话，那么，无分消费品与生产资料，也不必追究什么所有权的转移，全部产品既都必须计价，都有商品“外壳”，那就都是商品。如果说，这些产品因为直接是社会产品，不是私人以私人打算生产出来，只有在个人交换下才实现其价值的，因而它们不是商品，那么，无分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它们都不是商品。

至于目前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应该肯定，其原因是经济核算制度的存在，不是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果。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是不能拿来与私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类比的。

四、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

1

既然社会主义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结果，那么，在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价格与价值规律的作用之前，分析一下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特征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是必要的。

大家知道，企业实行经济核算的标志，是拥有独立的资金，独立计算盈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生产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是自明之事，它是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以俱来的。从历史发展上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在苏联是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时

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其他社会主义各国，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保留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形式，改革其内容而形成的。不论历史发展的过程如何，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是计划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核算，这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基本区别。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列宁根据苏联建国初期的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度，此后，数十年来，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各国，形成了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体系，并且证明了它是不可缺少的制度，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社会主义生产，直接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社会各部类生产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关系仅借计算不同物资间物量的关系（它表现为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物资平衡）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可是社会主义必须借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这里，姑且不引入价值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同样必须严格核算所费劳动与有用效果间的关系。[1] 假设经济计划关于不同部类生产间的物量关系，与不同部类生产中所费劳动与有用效果的计较，能够全面的、确切的都计划妥善了，那么，让全社会生产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让全部生产、分配、消费都规定在这个计划之中，原是够了的，用不着再让各个生产企业再去实行什么独立

① 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23 页，恩格斯自己所加的注。

的经济核算了。

历史经验证明，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须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例如鞍钢的炼钢厂、炼铁厂、耐火材料厂等都实行鞍钢范围内的独立经济核算）。这样，全社会的经济计划，规定全社会的生产规模、积累规模、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水平、各部类物资的数量平衡，同时也进行全部生产分配过程的价值平衡。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按照经济计划进行生产分配，不得脱离计划的轨道。可是由于存在着经济核算制度，即令（一）物资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没有企业间直接的购销与合同关系；（二）企业盈亏与企业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之间不发生任何关系，至少也将产生这么几项结果：（一）企业间产品的转移，有了公共的价值尺度；（二）企业独立计算盈亏，推动管理部门寻求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减低成本的因素而加以利用。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就已经有很多好处了。至于有了货币这个工具，对消费者来说，无论如何比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要方便得多，有利得多，这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了。

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有利结果，实质上一定远远超过前面指出的两点。（一）不论消费品或生产资料的品种规格都千差万别，需要变化的因素也是复杂多端。如果说它们的生产与消费及两者间的平衡，全部规定在一个经济计划中，可以不发生任何困难，那是客观上做不到的。因此，（二）生产资料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要由企业间直接的购销关系或合同关系来补计划规定之不足。（三）消费品的销售，要依赖零售市场中价格的调节来平衡供需。（四）使企业劳动者的报酬，与企业为扩大生产所需

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企业出售产品的收入发生一定程度的联系，如奖励金制度、企业基金制度等等。于是经济计划就成为这样一种计划：它规定有关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规定各个生产企业的经济指标；但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详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计划因为是全局性的，关键性的计划，因此，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不再任令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发生作用了；但经济计划又不是具体详明到这种程度，以致任何企业（或甚至包括任何个人）只要按照计划办事，就可以万事大吉。经济计划是用经济核算来补足的。

经济核算所起的调节作用，又使计划获得若干种用统计调查所得不到的数据，作为今后制订计划的根据。比如说，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了，消费资料的生产应作相应的扩大。可是在多种消费品中，到底扩大什么，扩大多少，比例如何，无论作怎样详细的消费调查都是得不到可靠数据的。消费品零售市场中的热销、滞销、价格涨落，就可以使我们察知需要的变化，据以调节生产。同样，各个生产企业产品销售情况，价格与利润的变化，也指示了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间平衡的情况，与劳动生产力变化的程度。这对制订今后的经济计划是有极大用处的。[①]社会再生产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逐年再生产计划不是凭空制订出来的，经济核算制所提供的数据是计划制订的基本根据之一，没有这些，经济计划是制订不出来的。

---

① 定额，是从经济核算资料中获得的。所以，有人以为有了需要量，加上定额，就可以编计划，不必依靠经济核算，是忘掉了定额本身还需要一个根据才能产生出来，它是不能凭空掉下来的。

必须指出，一个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同时也只有当它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计划经济，才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计划所不能细致规定的地方（事实上过于细致的结果，一定与实际生活脱节），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提供许多制订再生产计划的根据。生产规模愈大，生产分工愈细，消费水平愈高，经济核算制度就愈为必要。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已经足够证明这件事了。

2

实行经济核算制，就有可能利用价格与工资率，调节劳动者的报酬，本文第二节已经述及。

价格对于产品的生产与转移，也能起调节作用。因为既然各个企业都有核算赢利的责任，赢利的来源又不外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与获得有利的产品价格两者，那么，企业总是愿意进行那种价格有利的生产。所以，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就有经过价格结构以调节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可能。前面讲过，社会主义各国运用经济核算制度的具体政策有所不同，经过经济核算制度所能发生作用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这种作用以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四者联系紧密的程度而定，这就是说：

（一）如果价格、成本、劳动者报酬与基本建设投资相互间不发生联系，分开来由企业对社会负责，经济核算制所能发生的调节作用就比较弱。例如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价格由计划规定，产品由国家统销，赢亏由全社会包下来，劳动者报酬由

国家保障，企业完成计划所定产量任务就可交帐，经济核算制对生产与流通所起的影响就会很小；

（二）如果上举因素中几项联系起来，由企业独立负责，例如，产品不由国家包销，产品销不出，企业就有发不出工资，无法继续再生产活动的危险，自然就会使企业考虑产品规格、花色、价格等问题。因而经济核算制自动调节价格，调节生产与流通的程度就会提高；

（三）如果劳动者报酬与价格成本紧密联系，生产企业追求价高、利大、好销的产品就愈迫切。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由于国家对其劳动者报酬不负保障的责任，这种倾向就会十分强烈；

（四）同样，一个生产中的企业，为扩大再生产或提高劳动生产力而进行的基本建设，如果投资由全社会包下来，那么，关于投资效果的计较一定较少；如果投资的全部或一部分要由自己的收入中筹措，投资效果的计较就不能不精密。

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结构以调节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社会主义各国在这方面具有不同经验，目前所采取的实际政策也不尽相同。从已有的理论著作与实际办法中，可以看到最低限度的做法与最高限度的做法。本文目的不是研究具体经济政策，但为了便于研究经济核算与计划经济的关系起见，简略的介绍一些这两种做法是必要的。

所谓最低限度的做法，在理论上认为经济核算制仅仅是为了使产品能够计价，产品的计价能促使企业注意成本问题、赢利问题、价格问题，可是价格政策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发挥调节生产的作用的。生产规模，无论从全社会说，从各个生产部类说，或从各个生产企业说（这又不论它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或

属于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是由计划规定的。价格水准无论如何规定，都不能对生产起调节作用。[①]这种理论，苏联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是“价格形成中的唯意志论”。这种唯意志论“大部分表现(并且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方面，一部分表现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方面，在生产资料的批发价格方面表现得较少”。[②]这种价格形成方面的唯意志论，“使国民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损失”。[③]

我们所说的最高限度的做法，是充分发挥经济核算制的作用，办法是：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赢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因为企业会自发的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也会发生自发的涨落，这种涨落就实际上在调节着生产。同时全社会还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不过这个计划是“某种预见，不是个别计划的综合”，因此它更富于弹性，更偏向于规定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更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④]。由于我们缺乏具体材料，因而对实行这个办法后，如何维持重要生产部类的均衡发展(例如工业与农业)，如何维持价格的稳定，物资储备与对外贸易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政策等等，都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

---

① 参阅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21页。

② 施·图列茨基：《关于生产资料的批发价格问题》，《经济译丛》，1957年第4期，第9页。

③ 同上。

④ 参阅罗曼·费德尔斯基：《评南斯拉夫的工业管理制度》，波兰《新路》，1957年第2期。

3

由上所述，我们或者可以达到这样的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在这个经济体系内，强调哪一方面，都会否定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计划经济。如果它不是计划经济，任令客观的经济规律盲目的、自发的起作用，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这个计划经济不能不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如果没有经济核算制，任令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既然有经济核算制度，经济核算制度又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力，并在生产、分配、消费与产品转移的调节方面补经济计划之不足，那么，充分发挥经济核算制的长处是必要的。如果过分强调计划的一面，达到否定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价格对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的影响，因而达到否定经济核算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时，企图用计划规定一切的弊病就会出现，而这是障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反之，如果过分强调经济核算的长处，因而充分发挥价格、成本、利润的作用，那么，经济生活中的客观规律就会自发起作用。如果社会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去平衡控制这种自发作用，自发作用发挥到盲目程度时，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个特征也会被否定掉的。

研究这个问题，在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与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对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间的关系的分析只能到此为止。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只能等待别的机会了。

4

经济核算制是存在于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因素，由于经济核算制，社会产品全部转化为价值。可是人们常常不敢承认这一事实。据说，承认经济核算制，承认产品之转化为价值，就是承认杜林式的经济公社。承认杜林式的经济公社，必然将使杜林式的经济公社去复活资本主义（参阅附注）。因此，我们确实必须研究一下，目前普遍施行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核算制，到底与杜林式的公社有什么相似之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式的公社所以注定要失败的特点是：（一）“活的劳动——劳动力——应该与其全部生产品相交换”；（二）因此，“全部生产品，都将被分配了。而社会的一种最重要的进步职能，积累，就被剥夺，并被放到个人的掌握之中、个人的意志之下”；（三）“各别的个人，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收入’，可是社会则最多也只是和以前一样的富，一样的贫，这样，结果只是：过去所积累的生产资料之所以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为着要使将来所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1] 这与我们的经济核算制到底有什么相同之点呢？我们的经济核算制，丝毫也不妨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指出的分配原则的实行，丝毫也不妨碍社会集中积累基金。社会主义各国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不是证明它将分散社会积累于私人手中，相反，它证明经济核算制有助于社会迅速扩大它的积累。那么，经济核算制与杜林式的公社到底有什么相同之点呢？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29 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杜林是要以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除去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所产生的弊害，并指出这种想法与蒲鲁东的幻想是相同的。这是恩格斯批评杜林错误的实质所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正因为在这方面与杜林式的经济公社有基本差别，所以社会主义各国实行经济核算制，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去复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国使用货币作为分配工具，利用价值这个公共尺度去建立整个核算体系，因此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这也许是与杜林式的经济公社的相似之点。但这是方法，不是本质。并且，利用货币作为“公社与其社员之间”的交易的媒介，这时货币实质上就是劳动券，恩格斯也明白指出过，那么，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核算制，与杜林式的经济公社，到底又有什么本质上的相似之点呢？

是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再三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并指明，“等量劳动产品之可以互相交换”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①]于是人们再也不敢设想，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社会主义产品将转化为价值，而价值规律则只能是商品生产的规律。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至于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现实的内部经济关系如何，则不想去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周围每日每时大量重复的现象，明显的与他们所坚持的见解不相符合，他们解释说，目前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制度只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过渡时期的内部关系，不能成为理论的出发点。于是，我们不免发生一个疑问，

① 这里已涉及价值规律的定义。本文第六节对此将作进一步的探讨。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关系呢，还是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呢？

此外，也还应该研究一个问题：实行经济核算制，推动各生产企业严格计较经济效果。在一定范围内任令经济核算制经过价格结构自动调节生产与流通，但限制它，使它不达到否定计划经济的程度，是否会引导到生产过剩的危机？

作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经济不仅要组织各部类物资的产销平衡，并且也要组织全社会的价值平衡。社会主义以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其基本目的，像资本主义那样，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社会因生产太多而贫困的荒唐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社会因不能预料的原因，以致某部类物资生产过多，社会也会用来扩大它的物资储备，来平衡较长期间的供需。那么，生产过剩的危机，很明显的不可能存在。

五、价值及价格

1

我们已经知道，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计划经济，出现价值与价格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私的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商品生产中的价值概

念，预决着雇佣劳动，预决着经济危机。[1] 社会主义直接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生产中所消耗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那么，社会主义怎么能存在着价值呢？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由于社会生产实行广泛的社会分工，所以生产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是经过一系列过程的。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个别产品的劳动消耗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从来也不能一致的，产品的价值，是它的个别价值与它的社会价值的矛盾的统一体。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是近代化的生产，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它的经济进步的基本动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就是不同部类生产部门、不同生产企业以至个别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发生差别又不断缩小这些差别的过程。先进的超过了中间的与落后的，中间落后的赶上先进的，而新的先进的生产水平又将鼓舞大家前进。因此，产品的社会价值在不断变化之中，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之间又存在千差万异的差别。价格是价值以货币计量的表现形式。如果货币是稳定的，价格是价值的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它将随产品社会价值的变动而变动。社会价值是个别价值的总和，但它和每一个个别价值都不相符。

产品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异，还表现在下述两种情况下面：

一般的说，在一个技术装备水平很高并很普遍的社会中，用简单的手工劳动从事生产是例外（譬如说，做特种手工艺品），每一个新的生产部门与生产企业以必要的技术装备为其前提，

①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

这些技术装备将按照正常的折旧办法收回它的投资。但当社会集中较大投资于技术装备很高的新的生产企业，投资额超过原有社会水平，劳动生产力也将获得突出的提高，这些企业的产品按其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包括折旧）来说将低于一般产品的水平，也就是说其个别价值突出的低于社会价值。当这样高的劳动生产力尚未普遍到一般生产中时，社会必将要求在较短时间内收回这笔投资，来加速装备别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因此，其价格水平将暂时以原有社会一般生产力水平为标准，一直等到这种较高的生产力比较普遍，产品的社会价值以这种生产为标准而逐渐减低时，价值与价格间的距离，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间的距离才会逐渐缩小。社会主义的产品，以一般劳动生产力水平为标准规定其价格是合理的。如果说，上面所说劳动生产力特别高的产品的价格，必须特别低于一般社会生产力水平，那么，这种产品就会供不应求，不敷分配；社会积累将不能迅速扩大，普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能迅速提高。产品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异是应该包括这种特殊的更大的差异的。

反之，由于消费兴趣的多样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生产中所生产的价值，低于可以实现的价值，也是会发生的。社会主义生产是计划生产，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是根据计划来生产的，但如果说因此就不会再有不受欢迎的消费品，技术上陈旧的机器，技术经济上错误的建设工程，那是不符合事实，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在使用中的技术装备，因技术上陈旧而提前废弃，形成所谓无形损耗，更是大家所公认的。

所生产的价值实现不了，就全社会说是劳动生产力的降低，虽然它往往不表现为个别产品劳动消耗的提高。因之，从全社会观点来说，这也是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异。

产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价值范畴的根据。

2

有些著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被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所引起的。他们根据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价值，是商品的价值”[①] 这个论证[②]，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商品的产品具有价值，不作为商品的产品没有价值，或只具有价值形式。所谓商品，就是那些“通过流通过程”的产品。但是，说到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性质时，具有价值的与具有价值形式的产品，又都要借价值来衡量了：

> “个人消费品既是商品，就有价值。”[③]
>
> “既然作为商品的消费品具有价值，那么不作为商品的生产资料就具有用以进行成本核算、计算和监督的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④]
>
> “既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生产，因而整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23 页。

② 其实，恩格斯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价值，是商品的价值”时，对他所说的商品是下一个严格的定义的，那就是，商品是“私人以私人打算生产出来”的。所以，无条件承袭恩格斯的公式，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经过流通过程的那部分产品的商品，具有价值，那是冒了一种危险的。因为根据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无条件把社会主义生产和私有制的生产等同起来的。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83 页。

④ 同上书，第 483—484 页。

个国民收入和它的一切要素，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实物形式，都是借价值来衡量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起过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必要，没有提起过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指明社会主义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

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不能证明当两种所有制被一种所有制所代替时，经济核算制度就不再存在，产品分配可以采用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因而价值形式也将不再存在。不能证明，废除经济核算制及价值形式以后，将用什么办法来充分发掘一切足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潜在力量；也无法证明，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如何不再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此作者认为，像上面那样来解释社会主义的价值，是一种形式的结论，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内部关系。

3

如果没有特定的价格政策使价值与价格差离，又如果货币是稳定的，价格是价值（社会价值）的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各类物资价值比例，因其劳动生产力在不同方向及不同程度上的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59页。

变动而相对变动时，价值比例的变动决定价格比例的变动。但比之价值，价格是相对稳定的。

一个稳定的、能够反映各类产品价值的价格水准，与正确的工资率一样，是保证劳动者获得应有分配的保障，同时，也是各类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按正常进行的条件。因为产品的社会价值，代表生产这项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一种产品的价值减低了，就表示它能够在劳动量不变时生产更多，就是它的消费可以扩大。较低的价格，恰足以扩大它的消费；别一种产品的数量扩大了，它的社会价值未变，这就表示社会已经增加了同比例的劳动量，因而这类产品的消费的扩大，就应低于前一类产品。其他类推。[1]

不论因为什么原因，各类物资的价格比例不符合价值比例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正常联系就会受到妨碍。这些障碍可能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例如，粮食价格如比价值低，并且低到这种程度，以致牲畜饲料利用牧草还不如利用粮食合算时，不可避免会有人用粮食代替牧草做饲料，而农业则会因出售价格太低而改种别种作物。又如钢铁价格如低于其价值，人们就会不正确的利用钢铁，减少别种可以代替钢铁的便宜的材料，计划经济与物资分配制度会阻止这种趋势的无限制发展，但不能彻底消灭这种不合理现象。因为经济核算制度与个人对消费品的选择，总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力量，要购买便宜的东西，生产

① 有时，产品生产增大，价值也减低，但仍不能满足国内需要。产品的社会价值，就只能以进口价格为标准来决定。以目前对外贸易情形而论，进口价格，是以用来交换的出口物资的价格来决定的，因此出口物资的社会价值，决定进口物资的社会价值。

较贵的东西。

价格对生产的影响，在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更为敏锐，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比较缓和。但不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动者报酬与它的利润如何不发生联系，价格对生产的影响总是存在的。

因为价格对生产与消费总会发生影响，所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排除利用价格政策来达到某种经济政策的目的。例如，某类产品生产不足，可以提高价格到它的价值水平之上，以刺激其生产。某类产品生产的数量超过它的正常需要时，可以减低价格到它的价值以下，以扩大它的消费等等。从生产与消费间的关系来说，价格政策可以是使两者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的手段。这在资本主义是自发形成的，在社会主义则可以通过计划规定价格来做到。

但是不论个别产品的价格可以与其价值发生何种程度的差离，价格总和总等于价值总和。因为社会总产品的价格，除去其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形成全部国民收入，各类产品的价格，总不过是这个总和的部分，国民收入同时又是社会劳动所加于生产资料之上的价值总和，个别产品的价值也是这个总和的部分。从这点来说，个别产品价格高于价值，总是被别种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所抵消的。

以上所说，是价值与价格的一般关系。它其实就是价值规律对价格形成的作用问题。我们准备在次节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六、价值规律的作用

1

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为了便于弄清问题，我们先来探索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规律的定义，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对价值规律给了下面的定义：

> “只有社会必要劳动的量，或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①]
>
> “每一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它的使用价值中对象化的劳动的量，由它生产上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②]

马克思把“等价物与等价物相交换”称为商品交换的规律[③]。因此，马克思所定义的价值规律，就是价值决定的规律，价值决定是价值规律的另一个用语，其中并不包括“等价物与等价物相交换”的涵义在内。

---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204页。

③ 同上书，第214页。

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自始就把商品交换（私有制下的商品交换）看作价值形成的先决条件，但在上述价值规律的定义中，却把商品交换这个因素排除在价值规律的定义之外。价值规律的定义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法：生产中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一个使用价值的价值，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研究全部《资本论》的论证，就会注意到正是从这个定义出发，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的分析。这些分析，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要点：

一、只是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一个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不再有什么别的东西（如机器的生产力、土地的丰度等等），参加进来决定价值量。剩余价值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二、尽管社会再生产过程经过一个复杂的物质替换与价值补偿过程，价值是各种所得的唯一源泉[①]。“商品的总价值，是……各种不同的价格成分的源泉”[②]。这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总和，永远等于它的价值总和；

三、商品交换的规律是等价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全部产品只有经过交换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因此竞争的作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迫使资本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的内部规律，通过竞争，调节全部资本主义生产；

四、价值规律调节生产，是通过价格变动来实现的。但是，

①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65—1159页。

② 同上书，第1108页。

“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价值是一个重心，价格围绕着它变动，围绕着它的价格涨落趋向于平衡”。[①]

可见，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过程与分配过程，也支配着竞争中价格的运动。所以恩格斯说：“全部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不同各方面所借以发生作用的各种复杂关系，尤其是劳动唯一得以形成价值的条件，都要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出发来展开。”[②]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规律的定义是有不同了解的。下列定义，指明了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价值规律是在交换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由此，自然可以推论，在交换过程以外，就无所谓价值规律的作用：

>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商品的交换，同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是相适应的。”[③]

这个定义所代表的，实质上是等价交换的规律而不是价值规律。采用这个定义，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中的作用就将无法阐明。譬如说，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同是资本家以等价换进来的，这是符合“等价交换”规律的。可是资本家购买进来的劳动力不是在交换过程中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剩余

---

①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3页。

② 同上书，第1175页。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2页。

价值。剩余价值的产生完全服从于价值规律，即“产品价值是由生产它的劳动消耗所决定”的规定。如果认为价值规律就是等价交换的规律，那么，剩余价值规律就是无法解释的了。

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内价值规律的作用时，如果局限在交换范围内，那就是在研究供求关系对价格变动的影响①，而不是研究价值规律的作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既及于生产分配交换的全部过程，社会主义生产是价值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影响及于经济生活的全部过程。因此，在以下的研究中，不采取那种把价值规律局限于交换过程的定义，而是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来理解价值规律的意义的。

2

社会主义经济就其经济核算的一面而言，价值规律是明显的起作用的。因此，问题首先在于：就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这一点来说，价值规律起着什么作用？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定义，那么，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自觉的运用价值规律，经济核算是运用价值规律的基本方式之一。

纵令社会主义经济只是计划经济，下述情况仍然是客观存在着的：

一、各项产品价值，被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个别产品的劳动消耗，如高于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有一部分劳动量是可能节省的；而要增加物资生产，就必须

① 参阅希拉里·明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的发言。

相应的增加劳动量，或提高劳动生产力。

二、全部国民收入，除劳动者当年新加到生产资料中的价值而外，没有别的来源①。因此任何一个细小的、无益的生产中的劳动虚耗，都不免要减低国民收入的量。

这就证明了，价值规律在客观上是制约着经济计划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既被制约于价值规律，那么，要使一个计划成为正确的计划，就必须按照下述原则调节全部社会生产：

一、计算社会各类必须产品的量，各类产品数量间的正确比例，各类产品现有劳动生产力水平及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量，分配社会劳动于各生产部类之间；

二、努力提高各类产品的劳动生产力。当使用效果相同或可以互相替代的产品，劳动生产力发生程度不等或相反的变化时，减少或停止那些不经济的产品的生产，提高那些便宜的产品的生产；

三、必须根据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情况（价值决定）来调节必需参加的劳动量，及劳动者每日每周的劳动时间。或者也可以说，必须根据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情况（价值决定）来调节社会的消费水平。

四、为了达到正确的根据产品需要及其劳动生产力变化的

① 因为劳动生产力提高，将使同量产品的价值减低，因此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社会生产的价值并不增加，物资量增加。但近代各国经济史表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往往不表现为价格的跌落，统计上则用不变价格表示物资生产的增加比例。

程度来正确的调节生产，统计、记录、核算是十分重要的。[1]

这也就是马克思下述论证的意思：

>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决定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2]

人们总怀疑，为什么马克思再三指明社会主义的产品将不再转化为价值，却又指明价值决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将起作用。这其实是不奇怪的。马克思完全可能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但使他得以对资本主义经济作出如此深刻的科学的分析的理论力量，不能不使他达到这样的结论：虽然资本主义是“在价值上面建立它的生产方式”的[3]，社会主义只要是“社会化的生产”[4]，价值规律仍然有它的作用，运用它为劳动人民造福是必要的。

---

① 这里是说的统计、记录、核算，没有涉及经济核算制度。作者认为，经济核算制度虽然也是统计记录核算，但以每个生产企业具有独立资金、独立计算盈亏，因而会发生价值、价格、成本、利润这些范畴为其基本条件。因此，这与单纯的统计、记录、核算有别。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16页。

③ 同上书，第1115页。

④ 同上书，第1116页。

3

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制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之故。

本文第四节曾分析了经济核算制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从那里，我们看出，经济核算制在两个方面帮助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

（一）经济核算制提供的，关于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使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是最大的；同时也帮助经济计划规定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规定各生产企业与生产部类间产品转移的合理价格。

（二）经济计划规定一个合理的限度（这个限度因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此限度内，任令经济核算制发挥对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所谓“自动”，就是不必事事规定在经济计划内，事事由经济领导机关决定，而是由生产企业之间，或生产企业与劳动者、消费者之间，经过价格结构，与工资率以外的劳动报酬补充规定，自动进行产品的转移或劳动报酬的分配。

以上两种作用，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过在前一种作用中，计划经济借经济核算之助提供资料，使计划本身得以正确运用价值规律。这是价值规律通过计划起作用。后一种是价值规律在经济计划规定限度之内，而又是在计划本身之外，调节生产与流通。而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以上两种作用，不妨归总起来，都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

节全部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则是任令价值规律作为自发的规律，通过竞争，自发的调节全部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区别所在。

4

无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或经过经济核算制度调节社会生产，它总是通过价格结构的。因此，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对价格形成的作用，也是必要的。

既然价值规律调节着社会生产，价值规律就应支配价格运动。因为价格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价格比例愈符合于价值比例①，社会经济的发展愈是正常。可是为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价值与价格的差离有时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个特点，又使价值与价格的差离成为可能。我们现在不想研究各种价格政策是否正确，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价值与价格的差离如何形成，价值规律对这种差离的关系如何。

如果把价值规律对价格形成的作用放在一边，价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首先是生产与消费之间联系的纽带。消费，如果是指生产的消费，与劳动者报酬的大小，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如果是生活的消费，产品价格就直接决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出售者决定它的收入，在购买者（生产的消费者）决定它的产品成本。因此，假定不考虑其他一切因素，价格涨跌，调节生产，调节消费，调节生产与消费间的关系。

① 这里所指的价值，都是指商品的社会价值。因此，凡相互可以代替使用的产品，都合起来计算它的社会价值。又个别产品劳动生产力突出的高于社会一般劳动生产力水准的，已将其应迅速收回的投资数，计算在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内。

经济计划所规定的价格，就其与生产者的关系而论，如要使它脱离其价值，首先必须使生产这个产品的生产企业，其价格、成本、利润与劳动者报酬不发生关系。因此，凡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在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企业，生产方面的反应必极为敏锐，它将立即转而生产别种价格比较有利的产品[①]。如为自然条件所限，不可能转而生产别的产品时，较长期间内一定会发生生产下降，劳动力外流现象。要恢复这类产品的生产，非使计划价格符合产品价值不可。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它的价格、成本、利润与劳动者报酬完全不发生关系，这种反应就会比较迟钝，短期间内甚至会看不出来，但它无论如何还是要受“价格总和一定等于价值总和”这条规律（它是价值规律的一部分）的约束。因此，个别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必为别一部分产品价格高于价值所抵消，这就使全部产品中，价格不符于价值的产品，比例增大，因而就会对这些产品的购买方面，即消费方面发生影响。

产品价格不符于价值，将使消费者在购买时竞相选择价低的产品，形成供销脱节。计划经济的力量可以减低这种趋势，办法就是实行物资分配制度，限制经济核算制所会自动产生的那种对产品产销间的自动调节。但是这种物资分配所能发生的作用，限于生产的消费，对生活的消费不能发生很大的作用。在生产的消费之中，物资分配制度的作用又以购买者（生产的消费者）的价格、成本、利润与劳动者的报酬不发生紧密联系者为限。因此生产资料实行国家统一分配制度以抵消价格脱离价值的后果，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是行得通的，在劳动人民集体所

① 这里不考虑行政力量所起的作用。行政力量的作用也是不能持久的。

有制的企业，又往往是行不通的。

以上所说，是指各类产品价格比例不符价值比例而言。这种情况，与物资供应及购买力间的脱节属于不同范畴。如果购买力一般高于物资供应量，那是物资价格普遍低于理论上的价格，供应紧张的现象，趋向于逼迫价格普遍上涨。虽然这是不同的范畴，物价趋向于普遍上涨这件事，往往导致价格比例不符于价值比例。因为价格普遍上涨时，国家总力图使主要物资价格不过分提高。作为历史因素的积累，它常常使价值价格之间的差离扩大、加深。

不能忘掉价格是生产与消费间联系的纽带。社会主义经济既被制约于价值规律，那么，使价值规律支配价格的运动，价格就会平衡供需，刺激生产（参见第五节）。使价值与价格差离达到违反价值规律的程度，不免加深供销脱节，阻碍生产发展。因此，不论计划规定价格也好，任令经济核算制度自动调节价格也好，使价值规律支配价格的运动是必要的。自然，如果任令经济核算制自动调节价格的作用加强，各个生产企业的局部利害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也会加强。经济计划从全局的、长久的利害权衡出发加以调节是必要的，可是这又以一个雄厚的全国性的物资储备与财政储备为前提。

5

关于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调节流通问题，必须在上面所考察过的、经济生活内部的规律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正确的解答。

基本的前提是价值规律对于经济计划的制约性，价格是生产与消费间联系的纽带也不能忽略。如果承认这两点，自然的

结论就是：价值规律既调节生产，也调节流通。既调节消费资料的生产与流通，也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其转移过程。

说价值规律调节消费品的流通而不调节它的生产，首先就被一件明显的事实所否定了，那就是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由于它的产品价格与劳动者的报酬紧密相联，因此，经济计划企图主观的规定它的产量，不使价格影响它的生产，事实证明这是与客观实际相背离的。即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使消费品的价格只调节流通而不调节生产，只要这些企业的价格与本企业劳动者的报酬不发生紧密的联系，是可以做得通的。但这只是从这些企业的生产上说。从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上说，不让价值规律既调节流通，又调节生产，结果必将割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因而将发生有害的结果，也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了。

在生产资料方面，因为（一）它的产销双方主要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因此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价格、成本与劳动者报酬都可以高度的脱离关系；（二）因为它在全社会总的生产过程中不过是中间环节，不是直接供生活上消费之用，因而不尖锐表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然联系。于是表面上看来，它既不通过流通过程（所谓所有权的转移过程），它的价格与价值之间无论有何种差离，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还是可以按计划进行。因而就有许多人再三指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分配是不受价值规律影响的。

我们先不就理论上研究这种判断是否站得住脚，让我们来考虑我国近年来经济生活中如下两件事的意义：（一）凡是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它的生产与流通是不受价值规律调节的么？为什么国家花了这样大的劲，供应农村的双轮双铧犁大量退销？（二）为什么许多国营工厂堆积了大量

的机械工具没有投入生产？那些生产工具不是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的么？认真严肃的考虑这两件事，我们将不仅在政策上获得有益的结论，也将在理论上获得有益的结论。

农村所需生产资料的生产，有些为农业所欢迎，有些不为农业所欢迎，其关键不在什么两种所有制的不同，而在按目前我国农业的具体条件，何种生产资料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的提高它的劳动生产力。国家规定农业所需生产资料的生产计划，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计划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产品将不会销不出去，而且还将供不应求。生产这些产品的价值不仅不会实现不了，而且因为供不应求，销售价格有时还不能不受高昂的进口价格的影响，使国家投入生产这些产品工厂的投资迅速收回来。化学肥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价值规律调节着农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看来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

反之，假设我国农业全部是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的投资是国家提供的，盈亏是国家包下来的，农场工人的工资是国家保证的，那么，双轮双铧犁全部由国家分配给农场，无论农场对这些双轮双铧犁的利用率如何，反正不会发生大量退销现象。我国农业的情形当然不是如此，可是工业中积压大量设备，不能不承认其原因正是如此。这种现象是不好的。避免这种现象的办法不外是：（一）国家对各个工业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严格核计它的经济效果；（二）在企业经济核算制度中补充一些规定，使企业对它所需投资担负一定程度的经济责任。如果设想全部生产资料的生产，都严格根据：（1）生产资料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或其价格；（2）应用这些生产资料的企业，在应用它们以后，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程度，或其产品成本降低的

程度；(3) 应用这些生产资料的企业所需追加投资收回的速度，这三者的计较来决定，情况就会大为改善。而这种计较与决定，如果称之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使价值规律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看来也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所以，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分配，不受价值规律的调节，那又是从事物的外观，而不是从事物的内部关系作深刻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分配，确实可以不受价格与成本高低的影响，但这只是事物的外观。事物的内部关系是：生产资料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应用它来生产所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程度，与应用它来生产所需的追加投资三者，永远将支配全社会生产增长的速度，支配消费资料的丰饶的程度。无论我们实际应用的制度，生产资料的价格与成本高低，可以完全不影响它们本身的生产与分配，它们的生产与分配可以完全由计划决定，可是价值规律总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要成为一个正确的计划，又非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不可。

从理论上说，认为价值规律调节那些价格涨跌会实际上影响其生产与流通的产品生产，而不调节价格涨跌不影响其生产与流通的产品生产，那是已经肯定了下述的前提了：(一) 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是不受价值规律约束的；(二) 价值规律的作用限于价格涨跌影响其生产与流通的那些产品；(三) 只要经济计划做到，使某种产品的价格涨跌不影响其流通与生产，经济计划就缩小了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四) 因此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就完全是被经济政策所规定的。我对这个理论是怀疑的。

有些经济学者，正是根据这些前提，作出下列的结论：实行经济计划的结果，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限制了；正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反而应该主动发挥价值规律的

作用。这个理论更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不可能设想，人们会追随一个逐渐失效了的规律，要去“自觉”运用它。人们要主动的自觉的运用一个客观规律，首先必须这个规律是客观上制约着某种事物或其关系的。

七、货　币

1

前面我们曾多处涉及货币，因此在本文之末，有必要简单的讨论一下社会主义的货币问题。

在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货币起着下面各种作用：

一、货币是社会分配消费品于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凭证；

二、在实行生产的社会分工条件下，货币是各个生产企业间转移其产品与劳务的流通手段；

三、货币是共同的价值尺度，用作经济核算的工具；

四、货币是实行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工具，除支付货币工资而外，它还用于缴税、上缴利润、预算拨款等等；

五、由于延期消费与提前消费，由于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会产生一个信贷体系，货币是这个信贷体系的杠杆。

货币起着以上各种作用时，它的职能也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蓄手段等等。那么，货币是否也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那样，必须是具有价值的货币商品呢？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货币的周转过程。

仅仅作为流通手段，货币本身不必是具有价值的货币商品，它只起着筹码的作用；问题是流通过程中货币会滞留在各个环节上，货币也会作为贮藏手段起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货币，必须是本身具有价值的货币商品。社会主义制度下，流通过程中滞留在各个环节上的货币，与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是国家银行发行的。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同时就存在着社会的物资储备。保证流通过程中的货币的价值的，就是这个物资储备。设想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生产企业，流通中的货币，无非就是发给劳动者的消费权利凭证，而未凭证兑取消费品的部分。

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也有黄金贮藏，作为对外支付之用，那么，货币不还是与黄金联系着，因而纸币不过是黄金的代表吗？这是不对的。黄金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界货币，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间的国际贸易，会利用黄金支付贸易差额，这是事实。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专营，黄金的国际输送，只是商品的国际输送的一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的外汇市场，没有长期或短期资金的国际移动，就是这一论断的证明。

所以，社会主义的货币首先是一种公共的价值尺度，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是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的[①]。

---

① 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物价史证明它的币值并不是一直稳定的；这与具体的货币政策有关，也与特殊情况下的财政政策与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有关，这里不能详细讨论。

在并存着两种所有制时，只要假定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不致窖藏贵金属，越过国家对外贸易系统直接出售产品以获取外汇等等，那么，上面的分析还是适用的。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两种所有制间的交换，与私有制下两个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有本质的区别，因而根本不必借助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媒介这种交换。

2

货币，作为公共的价值尺度，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它自己的特征。

社会主义货币的价值，直接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但它不可能固定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上。因为劳动生产力经常在变化，一定量劳动时间所生产的有用物资的量，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如果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与一定量的生产力变动不居的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固定起来，就会使定量货币对定量有用物资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成为经常变动的，不固定的。这样，以定量货币为单位的工资率的变化，不能反映劳动者物质生活提高的程度。以货币单位计算的社会总生产额及国民收入额，不能反映全社会物质生产增长的程度。所以，所谓稳定物价政策，除了不使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所必要的量，以致物价上涨而外，也有这样的意义：使货币代表各种有用物资量的综合比例，并把这个综合比例相对的固定起来。

前面曾经说过，为了使劳动者所得报酬，与劳动生产力增长程度相适应，可以提高工资率，也可以减低物价。提高工资率，就是使货币购买力停留在原有水准，货币就可以维持它的“不变价格”。减低物价则使货币的购买力提高，货币就不再维

持在其不变价格水准上了。同时，不同生产部门劳动生产力提高速度有差别，为使价格不断与价值一致，经常按照变动着的各类物资间的价值比例，调节其价格比例也是必要的。调节的结果，未必能变动个别种类的物资价格而不变更货币的不变价格。所以，作为公共价值尺度单位的货币，不仅不能直接以劳动生产力变动不居的劳动时间为单位，也未必能使之保持在代表一定量有用物资的综合比例的那种不变价格之上。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货币直接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但作为劳动时间的尺度单位，仍然只是相对的，不充分的。

3

下面的说法是很难理解的：

> “苏联货币的稳定性不仅由黄金储备来保证，首先是由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按固定计划价格投入商品流转中的大量商品来保证的。”①

我们知道，当货币是由一种货币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而起价值尺度作用时，货币商品本身价值（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将反映为全部商品的价格的变化。因此不可能由按固定计划价格的商品来保证货币的稳定性。如果这是可能的，那就必须随着这个定量物资综合价值比例对金价比例的变化，调整货币含金量，或者不规定货币含金量而随时调整对外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88 页。

汇兑的汇率。但同书指明，1950年苏联规定卢布含金量以后，没有因降低物价而调整卢布含金量。金，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商品，在全部货币制度中的作用如何，未曾进一步阐明。

或者认为，以含金量、汇率等标准来研究货币，是以资本主义的货币范畴套到社会主义货币上来了。问题的焦点正在这里。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只有本身具有价值的货币商品才能担当起来，这本来就是商品生产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才有的事。当作价值尺度的货币，既代表“固定计划价格”，又代表一定量金（本身具有价值的货币商品），把互相排斥的两年事合成一个概念，确实令人难于理解。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我们的经济生活，建立一个正确的货币理论，看来也是必要的。

【附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关于产品如何成为商品的原因，及商品流通的结果，至少有下列三个不同的论点：

一、产品成为商品，是因为两种所有制并存。这种商品生产和它的货币经济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而且注定了要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参阅该书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二、“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同上，第14页）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主张的在商品流通条件下活动的‘经济公社’时，确凿证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要使杜林的所谓‘经济公社’去复活资本主义。”（同上，第

85 页）

三、“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同上，第 46 页）

稍稍研究一下上面三个不同论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下列两个逻辑上的矛盾：

一、既然经过买卖过程转移其所有权的产品才是商品，那么，国营企业生产的、出售给国营企业职工的产品，也是商品；但是，如果在两种所有制的生产企业间交换的产品才是商品，那么，国营企业生产的，出售给国营企业职工的产品，并非两种所有制企业间交换的产品，就不是商品；但是它又确实经过“买卖”过程转移了所有权，所以又应该是商品，而这是互相矛盾的；

二、当社会不再存在雇佣劳动时，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或者不会去复活资本主义，或者必将去复活资本主义，两者必居其一。不能说，它不会去复活资本主义，又必将去复活资本主义。不能把两个相互排斥的论断，同时并存于同一件事情的因果关系的推论中。

上面所说的，当然仅仅是逻辑上的矛盾。我们还必须研究，隐藏在这个逻辑矛盾背后的还有些什么实质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同书中提出了有名的、经过产品交换制的实行，使两种所有制并存，转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论点。斯大林在论证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前途时，指出商品流通及货币经济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而当他企图证明必须实行产品交换制以达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时，又强调商品流通的存在，将引导到资本主义的复活。两个论点，分开来都可以说得过去，合起来就互相矛盾。

实行产品交换制，是不是会使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转变为一种所有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案，这里不准备详细研究。我们倒是要问，即使实行产品交换制，集体农庄换来的工业品，怎样分配给庄员？还是利用以劳动日为单位的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还是以一定额的货币资金（银行如不供给这些资金，不妨假定集体农庄可以自己发行某种筹码），周转于集体农庄与庄员之间，作为庄员的劳动报酬，而庄员则凭以向集体农庄专设的商店，自由选购各类工业品？这个问题看来是琐屑的，我认为有很大意义。因为斯大林在同一著作中并未说明国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在单一全民所有制下，是否将废除货币工资形式。假定国营企业职工继续应用货币工资，因而有自由选择消费对象的方便，那么，有什么保证，使集体农庄庄员不要求用货币来支付劳动日报酬？彻底的办法，只有在国营企业职工与集体农庄庄员两者之间，全部废除以货币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代之以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

也只有实行这样彻底的办法，才真有把握的，使社会应用产品交换制，将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转变为单一全民所有制时，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没有得出这样确切的论断，却留下了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我们没有理由推断，隐藏在他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相关论点背后的真正意见，就是要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但鉴于苏联历史上曾经实行过这种劳动券，又想到斯大林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不应该留下这样的逻辑矛盾；又想到如果他的本意是要普遍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过早提出这个意见，易于造成社会经济生活上的震动，那么推断他的本意是要普遍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可能是他留下这个逻辑矛盾的原因，也许也不是没有几分理由的。

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产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原因；消灭商品生产的办法，就是实行产品交换制，这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基本论点。贯彻全书各篇的这个论断，与所有权转移是使产品成为商品这个论点固然是矛盾的，但我们如注意到，可能斯大林的根本想法是要在国营企业职工中也实行领物凭证式的劳动券，那么，他也许把国营企业职工用货币工资这件事，看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而且这又是对农村的交换应用货币，存在着商品流通这个事实所造成的结果。一旦产品交换制实行，对农村的交换不用货币了，国营企业职工工资废除货币形式将是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理由，那么完全可能是，斯大林不把国营企业职工购买消费品，比拟于私的商品生产者通过买卖过程转移其产品所有权，视为属于同一性质。这从斯大林解释商品所有权时，对购买商品的买主可以“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这样的语句，也可获得若干启示。这样的语句可以用来讽刺私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对职工购买消费品而用如此讽刺语气，不是斯大林所会作的。如果这样去理解时，斯大林的关于产品之成为商品的原因是所有权的转移这个论点，与其他论点间，也可以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矛盾。

如果上面的理解还有些理由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斯大林关于产品何以成为商品的几个论点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他的关于产品何以成为商品，与何种产品是商品的论断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于解释的逻辑矛盾。

斯大林在同书中说：

“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参阅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5 页）

“为了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必需的消费品，在

我国是作为受价值规律影响的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同上，第 17 页）

大家知道，如果“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的商品有关的”产品是商品，那么，一部分消费品是商品，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算拖拉机，那是农机站的财产。可是肥料农药总也是生产资料，这是集体农庄向国家购买的）。不是全部消费品是商品（出售给国营企业职工的消费品与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无关），也不是全部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说商品生产的原因是两种所有制并存，同时又断定全部消费品是商品，前提与结论之间缺乏逻辑的必然联系。

为什么斯大林把全部消费品列为商品呢？也许日常经济生活这件事表现得太明显了，斯大林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可是斯大林本人，并未为这个结论作出充分与必要的解释。

斯大林本人未作解释，阐述斯大林论点的人不能不帮助他作出解释。我们所见到的解释方法有两种。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是严格根据两种所有制并存的论点，用类推解释法，推论全部消费品是商品，全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参阅第 129 页注②）。这个类推解释法，在逻辑上有无可克服的困难。单从逻辑联系来说，用所有权转移这个论点，来解释全部消费品是商品，自然较为合适；虽然这是法律关系的解释，不是经济关系的解释，而且这样解释，也难免把职工购买消费品，与私人商品生产者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量齐观。骆耕漠同志走的就是这条路。

骆耕漠同志正确的指出，只要按劳计酬原则与经济核算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就不能废除，这是我所全部同意的（见本文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的论述）。骆耕漠同志正确感觉到了实际生活的力量，要求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存在下去。但他要为这个实际生活的要求，找经典著作

的根据，结果他找到了所有权转移这个论点。这个论点是马克思所排斥的，据我看，也是斯大林所排斥的。因为斯大林虽偶然提到这一点，他的原意恐怕未必是坚持了什么法律观点（斯大林会坚持资产阶级法制中的所有权观念，从他一生的革命与理论活动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事），而是指明社会主义下面生产资料从甲企业到乙企业的转移，与私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有本质上的区别。同时，斯大林又如此坚决指明了：“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要去复活资本主义。”（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5 页）如果企图阐述斯大林的观点，而采取的解释方法又是斯大林本人所排斥的，那就是一件不幸的事了。

附带说及下面两件事：

（一）我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对杜林的经济公社的幻想，不是确凿证明商品流通将引导到复活资本主义，而是确凿证明那种“劳动力应与其全部生产品相交换”的幻想，必然将引导到复活资本主义。这点已在本文第四节（四）中加以讨论。

（二）斯大林所提出的用产品交换制来实现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转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至少是无限期推迟其实行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苏联对集体农庄的下列经济措施，扩大了“货币经济”在集体农庄内的作用：（甲）提高若干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乙）增大国家收购农产品的预付款，使集体农庄有可能利用它来按月预支劳动日报酬中的货币部分；（丙）加强集体农庄的经济核算，趋势是使货币标准成为集体农庄核算产品成本、利润与农庄内部生产、分配、积累的唯一标准，以代替过去曾经存在过的货币、实物、劳动日三个标准混合使用的情况。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理论，如此紧密的与产品交换制的理论相联系着，而在

苏联本国范围内，实际生活的发展却向相反方向进行。这一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商城日记》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六日　晨六时

又是站岗

烧澡堂，代冯顺站岗。

叫醒张哲华时，取胡萝卜二个，小红薯三个。喝红茶，在外面吃生的吃掉了。

稀饭熟时，喝米汤一茶缸半。通体暖和。

共用糖 9Tea spoon full（满满 9 茶匙）。

三四天内无电与讨论题

三四天内无电，无夜工。商城城内也是一片漆黑。

决定加强学习。讨论题叫做“什么叫做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为什么人民公社——应该保护？”

厨房的秘密

厨房严禁外人入内。

倪济川、杨永新贴大字报反对厨房多吃多占，然而厨房的多吃多占取决于领导集团的多吃多占。

沈，每回晚回，必另做饭吃。昨天我特别观察谢德征给他做的饭，面疙瘩，加大量猪油，用芫荽。谢有胃病，不馋，分一杯羹给老姜。

昨晚用二个鸭子招待砌跃进灶的劳师傅，显然事后可以分润。

杨荫堂卖糖，非病号不卖，然而厨房的人大概都有。

回想从前我做首长时也相同。然而那时还是供给制。现在伙食费相同，还不准随便自购东西吃，而特殊化现象又不可免。不偷才有鬼。

所以我也偷了。

偷其实普遍之至。建猪场的人拔地里胡萝卜吃，我洗我的胡萝卜时，过路的人无不伸手。王秉三之类偷馍，其手段是拙劣的，然而不过手段问题而已。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按照苏联的现阶段所提倡与反对的伦理观念而言，可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重新定义。

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偷盗小帐等是不可免的。

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所发展的畸形。

如此而已。

应该说老实话。那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史前期而已。

十二月八日　晚六时半

担砖五次与杨学廉替我

晚饭后要担砖，我借好了刘世明的秧筐，等候集合。集合的是七八等担负建设猪场的组，与菜园、厨房、“机器”房。罗治安宣布今晚担五次，发票，谁先完成，谁先休息云云。

昨天拉车，何与我同一车，只一次，给跃进灶拉的，轻松。前晚为跃进灶担砖，担十块，路上张哲华为我去掉二块，柳学冠为我拿走四块，到家四块，比昨晚还不轻松些（来回六里路）。今晚，菜园报名七人，任务男十六，女十二，五次共520块。去车一辆，人八名，至少运四次才够数，并且不到下晚一点，不能回来。

我准备去。杨、何商议，把原来看上棚的杨学廉弄去担砖，我的天哪！

猪场、公园

沈在一次会议上说，水库阴历年内完成，劳动队就要住到猪场新建房内去，要大家努力帮助猪场建设。县委限定十二天完成。这样宣布的要大家运砖。

原决定夜工后再运二次砖，看来水库指挥部不同意。现在变成这个方案了。

架子车，水库指挥部也一律限用于水库工程，据说七八组的已收回云云。

还要修公园，沈说，水库完成后，劳动队就建公园云云。

不雇外车运输与242：2：44

据说有人提议过雇城内架子车运输，罗不同意。不是，不是罗不同意，而是沈不同意。

沈是一切技术革新都不同意的。劳动队，就应该用最原始的方法劳动。

这242人，一年来贡献的劳动，是水库的主力与技术兵种，还贡献了万元以上的公共积累。

242人中，二个死了，喝豆浆的病员48人。

柳学冠，打夯时肋骨折断，生了肋膜炎，现在肿了，今晚上还挑五次。

鲁涤园，肿了许久，现在进医院了。

检查我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学习笔记

今晨二时半起身，写我那检查人道主义思想的学习笔记。

真是活见鬼！人间何世！总路线反映劳动人民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

党性

沈万山是劳动党性的化身。

昨晚宣布评比结果，又有关于李宝仁的嘉言懿行。

李宝仁曾写信给人家，说劳动队成绩是微小的，沈深恨此事，所以不断找她岔子。昨晚宣布李是四类，说八类也可以。他说，李宝仁说我们理论不高，我还不是要斗你就斗你啦！

如今的党性都属此类。莫看沈是粗人，他是深得毛之三昧的。毛对费孝通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我得到了沈的表扬

反之，我倒得到了沈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魇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

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一九六〇年一月九日　县委招待所

日程与吃饭

七日上午整个是发言，下午还有一部分人发言，其中包括化学所的何浦。七日下午董作学习总结，把学习作了一个系统的全逻辑体系的阐述。

八日李克征作总结报告，还捎带了晚上一小时多。

七日，一天吃了三斤多粮，吃饱了。因为十二时左右还有三个饼，一碗酒酿，八日上午不想吃了。八日下午还是饿，离开会场二次，终于到招待所吃了半斤米饭，我们的伙食是面条，还加上面汤，吃得空前的饱，晚上加班开会到十二时，早上大便一次，又空了。早饭稀饭，还加了二个面饼，现在十四时，又顶不住了。肚子不是缩小，简直是愈来愈大。

又给蔡璋三斤粮票，请他代搞月饼。学习时间还要延长，真是难矣哉。

思想改造的高潮

日来出现思想改造的高潮。可惜 1958 年 5 月，赞皇整风我未经历，无法对比。

人们是激动的，特别是年轻人，激动的中心问题是社会责任感，这差不多是一项崇高的感情，比赵的牌号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服从与工具主义要强得多。赵的牌号的克服个人主义是沈万山式的。李克征到底要强得多。

但是这个牌号的社会责任感是直接引导到做驯服工具这条结论上去的。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举，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

其实，人们还昧于事物的客观规律。出身于反动家庭的人之所以被重视，出身于成分好的千千万万农村青年，虽然历史决定他至少要半生过牛马生活，纯然出于需要，而这是被决定于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社会责任感出于谴责自己的贡献少与享受多，但是一年时间若干感受以后，还各走各的路。若说培养什么好东西，是社会责任感。除此之外，全部是宗教情绪而已。

激动与交差

当此人心普遍激动之际，我也不免略有感受。没有感受，写不出东西，有了感受，可以写出一些比较像样的东西，以便于交差。今天写成了六页，连前四页，交给赵家骅，勉强在高潮中交差。

延长日期

今天下午是老红军报告，晚上还大会发言。

据说学习的时间要延长，趁大好形势，趁热打铁，这是自然的。

但我的总结的基本部分业已写成。现在十一点，下面二部分提纲写成之后，10—13 日还有四天，写，誊，大体已经足够，要写写日记。

衰弱与卑微之感

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卑微之感。

卑微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日夕奔走于食品点与蔡

璋之门，费尽心计计算时间到招待所吃二碗饭之类，觉得这个人变得下流了。

衰弱之感是从精神分裂来的。参加会议，表示积极，实际认识又是一回事，于青年人的单纯，积极，显得自己没有力量。

仔细想想，这些感觉都不必有。

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有些说不过去。陈毅宴会，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我要恢复我的精力，节用我回京的时间。我还要工作，我要保存自己。我还要战斗。而这个战斗不会是白费的，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

衰弱之感也是用不到的。大声说话，理当有此机会。历史决定时代不能是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除了现在态度，我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态度呢？今天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在李克征的讲台面前被引到一种宗教感情方面去，明天同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将被引导到更为健康的方面去的。时代会发展，变化不出十年而已。

阶级斗争还有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

比如说，一种说法，阶级斗争还有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而现在在斗哪些对象呢？

说什么思想改造等等，会造成一些神经病患者，会造成一些人的宗教感情。对社会，经济结构是无所变化的。严重的是，现在阶级斗争在斗“富裕农民”。而在这个斗争中，据说又要分别具有本位主义思想的干部，受影响的好农民，与真正的反动农民云云，那不过是掩盖在阶级分析方法下面的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而已。

再继续斗下去，又斗谁呢？

若说目前对农民的斗争，是因为农民人数太多，自给太强，商品率太低，要消灭一部分人，要强迫他们建设商品率高的农业，要强力消除糊口经济是历史的不得已，那也罢了，偏偏这又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来加以掩饰。若说紧张局势不能不借斗争的名义来设法度过倒也罢了，偏偏一方面在努力缓和这个局势，一方面又宣称要斗二十年。斗下去，势必斗到尽头，“老田鼠，你掘得好啊!”再斗下去，无非是自己而已。

大革命局面下的必然产物，Terrorism（恐怖主义）必然不能持久的。

坚定起来

所以，要坚定起来。1848 以后，马克思还沉寂了十多年之久呢。

一月十日　同地

八个钟点的夜间会议

昨晚，自由发言。从六时半起到深夜一时半左右，大部分是表示态度，还有一些冗长的人生观漫谈，二十余人说了八个小时，实在够受。

前天是小组讨论到十二时，日来睡眠实在太少了。

今天我把总结大概写起，明天誊写。今晚决定八时睡觉，好好睡一下。

这是另一种疲劳，与体力劳动不同，好受一些，老名词，开会的疲劳轰炸。

RELIGION?（宗教）

如此进行的人生观革命，陈志雄用一个问题尖锐地怀疑：何谓宗教？何谓献身精神？

确实，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这是区别家雀与海燕的东西。宗教情绪是卑微的，它引导人们趋向愚昧。

我的答复是，各个时代的社会责任感各有其表现形式，历史科学会回答这个问题。

既然达到这个结论，我对稖头（顾准大女儿顾淑林的小名）也不必引起什么冲突了。

也许采秀也希望这个局面的。

而且，从昨天与一连几天的高潮来看，青年人要避免这种宗教情绪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要强制人家做一件在他无力抵抗的事呢？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可喜的一件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

行期变更

行期变更，十七日走，决定发信给家里。

形成高潮，必然影响行期，无可奈何的。

一月十七日 同地

总结搞完了

昨天写完总结底稿，晚上七时上床，好好睡一觉。今天誊

写完毕是下午三点半，写日记，等一会儿到邮局寄东西回家。

数行期，住这里的时间还有五天，五天以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该诅咒的商城县委。但商城这个地方也反映了南方农村的一般特点。莫看吃大米，南方城市经济是发达的，南方农村苦于人口过剩，是贫困的。当社会制度限制过剩劳动力流入城市时，其贫困面貌更为突出。因此，消灭过剩人口就不自觉地执行了。科学院下放安徽、四川、河南的干部，生活都不如在陕西洛川的，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

吃的额外补给不可能了，也似乎不必要了

吃的额外补给愈来愈困难。饼子要 20 日以后才发卖，面粉机坏了，没有面粉，粮票完了，现在只剩下老蔡给的一点儿糯米粉，但额外补给的需要似乎也减低了。昨天吃馍，四个半，李鸿霞给一个，五个半，今天中午乘机加了四两米饭（招待所），下午拉了一次稀，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停下来不做体力劳动到底将近二十天了，前几天额外补充千方百计设法，到底也没有亏待肚子，看来行了。

蔡要为我饯行，有老母鸡吃，交换条件是到北京给他买东西给护士。半年来他确实帮了许多忙，彼此关系确是酒肉朋友，也要善始善终才行。

估计今后大队伙食也还有所改善。粮食不免有积余，钱更有积余，他们也要善始善终的。

鉴定与总结讨论

还有一个节目，鉴定与总结的讨论。

劳动队已有鉴定，这是可以肯定的。对我总是猜不透，敷衍一阵也就过去了。只是那又一定要熬夜，反正也习惯了。今

晚，无论如何还可以好好睡一觉的。

（原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9 月出版）

《息县日记》选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粮价，外贸与发展

昨天运麻淋雨，晚上喝了几口酒，早早上床，不能成寐。酒力促进狂想，对粮价外贸与发展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今后三十年，我国如果不断以跃进步伐发展经济，全国有半数以至 2/3 人口进入城市经济，粮价要调整了，外贸要占领世界市场，50—60 年代暴发户的日本要沦为今天的英国，这是 1964—1968 年间逐步设想过的。然而当时还设想，粮食与原料应该也可以力求自给。昨天的狂想，打破了这一限制。

我国人口增殖，除非达到全国农村大部城市化的程度，是停止不下来的。所以，三十年内如果经济顺利发展，工业经济的劳动力将达 3—4 亿人，亦即城市人口将达 8—10 亿人。在这种情况下，耕地与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将达到或超过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兰，然而粮食原料仍将有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进口。这样，不仅粮食内价将大幅度提高，世界粮价也将大幅

度提高。

如同以英国为中心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曾促进瑞典木材、丹荷乳制品、美国加拿大小麦的生产飞跃，我国经济发展将促进世界南方地区——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东南亚许多大岛包括澳新在内的精耕农业（一部分是小麦，大部分是水稻）的发展。中国工业对于矿产原料的需求，也将促进这些地方的开发。

这时候，世界将以中国为中心而活动，不仅英法，而且美苏日本都将沦为瑞典。这些地区的开发，将由本地区，世界各地移民来进行，也不可避免将由一些中国移民来进行。坦赞铁路，是这一长期趋势的序幕。

后代的历史家将要发现，自从我国打败日本以后，我国客观上即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当然，在工业尚未发展，近代化国防尚未布置就绪以前，准备不能没有，这个过渡时期早期的准备，我所持者当然还是人民战争。我所说的客观上已不存在外敌入侵的危险云云，是指积一百年的斗争，中国打败日本站了起来以后，天命中国要雄飞世界，迎击外敌入侵云云，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不免是对自己的菲薄。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蜡山芳郎的日美冲突论的是非

然而这样看待中国的前途，重心其实放在经济发展上。

要指望中国成为工业居主位的经济大国，确实要有一些狂

想的气概。外国的承袭人口论衣钵的资产阶级学者，悲叹中国资源贫乏和人民贫困，解放以后，降至六十年代，言我国经济发展前途者，犹多数局限在费孝通的乡土工业论的范围内。很长一段时期（包括今天），主导思想是古代的足食足兵，加上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一套自给的国防工业体系。这种主导思想，其实够不上“现代化”的标准，这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三十年代的苏联与日本式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半现代化的设想。

这种半现代式的设想应该淘汰，其根据是，日、意、法等国六十年代的发展，证明了这套结构必须打破也能够打破。而设置种种障碍，不令这套结构受到破坏的苏联，今天处在作茧自缚，无法自拔的困境。

迄到昨晚以前，我也受到这套想法的限制，我所敢设想的极限，是一半人口在农业、农产品自给的工农业大国。但是这是一种不合理的限制。这种局限，其实不能摆脱农村贫困和农村人口增殖率无法抑制的困境，也就是永远达不到真正现代化的目的。人口与农业资源的平衡，在我国是可以达到的，但必定要通过一个发展工业，仰给外国，然后以十分先进的科学和机械装备农业的过程(前一时期供我农产品的国家本身工业化，农产品不再能够供给我国)，即饥饿出口——进口——自给的过程。

亚非拉等后进国家的发展，直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世界市场上原料、农产和制造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富者愈富，贫者仍贫——新殖民主义对后进国家发展的限制作用的打破以至真正做到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都要通过这个过程才能达到。具体描绘这个过程，那应该是：

世界市场工业品价格的抑低，西欧北美诸国经济发展的停

滞，以至某种程度的生活水平的降低。

世界市场农矿产品价格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建设速度的加快。

西欧北美诸国的政治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仅普遍成为无条件的，而且变成反条件的。

蜡山芳郎式的日本，即一个反美的日本，必须以中国对日本的压倒的经济优势为条件。否则的话，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而且是附庸于美帝的军国主义化，在势十分难于抑制。

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足食足兵，广泛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自给国防工业体系，确实是必须首先达到的，否则，关门建设而无防卫，无法防卫入侵，目的也就在无法过渡到上述过程中去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实现蜡山芳郎式的日本，必经以我国经济上对日占压倒优势为条件，也必定愈来愈明显。所以，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续

本来预报今要转多云，昨晚东北风强，今天依然是细雨不绝。昨天下午，传达康生同志关于整党的报告，我们没有听，抓时间把搁在屋里的玉米脱粒完了。今天上午革命同志讨论康生同志报告，我们八时半起剥霉绿豆。

玉米脱粒和剥霉绿豆的味道我并不是不熟悉的。1960年剥野绿豆和搜集残粒玉米，然后危坐终日加以处理，质量与今天相仿。不过那时候还有个家，搞这些事有一种私心，现在则在革命大家庭里，为集体搞这一类工作罢了。

秋雨对农作物危害甚大。白薯要烂，豆子还没有出来，不过此后从收豆到种麦，时间就十分仓促了。棉花落在地里的收不起来了，三万亩绿豆无法打场，校部号召紧急处理后，恐怕还不能解决问题。剥霉绿豆进度慢极了，不过既然还有二三天雨天（据预报，二十九日还是阴天），也就能够剥完。

闻民族所已断粮，我们食堂粮食也快完了，预料一二天内就会组织雨中背粮。

久旱久雨，都是麻烦事。这是建校的经验。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会计上的新问题

经济大跃进后出现的会议新问题是，大批企业在生产中持续不断地进行基本建设。这些基本建设的材料，有许多是修旧利废得来的，显然也会有生产用材料拨来的以及花钱买来的。建设用工，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生产工人发挥冲天干劲挤出来的，其他如用电用水以及经常费，显然都和生产成本不可分，这些不要特殊拨款的基本建设投资，财政管理上有什么新的规章制度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从前那种削足适履的抄袭苏修的办法决不可以用。它们在会计上引起的新问题有二：第一，在企业

而言，全部用工用料分成资本支出和收益支出两部分；第二，在国家全体的而论，决不可以再抄袭苏联，以当年财政的收支为企业会计计算的唯一内容，经营基金，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增减，是全体工人阶级一年辛勤劳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1964 年前曾设想，国家要有一个总会计局。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更成为必要了。

一九七〇年九月三十日

国庆前夕

国庆前夕多雨，剥霉绿豆二天，昨天开始转多云，出了一天猪圈很累。今天在夏寨附近的田间摘绿豆，晨八时后成行，下午三时返抵本连。摘绿豆很不累，但始终遥远，回来时还背了塑料口袋一袋的绿豆，这倒是很累的。

节前项启源、孙云鹏、杨圣明三人探亲，国庆前夕沙吉才去罗山，这个房间里只剩下了五个人睡觉。“人皆有父，我独无”，当然不免想到别去五年，不知存亡的老母和孩子们。有几夜，为之深夜不寐。

然而局势之好则大大超过去年。柬埔寨引起印度支那局势的急剧变化，约旦形势又在中东爆发起一个新的革命战火，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这是明显无疑的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七日

记公报

昨天中午，有人问我，尼克松要来，知道否，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昨天上午9时已首次广播《公报》，晚联播又广播了，而且昨天的报上已经见报了。

公报是戏剧性的。中美关系则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发展。莱尔德去日、去韩，部署冲绳交还和越南撤退以后的包围中国的军事安排，对峙还要继续下去，而实力地位又是谈判的本钱。局势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发展，原因在于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使事态有戏剧性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局势确实是戏剧性的。因为，自此以后，台湾问题要解决，苏日要加紧勾结，美日关系会逐渐疏远甚至会恢复到九国公约的局面，这就把1945年以来的局面从根本上加以结束，开始一个新时代了。

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国家之间的局部妥协……（以下日记缺数页）

……从国内建设（需要革命秩序，需要反题以后的合题，需要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力求生产与业务的日日新），或确立新的对外关系两方面来说，都是不可少的。八九个月来，社会风气似乎确实大进了一步了。

去年国庆口号，还是继续斗批改，虽已提出学习主席哲学著作，着重点还是“思想革命化”，“弄通马列主义”的口号还

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明港的几个月，学习上的口号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学会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具体要求实在是（甲）进行政策教育；（乙）号召全面看问题，以历史事件为比喻，这是1948年的晋绥讲话精神，具体办法有所不同——以清查“五一六”代替“纠偏”。时势不同，措施各异，匠心巨手，叹观止矣。

不仅进行政策教育，政策也在变化。见于对外政策，亦见于清队处理政策，七一文章所指五十年的经验第二条，列为彻底揭露的共四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其他一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自巫宝三、杨坚白案处理以来，一年以后，第一次处理了曾延伟，如此大案，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据的是中央最近颁布的一项标准（我们当然听不到，走过宣读的房间窗口，听到这么一个题目）。杨坚白处理时原薪减半发给。二个月前恢复全薪。由此推测，即使薄一波这一批人，也将能够安度晚年。

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然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Huxley（赫胥黎）说，“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憾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

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

十年来的苏联经济

读报，偶然接触的这个问题，想了一番，记录下来，以备后验。

十年来的苏联经济，实际材料是十分缺乏的，几乎无所知。然而有缺点是确凿无疑的：

A. 四五年前，钢铁生产已近亿吨，度现在早已超出一亿；

B. 核武器储存，已接近美国。而近年来海军又猛烈扩大，在各洋水面上与美争霸，这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C. 利别尔曼主义一度推行，不久以前，又为集中计划的趋向所代替。消费品缺乏依然，农产品供应无显著改善。

推测所能根据者仅此数点，倘还要加上一点什么，那就是波兰事变，与阿联合同盟条约等等。

那么，能够推测什么呢？

A. 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献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于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病了。

B.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浪费与窒息的制度，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新增收入，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

C. 他们迷信物质刺激，军备工业的发展是用物质刺激出来的，实际上这还是30年代的老办法。结果，工资增加永远超过消费基金的增加，通货膨胀永远没有遏制的可能。

D. 看起来，"利润原则"可以刺激消费品的增产。然而在资源集中分配，而且永远优先分配给军事工业的条件下，允许通过价格机制来分配资源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利润原则，不仅不可能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且总是起一种发展黑市，扰乱"计划"的作用。

E. 问题的症结所在是"超平衡的发展"。超平衡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造成价格统制，与统制体制下的黑市横行的现象，然而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终究还能起一种动员资源投入生产的作用，在苏联，则因为那个笨拙、窒息的体制，连这种作用也起不了。

F. 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假使他们也采取给地方以发展地方工业的权力与责任的办法，动员资源还能深入一些。他们害怕这会分散军备必要的资源，采取多方限制的办法，于是，窒息变得十分难堪，局面也就无法改变了。

G. 也有副作用，——深入动员资源还是有人做的，那是犯法分子和投机家，他们起了我们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种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合法，范围极狭隘。而且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

这些，大半是老话。现在还应该来看一看，前途如何？怎样对付？

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正如彼得一世以后，农奴制的俄国，也曾经发展了，而且争霸世界一样。而且，只要她还是在积极扩张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迹象显出这个体制无法维持下去。

对付她的办法只有一个，挡住她，一步一步地把她推回去，瓦解她的国外体系．同时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生活水平上超过她。只是超过她和超过日本的后果不一样。超过日本，是要日本回到我们为主的亚洲体系中来。超过苏联，是从东方把她推回去（西欧，责任是十国欧洲的），并且促进她的内部的变化，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并且最能使这个历史的怪物“开化”起来。但是她永远是一个欧洲和亚洲之间又是欧洲、亚洲之外的一个独立因素，这是变更不了的。

（原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 9 月出版）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一、历史的重担

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二、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

当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罗素、费正清）都承认，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腊思想、罗马法和日耳曼人的骑士精神。要历数它的演化变迁，那是头绪纷繁的。不过这三者之中，希腊思想是基本的。

希腊思想，有“格物”的方面。开始，是类似中国的五行阴阳那一套，然而它不限于本体论的玄妙的设想，它还对我们

周围的事物作实事求是的分类，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试图为它们规定一些根本的范畴。迄今为止，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还原套原样地是亚里士多德那一套，从这里发展出来逻辑学。

希腊思想，有数理神秘主义。毕达哥拉斯发现勾股定律，举行了百牛大祭。他也跟中国的道士们那样，崇奉"河图洛书"的数理，以为那是蕴含了宇宙的秘密的。然而他们并不满足少数几个数学定理和命题，却力图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推理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直到近代初期，还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斯大林还说过几何学，因为他在中学受过古典教育。

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戆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

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产生这种思想的希腊城邦，是实行原始民主的城邦，虽然这种民主权利只限于贵族或加上上层平民，至少奴隶是无份的。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被哲学史上唯理主义所继承。唯理主义者往往是大科学家，例如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儿。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动机还是为了要证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卖友求荣，自己因受贿

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把那种知识条理化——一句话，他提倡实验，他提倡归纳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塌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它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

工具主义就是多元主义。它和希腊的静观出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仅就这一点而论，它也是从希腊思想的根子上萌发出来的。

三、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国文化的渊源，并非和工商业无关。据现在的史料，我们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商”就是因为王亥服牛乘马经商。地下发掘，证明商的都城是手工业中心。真的，超脱蒙昧时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辂”）、武器的生产有关；而现在的一切文物展览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业的产品。牧羊种地的人，可以处在蒙昧状态之下，而商人眼界开阔，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国是个大陆，不像希腊城邦那样，是商业、航海、殖民的人们的居住中心。大陆上的“百工”和文化，势必成为一

个王朝权力的依据。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艺，它就可以传播声教，可以对外征服。可是这样一来，工艺、文化就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思想”的主题就是政治权威，“格物”就永远登不上台盘了。甚至这在西方也并非没有先例。当希腊的灿烂文化被亚历山大掌握起来成为征服工具以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帝国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么创造性。当东罗马帝国被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精神（其实是希腊知识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后，拜占庭帝国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没落帝国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态延续下来，这也就是范文澜所盛赞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诚然是发达成型于周代，周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也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无根据的猜测之辞，虽与主题关系间接一些，对于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许可以别进一解。

我猜测，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艺上，多少采取一些“保密”、“独占”的态度。虽然周在西方的壮大，显然是继承了、或者窃取了商王朝所独占的文化和工艺。周在文化和工艺上采取广为传播的政策，而不着重于保密和独占。文王时代，“四伐”而仁义播于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义有这样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时代势力甚至于达到江汉，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认为就是传播文化和工艺于落后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纣，从征的小民族有八个。灭纣以后，又广事分封（史籍上未见夏、商有分封的传说）；王朝本身，只保留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从文化的王朝独占，到等级制的文化传播。当然，传播文化，也是带了刀剑去的。

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侯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诸侯国家威力所

直接依靠的（例如：战车、武器就是百工生产的），怎么能够由奴隶来干？工尹在楚是略次于令尹（宰相）的大官，难道只是奴隶头儿？秘密所在，就是王权要依靠百工，犹如文化必须是史官文化一样。

范文澜对史官文化歌颂备至。但是，龚自珍虽然没有创造史官文化的名称，却对史官文化作了极好的解释：

>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你看，描写得多好？于此可见，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史官文化的内在的逻辑结论，儒者埋怨它是没有理由的。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

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

四、中国思想是贫乏的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须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1973年3月27日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一　直接民主的理想，来自《法兰西内战》

一个人，要民主，又被“议会清谈馆”、“国家消亡”等等唬住了，当然不免向往直接民主制。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应该是从基层开始的，采取公社形式的，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即使要派代表（可不是代议士，虽然在英文中代表和代议士都是Represent），也必须是可以随时被选民撤换的；又这个代表机构，必须是真正的主权机构，等等。

不过，直接民主的概念，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所以，有必要从西方史的演变来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搞的。《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看一看他们现在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制度怎样演变过来的，它和直接民主制的递嬗关系如何等等。

还想讨论一下更切近我们的当代的问题。

1. 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

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

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英语 Bureau 就是局，机构；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

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将军，战时统率军队。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民主，其实是贵族政治——商业贵族及其子弟，有钱，从政是体面事情。

不过，当政既然要经过选举，就必须有受选民（他们可并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欢迎的政纲。当政时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选不上。雅典还有一种有趣的贝壳放逐法。一个政治家，给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的野心的时候，尽管他打仗打胜了，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

雅典在和斯巴达打了一次筋疲力竭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衰落了。亚力山大从马其顿统一了希腊（至少有二三十个雅典这类的城邦），一直打到阿富汗，建立了大帝国。后来这个大帝国分裂成几个帝国，不过这些帝国，都是凭借希腊文化统治东方民族，是彻底东方专制主义的。

2. 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它有元老院，选出两个执政官（现在的圣马力诺这个小共和国还有共和罗马的遗风），任期二年。作战，由执政官当统帅。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军队，也由自行出资装备的公民军组成。罗马人还有一种“法律呆子”脾气，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元老院用立法形式来确定。我国解放以前的大学法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罗马法。契约、债权债务、所有权，他们都咬文嚼字地订成法

律，如此等等。

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人好战，虽然罗马城还被高卢人攻破过，不过它终究先是征服了全意大利，后来和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地方，由腓尼基人组成的一个商业国家，腓尼基人是犹太人同族，老家在黎巴嫩的西顿、推罗等处）打了几十年生死存亡的仗，直到这时候，罗马还是城邦共和国。不过征服中的俘虏越来越多，原先都是自耕农民的公民，现在专门打仗去了，分到奴隶的人成了奴隶主。贫穷又不打仗的公民，共和国免费发给粮食，逐渐逐渐成了彻底的寄生阶级。可是他们还有选举权，打仗发了财的统帅们对他们施舍。共和罗马就这样准备了帝国罗马。

打胜了迦太基以后，罗马征服了现在的法国、西班牙、希腊、巴尔干全部、小亚细亚、埃及、北非，把地中海周围都统一起来了。征服和防守征服的土地，使军队成为雇佣军（原来是公民军），它造成了军阀，军阀自然变成皇帝。不过，罗马的皇帝还由元老院选举，事实上有世袭制。皇帝却从来不敢说他“富有四海”，不敢说他统治下的人民都是他的臣妾。甚至，拉丁文的 Emperor，不过是“掌军政大权的人”，不是“主人”。皇帝称为“主人”，那已是西罗马帝国接近灭亡的时候了。

至于 4 世纪以后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那是彻底承袭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所以，马克思称之为“没落帝国”。

二　中世纪的欧洲，它怎样转变到“宪政时期”的？

罗马的灭亡，是由于蛮族的入侵。蛮族是日耳曼诸族。经过一些变迁，他们实行了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这就

是说，君王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也一样）相互间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权利。初期，君王和诸侯一样，靠他自己的庄园的农奴来供给，而且，直到后来根本没有普遍全国的“田赋”。农奴只对他所属的长上负有贡赋和徭役的义务。军队，是由封建骑士组成的骑士军队，所以中世纪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坑长平降卒40万”那样的事，最大的军队也不过几万人。

据英国的梅因考证，这种等级君主制，是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那里脱胎出来的。十七八年前，我惊讶卢梭怎么写出他的《民约论》（全译应作《社会契约论》），后来懂得，那不过是他们历史传统的结果。

中世纪西方城市也不同于中国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历史上最早是朝廷所在地。手工业是王室的，同时在法律上是皇帝的私产。汉武帝时，城市的税收进入少府（帝室的财库，不是帝国的财库）。西方的城市，是由向封建主付钱赎买了他的农奴身份的自由民自治的，公社（Comune；Communism，其实是公社主义）是城市的政治组织形式。它们对谁也不担负什么义务。不过，它得防卫自己。它本身好像是一个城邦。

十四五世纪以后，在我们熟悉的英、法大革命以前，西方经历过一段开明专制主义时期。那些有名无实的国王，要统一民族国家，削弱诸侯的独立性，他们所依靠的办法有几条：(1) 组成等级会议；(2) 和城市联盟来巩固王权；(3) 对外作战；(4) 把诸侯弄到宫廷里等等；逐渐统一军权和政权。直接的征服（即王室消灭诸侯，使之“郡县化”），是有的，不过，这显然不是主要手段。

这样，议会制度就逐渐形成起来。

英、法的大革命当然是重要的转折点，不过，若没有以上的历史背景，那些革命也还是不可理解的。

三　议会的渊源及其演化

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最初的英国议会，只有一个等级：诸侯。有名的大宪章，是英国诸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诸侯利益，起来造反所争得的王室对诸侯的“不侵犯诺言”。城市生长起来了，商业发达了，关税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权利用城市来搞统一。议会的成员，从诸侯这一个成分，扩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渐地，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议会内取不到妥协，就在议会外用战争来决定问题。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议会都是斗争的中心。对比中国的历史，这又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封建君主和诸侯的斗争，本来和农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举一个例，英国大宪章，因为诸侯不许王室向他们非分勒索，规定朝廷要征收钱款必须取得议会同意，从这里就发展出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开始，它成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逐渐扩大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号召。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中

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现在还是没有。

议会的演进史，又使民主政治演进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城邦的直接民主，行政权立法权、统一于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没有“朝廷”和“行政机关”与议会之间的对立。现在，议会是在诸侯对抗王室中成长起来的，议会代表立法权，而“朝廷”代表行政权。孟德斯鸠把它系统化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

四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中的议会

英国革命以前，英国议会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革命中王党和革命党的武装斗争，是议会中的政治斗争的延续。克伦威尔之成为革命军的统帅，以及后来成为“护国主”，都是议会任命的。虽然克伦威尔的独裁，事实上消灭了议会。“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议会实际上取得了全部政权，王室不过是傀儡。

不过，直到1832年以前，英国议会实际上是贵族把持的。作为议员，是土地贵族的特权，王党由贵族组成，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后来的历史家说，19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务，全由贵族包办。

和这种怪现象同时发生的是法国革命中议会的变化。大革

命初期的议会，是英国式的。到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了。

达到这一步，通过了恐怖主义。那是真正革命的，和当时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来比较，尤其如此。

不过，国民公会时代，其实为拿破仑皇帝铺平了道路。也许应该说，是巴拉斯的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国民公会给拿破仑效了劳。不过，我们也可效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比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来看，无关重要。希特勒说过，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建立第一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士兵（他自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戈培尔曾经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第三帝国云云。

五　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

其实，1789 年议会转为国民公会是复古。马克思说过，历史总要出现两次，第二次是讽刺剧。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尚是要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法兰西内战》倡导直接民主，一方面是要消灭异化，一方面也是复古——复公民大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

如果用一种客观的批判的眼光来读《法兰西内战》，为“新法兰西政制”描绘一幅图画，你会看到：

1. 它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一切城市

公社，都是直接民主，决非代议政治的。乡村怎么办，说得很含糊。直接民主，当然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那么，像1870年的公社内部，也存在过政策互有区别的政派，它们相互关系如何？是不是也像罗伯斯比尔一样，反对派都归入反革命派，加以消灭？

2. 它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共和国要不要一个中央政府？如果要，今天我们聚讼不休的条条块块问题如何解决？《法兰西内战》显然主张彻底的“块块主义”。那么“块块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尤其如果彻底消灭私有制，“块块之间”的产品交换怎么办？按《反杜林论》，块块之间的交换决不可以通过货币，那么通过什么？

3. 《法兰西内战》主张，自大革命以来，历经两个拿破仑皇朝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要彻底打烂（今天人们对于“彻底打烂旧政权机构”的意思，作了彻底的歪曲），要恢复雅典时代的简直没有行政机构的做法。你想想，行吗？

4. 取消常备军。这事实上是恢复雅典和共和罗马的、民兵的、公民的军队。行吗？这个主张，现在苏联和我国，只在“民警”这个词上留下了痕迹。可是，“民警”，难道是马克思的不领饷、轮流义务服役的民兵的原意吗？

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对《法兰西内战》究竟说了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并不去深究，甚至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更是无从谈起了。

六 考茨基的争论

考茨基说，当代行得通的民主，只能是保留行政机关（亦

即保留官僚机构）实行代议政治，还要让反对派存在。

考茨基是和平过渡论者，他的和平过渡论，事实上给希特勒准备了第三帝国。他错了。

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他对了。他和考茨基之间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无疑的。

问题还在“娜拉走后怎样”。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之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由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阁部。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工厂的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嬗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

七　一段美国史

饶有兴味的是美国开国以后的一段历史。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华利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干脆离开了

军队。

华盛顿当总统只当了两任，第三任就拒绝参加竞选。后来的几任总统，亚丹姆斯、杰弗逊都有名望，尤其是杰弗逊，罗素还立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杰弗逊民主主义，一种全力扶植独立小农场主（我们称做自耕农，后来的《宅地法》规定，国家以低价卖给每户 3600 亩土地）的民主主义。

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联邦党着眼于发展海外贸易，反对袒护穷人的民主主义，有严重的贵族倾向。不过他的联邦党，和主流派的党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来比喻 1917 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了总统。并且，联共分成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设想一下，这么办，十月革命会被葬送掉吗？我不相信。吹嘘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上了台，他还得搞五年计划，他还是不会冒什么险用武力输出革命。正相反，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却群众的拥戴，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成为荒谬了，后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的大半倒反而是可以避免掉的。

当然，唯有美国（这个由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有华盛顿。华盛顿其人，如果生在俄国（这个专制沙皇，又兼东正教教会首脑的野蛮落后的俄国），即使不成为斯大林，也不可能是华盛顿。

八 “议会清谈馆”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不说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在来谈谈对两党的议会政治的一个主要批评：“议会清谈馆”。

议会政治必然有我们十分看不惯的地方。议会里有一套“战术”，为了阻挠议案通过，可以有冗长的演说发言，可以有议员互相抛掷墨水瓶，可以动武。通过一项法案时，要“三读”，讨论法律条文时咬文嚼字。无关重要的议案，也按正式的议事程序，可以有演说者对空座侃侃而谈的奇观。选举时会有五花八门的“抬轿子”，请客，地方大亨（杜月笙这一流人物）包办选举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贿赂。这些都不过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学家看不惯的是，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是等于没有“主义”。而且，那种咬文嚼字的议会讨论，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

刚从德国，这个盛行黑格尔主义的德国到达伦敦的恩格斯，就是这样看待英国的。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好，其实都是拿破仑第一的崇拜者，而黑格尔则曾称拿破仑是“世界精神”。黑格尔主义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英国的卡莱尔是个英雄崇拜的神秘主义者，恩格斯从他那里获得启发，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教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自然要对议会清谈馆深恶痛绝了。何况，把轰轰烈烈的1793年的国民公会和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对比一下，那种只计较一寸一寸前进的英国精神又算个什么呢？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

此”。这时侯怎样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

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

九　“保护少数派”是两党制的口号

1957年前后，我们这个一党制的国家也响亮过“保护少数派”的口号。其实，这是英国的穆勒说过的话，是地道的两党制口号。

少数派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它的政纲今天不被通过，今天不合时宜，若干年后，倒会变成时代的潮流。我们这个人间也是螺旋形前进的，看来像走马灯，老转圈，其实一圈转过来，向前进了一寸。革命是直接前进，不过，1789—1793年，只占法国近代史约200年的2%。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100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二十年。要求每天都等于二十年，是要闹笑话的，这种笑话我们经历得够了。

十　“当家做主”，“领导”，“竞争”战斗的两派变成乒乓球的两方，精神贵族

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做主。可是，希腊史上留下来的还是一些英雄。“人民当家做主”其实是一句空话。

从马克思起，社会主义者在“民主—专政”问题的争论中所要实现的是对人民的“领导”——说得最彻底的是列宁：“马克思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是少数人搞出来向群众中灌输的”（不是原文）。其所以和“议会清谈馆”格格不入，是因为那种清谈馆和“领导”概念是大相径庭的。

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你仔细想想，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做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怎么办呢？不许一个政治集团把持政权，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的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作庄”。

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

轮流作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轮流着来，走马灯——螺旋就转得起来了。

甚至两个党政纲没有差别也是好的。大将军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成为皇帝，还痛切地指出了美国有一种军界—工业界膨

大的威胁。

当然，这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像我们这个农民占80%的国家，不仅现在的政治家（不论他原是工人出身的）是精神贵族，科学家、工程师是精神贵族，中学教师还是精神贵族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培养更多的贵族，“贵族”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自然就贵不起来了。陈毅就说过，日内瓦会议时他受到了各国外长的特殊的尊敬，因为那些外长，只当一任，下台就是平民，哪里有一个元帅的威风。那个发表了白皮书的艾奇逊现在在当教授，费正清其实是基辛格的老师。美国工人子弟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多。唯其多，美国现在倒有一种强烈的呼声：美国社会上有一些底层的集团，子女受不到足够的教育，成不了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的社会中的有销路的劳动力。天天在反对精神贵族的中国，那些贵族们下乡两年回来以后，他们的贵族气味打掉一点没有？而现在高叫的是落实政策，其实是照顾贵族。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又提不到议程上来了。我们要的是进步，向后看齐实在是进不了步的。

十一　官僚机构和代议政治

行政机关，亦即官僚机关当然是取消不了的。不过常务的行政机关应该稳定，要换班只是政务官。

这一点其实已经无须解释了。行政事务本身是复杂的专门行业，政党所争论的是政策问题。

其实，在政党政治下面，部长和司长、科长的关系也不是像现在那样的“领导”关系。常务次长和司长干他们的日常性的专门性的行政工作，他们可以为这种政策服务，也可以为那

种政策服务。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你别看清谈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十二 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

你说到李自成和洪秀全。何必设想他们如果胜利怎样呢?朱元璋不是一个李自成吗?农民造反，没有知识分子成不了事，而刘基、宋濂、牛金星、李岩这一类人，除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而外，还能读到什么？不按照老一套，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权吗？萧何是秦吏，西汉的法制全套照搬商鞅、李斯那一套，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才做成了第二秦始皇，拓疆千里。洪秀全已经沾到一点西方味儿了，可是他只搬来了令中国士大夫十分厌恶的“天父天兄”，其他一切都是皇朝旧制。太平军中开始还有点军事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纸空文。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东西，在朱元璋军中也有（朱元璋靠“明教”起家，明教是波斯传来的祆教的中国版），当了皇帝以后，在史籍中把这一套涂抹得只剩下一点影子了。

所以“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枪杆子、笔杆子，靠这两杆子”，一点也不错。

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十三　补论：何以“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上面“当家做主”一节，对此论述未详，补加申论。

首先，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邦联发展的趋势）。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

还可以作一些理论的探讨。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点不错。历史学家写社会经济史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然而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理由何在？列宁作了最妥当的回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进一步发展列宁的命题，可以推论：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但是，陈胜、吴广出来了，历史只能记载陈胜、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而且，事实上秦汉之际的历史，主角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斯、赵高。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当兵，战死，其中极小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小吏等等。结果，广大农民群众的处境改善了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做主，并没有轮上他们。这不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也莫不如此。

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做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

你还可以觉得政党、政派，无非是政客组成的集团，可以认为他们当主角的这种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做主"这个原则不合，因此还是要直接民主。你也可以认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许不幸只好如此。到共产主义时代，谁都知识丰富，目光明澈，那就不会如此了。

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

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

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做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来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1973年4月20日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民主与“终极目的”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

这个答复，其实暗含着，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1917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他实行恐怖，征发粮食，然而他的根本信念是保卫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

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然而罗伯斯比尔本人不能成为拿破仑，因为他的恐怖主义得罪了一切阶层，破坏了政治的上层机构得以维持下去的内部和平。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生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后又过了40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17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1793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20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

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1. 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 1789 年、1870 年、1917 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 1789 年、1870 年、1917 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 1917 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1870 年以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都耽误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有过霍布森（John Aileinson Hobson）（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维布伦（Veblen）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西

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1914年是1945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20年中从60%上升到82%，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40%用于军备；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相互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

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施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 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 1000 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

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1973年4月29日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

1. 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要在下述两个命题中选定其一：

真理是绝对的。……（1）

真理是相对的。……（2）

命题的最素朴、最简单干脆的形式，就是上述（1）、（2）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附加许多条件，有时候甚至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命题“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例如，《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2章第5节所引《反杜林论》的下述一段话：

>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应该略为做一些精密的分析（当然不免是“机械论”的，而不是辩证法的）。

我们试把上述命题分剖为二：

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的思维

是至上的。…… (3)

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某些时候的现实来说，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 (4)

显然可见，命题（4）对应于命题（2）。命题（4）的结论是：“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这也是说，人所能掌握的真理，是相对的。而命题（3）则对应于命题（1），结论是：“人能够掌握绝对的真理。”

可见，命题的形式不一样，一个是“所能”，一个是“能够”。暂时放下不说，到下面再加以讨论。

又命题所附条件也不一样，这又和命题的形式不同相互有关。

2.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命题（2）与（4）。

按恩格斯所附条件，可以又分剖为二：

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

按人的思维所处的某一时候的现实。

不妨问一下，这所谓个别和某一时候，按照过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设想到的状况，是不是所有的人概莫能外？

如果回答“是”，那么就归纳法来说，这就是普遍的无例外的状况。

不过，我们回答“是”，未免过于武断。谨慎一点，可以说：（A）按过去历史，未见例外；（B）推测未来状况，我们还想不出会有例外状况。

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或许是普遍妥当的——它的或然性极大。

归纳法所能得到的结论，只能这样。

归纳法以经验为根据。归纳法是笨办法，就已有证据——

检验，有时候，甚至流于极端机械的统计方法，用机械的数字来举出或然率到底是大是小，——而且仅限于已经经验到的。至于未经经验的，只能根据已有的经验来推测，而这种推测的可靠性就更小了。

假如我们笨，缺乏想象力，只敢用经验方法——归纳方法，那么，我们说命题（2）或（4）是几近于完全普遍妥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经痛骂过归纳法。不过，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吧！

3. 再来看一看命题（1）和（3）。

这里的条件是：按人（或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结论是：“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原文。从这命题推到真理的性质的时候，我妄加窜改成为“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里，从“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推出“人掌握的真理是绝对的”，似乎与条件的性质不合。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条件。条件是“按照”……，所按照的有：a. 本性，b. 使命，c. 可能，d. 历史终极目的。

这四个按照的“东西”，可以说，无一不是理想性质的。其中“可能”一项，理想性似乎不太明显。不过，假如把它解释为人的潜在的神性的话，理想性就十分突出了。我相信，我不至于曲解了恩格斯的本意。

所按照的“东西”是理想性质的，所以推出的结论，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只是或然性极大（允许我说，其实这个或然性还是未曾验证的）的能够。

4. 所以，用平易的、笨的、人世间的、经验的语句来分析恩格斯的话的意思，似乎可以说成下列二节话：

甲、按经验归纳，人所掌握的真理，从来都是，今后也将

几近于完全是，相对的。

乙、但是这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是万物之灵，就人类总体，及其所要达到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

5.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6.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顺便说说，最近看一本西方的经济学文摘，西方的教授们，也有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内部的革命，外援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

而且，历史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7．最后还想说一点。

“真理是相对的”。

这在逻辑上叫做判断。现代逻辑学，承认判断总是出于经验的概括。经验的概括，总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

不过，古典的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认为判断是，把一种性质赋予判断中的主词。判断，是形成概念的途径。概念，他们模糊地承认，那是出于归纳法的概括；不过，他们总不免赋予概念一种神秘的性质，即：

概念虽然来自事物，可是一旦形成概念，概念的品格就高

于各个具体事物了。

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免把“绝对”的意义赋予判断，认为一切判断，都有绝对的性质。

列宁说，你说“真理是相对的”，这就是把相对绝对化了，你至少承认“真理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真理，其根源来自：判断的绝对化。

所以，请你注意，我在第二节中，力求避免这个判断绝对化。事实上，任何判断（除了纯逻辑的；太繁琐了，不谈它了吧）都不能是绝对的。

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于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过任何经验的证实。

8. 关于“进步”的争论，我可以让步为：“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

这算行了吧。

1973年5月3日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一、《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

1.40年前，在《资本论》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实际斗争的行列，但是系统地读《资本论》，19年前才开始。这以后，曾长期地作过一些由《资本论》引起的历史和哲学的探讨，没有重读《资本论》。感谢促进者，这一回又翻开了《原始积累章》，并联系地读了《共产党宣言》。

这一次重读，是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过的几点的：

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①，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

① burg为市镇，burgher为市镇人民，相对于乡村人民而言。黑格尔《法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以前各卷文章，“市民”和“市民社会”联称。细读《共产党宣言》第1章，可以知道这意义，恩格斯1888年所加附注，正是为了不愿意burgher再从往昔的广泛解释而加上去的。

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

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①]，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所以着重写劳动者怎样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被剥夺成为从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的一无所有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

阐述的目的既不同，论证的方法自然也不同，至于作者的立场当然是始终一贯的。

2. 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100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100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

① 现在的《资本论》中译，有些地方似乎还值得斟酌。例如原始积累章之四，英译标题为 Genesis of the Capitalist Farmer Genesis 套《旧约》的〈创世记〉，有一种真实历史的神话的意思。中译为干巴巴的“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发生”。此外，protestant 是新教，这是中国人习知的名称，直译应为“抗议教”。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是和基督教有关系的、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积累章涉及大量西方历史，译文似需进一步推敲（按：顾准写此文时，《资本论》新的中译本尚未出版，此处指郭、王中译本）。

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

这不过是历史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因此，这个笔记的范围就不免要宽泛一些——也许是大而无当的。

二、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

1．“市民阶级”在欧洲文字中的语源，我没有考究过，也许这是中世纪以后才有的词汇，并不是从希腊拉丁文字传下来的。不过，马克思下列的几句话，显然承认市民阶级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共产党宣言》，1971年版，第25—26页及第26页脚注①）

“在意大利……大多数的城市，是罗马时代传下来的遗产。”（《资本论》第1卷，1954年版，第905页，脚注189。译文据英文本改。英文是In Italy……the towns，for the mostpart as legacies from the Romantime）

罗马共和国是城邦共和国，罗马时代意大利的各城市都有城邦式的组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世纪中期，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这些商业共和国，或商业一手工业城邦，十足地承袭了罗马时代的遗风，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吉本（Gipp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还告诉我们，威尼斯在古罗马是海滨荒村，蛮族征服罗马的时代，许多富有的罗马人避兵乱到那里，她逐渐扩大起来，不过没有成为“世外桃

源”，却发展成为一个借商业为生的城邦，以后变成一个足以左右十字军行动的、富有的、有强大的商船队和海军的、威力强大的商业共和国。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这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中国人却往往忽略这个特点，并且只把这种渊源推到欧洲的中世纪，还接着来了一个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

2.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必须批判。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会大部分保存下来了。13 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使被基督教神学掩盖掉的那部分，欢乐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具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观。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随而肯定，迄今的西欧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目光所及，以中世纪为限，不再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种种误会，可以说大部分由之而起。所以必须略加叙述。

希腊人本来是北方的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的时候，开始也以务农为主。有些部族，所占土地肥沃，一直务农下去了，斯巴达就是其中之一。大部分部族，所占土地太贫瘠，几代以后，土地上的出产就养不活愈来愈多的人口了

（最著名的是雅典）。可是爱琴海域海岸曲折，海域不宽，岛屿密布，周围又是一些早已具有高度文明的富裕的专制主义农业王国或帝国（埃及、巴比伦、波斯……），或者是已经相当开化的蛮族（北非的柏柏尔、欧洲的高卢、凯尔特、拉丁……），于是航海、商业（进一步兼及精制品的手工业）、殖民就成了他们的传统。

希腊人的特殊环境，使他们无须组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来抵御外族，他们组成一个一个城邦，他们的政治基本上是民主的，当然是贵族中的民主。有过所谓僭主政治，有过斯巴达那样的特殊类型的尚武的集权国家，但从未建成同时代埃及、波斯那样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家。

希腊时代的学术，有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很笨，一件事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一些不容怀疑的自明之事，他们要制成什么“律”、什么“律”的。例如，“甲是甲”，中国人从不进一步考虑，他们却说这叫作什么“同一律”，并由此推出矛盾律、排中律之类。他们的哲学，考究宇宙论，如地水风火是宇宙的四大要素之类。中国也有，五行学说即是。不过他们从这里出发，期望对自然作出精确的分类，还引申出什么概念、判断、推理之类的逻辑学。中国人的宇宙论，不经过什么中介，立即应用到“正名定分”、“圣君治天下”之道上去，要不然来一个庄子式的一切虚无，于是，实际生活，客观事物的考究，就被排除在士大夫的冥心思索之外去了，等等。

希腊时代有些东西，在现代的中国人看来，惊人地“现代化”。希腊世界曾经团结起来抵抗波斯帝国——希波战争。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立即开始了以雅典为首的一个集团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一个集团之间的长期战争，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

学家修昔底德斯写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开这本书，我们惊异地看到，由欧洲人带到中国、带到全世界的一套国际关系的惯例——条约、使节、宣战、媾和、战争赔款等等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不知道的东西，已经盛行于当时的希腊世界。这一套国际间的法权关系，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

罗马人几乎全部承袭了希腊传统。他们唯一的独创是法律，而这是近代欧洲“不可须臾离之”的东西。

不过希腊罗马文明在东罗马帝国却承袭得大大走了样。它的根干，在西欧虽有日耳曼征服的“遮蔽”，却和日耳曼精神混合得更向自由化走了一步。在拜占庭，它和巴比伦的东方专制主义结合，成了所谓东正教文明，其正干是今天的俄罗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女儿嫁给俄罗斯的基辅大公，俄文字母是东正教教士帮助创制的。俄国人说，罗马是第一个罗马，拜占庭是第二个罗马，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永远不会有第四个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是西方唯一的商业发达城市。它的商业的一大部分是通过“丝路”西运的丝绸转口贸易。这个帝国对于商业的态度和中国一样——当作帝国的摇钱树看待。它的朝廷奢华，国势衰弱，而皇帝特别装腔作势，显出无上的威仪。马克思称之曰“没落帝国”。

3. 在这里，宜于说说中国的城市和市民了。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国城市发达得很早，航海技术发达得也很早。春秋末期，吴出兵攻打齐，一路军队是从海上运去的。洛阳、临淄，是早期的大城市。中世纪欧洲的商业规模，从一些经济史文献可以看出，那是十分可怜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对于当时的

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华，惊为天堂，而马可·波罗还是从威尼斯来的。拜占庭依靠丝绸转口贸易为生，而当时丝绸的唯一来源是中国。这就是说，中国从不缺少商业。陶希圣甚至断定，唐代的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参见《文物》，1973 年第 3 期，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

这是中国传统和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外国人对此是不了解的，正如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一样。最现代的一次误会，就是英国唆使广州的陈廉伯组织商团企图赶走孙中山。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17 世纪）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4. 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更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在法国干脆称作公社——Commune，共产主义的名词由此而起，巴黎公社的公社两字，也袭用了这个传统的名词，这种城市自治体的内部关系是：

> 13 世纪（英国）大小不同的城市都已多少取得一点自治。城市现已摆脱了封建的勒索，其主要目标是将它的商业掌握在它自己的市民手里。所根据的原则是，只有对本市的自由出过一份力的人才有份享它的特权；由于市民组成的商业公会，这个目的达到了……
>
> 14 世纪之末，伦敦市长只可由 12 个大行会里选

出。

上述引文，摘自英共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1962 年，三联书店版，第 56—57 页)。我没有把城市内部的阶级特权和雇工等的无权状态等文段摘录下来，我不是不注意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我只是想指出，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甚至是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沙皇统治下所不允许存在的。一个苏联人写的《苏联通史》叙述过，俄国（大概是诺沃哥罗德）有过城市公社，不久就被帝国勒令解散了。

城市自治是怎样取得呢？是赎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莫尔顿书上说：

> (12 世纪末，第三次十字军兴起之际)需要额外的现款。这些款项的筹措方式不一，最重要的是向城市出卖特许状。这些城市仍赖耕种他们的公地来维持，它们所以与周围的乡村不同，主要是因为市内土地保有权的条件有较为自由的倾向。然而，城市常要负担种种既无理而又苛刻的地租和赋税。城市渐渐发达，与领主们订立合同，约定交纳一笔总款项，更常见的，交纳一笔年租以免除他们的种种义务。要做这事，便不免给予一纸特许状，设立一个集体负责交租的团体……
>
> 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体”兴起了，结果形成了准备加入政界的新阶段……(第 59—60 页)

在中国，朝廷兴军筹饷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联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Contract to Status)”。中国，这类问题由简单的16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

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共产党宣言》说：

>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1971年版，第26页）。

原来，十四五世纪，欧洲在彻底的分裂中兴起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国家大半经过一段专制主义或开明专制主义的时期。可是，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的王权，是依靠了城市来同分散主义的封建贵族斗争，才做到了国家的统一的。说老实话，我初读欧洲史，简直不知道这是说的什么。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上宝座。再深入一些，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缺钱，有著名的“杨可告缗”，征收财产税，对象主要是商人，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知道秦制，戍边，发谪吏、有罪有市

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曾有市籍者；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欧洲各国现代诉讼法中，个人或法团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其另一方是国家。个人权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当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看到其中强烈谴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的时候，千万不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

5. 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

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三、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

1. 既然市民阶级渊源甚古，又，既然希腊、罗马的城邦并未产生出资本主义来，那么，从这一条，就可以达到本节题目的结论。架空一点讲，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马克思再三论证过的。何况，中世纪城市的特点是行会制度，它不是大量生产的，不是合理经营的，它对经营规模是限制的而不是努力扩大的，它对行东、帮工、徒弟施加一种封建式的身份限制，所有这些，都使中世纪的市民阶级（burgher）迥然不同于现代的资本家（Capitatist），这一点，《共产党宣言》也有所论述。

不过，《宣言》着重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的奏凯行进。《宣言》并没有指出那些落伍者，为了说明“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资本主义来”这个命题，我还想列举一些向资本主义进军中“市民阶级”的落伍者。

落伍者第一号是意大利诸商业城邦和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等等。这些城邦共和国，曾经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度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她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可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她们衰落了，那里的市民又返回到农村经营起园艺式小农业来了。（见《资本论》第1卷，1954年版，第905页）可以把此事解释为航海殖民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海岸，地处地中海的意大利不适宜再成为中心。然而，16世纪上半期西班牙霸权的崛起，囊括新大陆的移民和贸易，扩大疆域及于整个欧洲。甚至意大利也沦为它的领土，看来与它们的衰

落也不无关系。那么由此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也许有些道理：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的。

类似的例子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十二三世纪及以后，她也曾显赫一时，甚至当时波罗的海最强大的立陶宛—波兰王国也向她借债，仰她鼻息，可是到十五六世纪也衰落了。我手头贫乏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解释汉撒同盟衰亡的资料，推测起来，意大利诸城邦衰落的原因，也许也适用于它。

第三个例子是西班牙诸城市公社。西班牙首先发现新大陆，征服拉丁美洲，掠夺大批金银回来，并且由于这些财富，使得不久前从反伊斯兰哈利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崛起的西班牙王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可是这一航海、商业、殖民的伟大成果，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竟毫无着落。原因何在，我摘录一段文献：

> 西班牙在16世纪初时……存在着大量的自由城市——公社……等级制的国会依旧保留极大的意义……1519年卡斯提腊国会向国王宣称：“陛下，你要知道，国王只是领俸给的国家公仆。”……1520年春，卡斯提腊国会对国王提出……（一）（国王）不许离开卡斯提腊（那时查理的西班牙，领土遍全球，1519年兼德国皇帝）；（二）禁止黄金出国；（三）撤销外国人的高级官职。查理拒绝了这些要求……1520年6月，在卡斯提腊爆发起义……主要动力是公社城市……1521

年起义失败……查理五世与城市分裂，并和上层贵族联盟……马克思说：“西班牙……贵族政治虽然已趋于衰落，却没有失掉它危害性最大的特权，而城市虽已失掉它中世纪的威力，却没有获得现代的意义。”（谢缅诺夫：《中世纪史》，1956年三联书店版，引马克思语，见他著的《革命的西班牙》）

总而言之，野心勃勃的皇帝要世界霸权，把城市当作金鹅，并且还杀鹅取蛋，以致城市既失掉它中世纪的威力，又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于是西班牙就一蹶不振，而航海、商业、殖民，对它竟毫无收获——除今天拉美各国（不包括巴西，那是说葡萄牙语的）说西班牙语以外。

以上三例，都是产业革命以前的。列举它们，无非说明，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途上并不都是成功者，有许多倒下去了。也说明，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可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它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后面这一点，中国人应该是懂得最多的。

2. 跟着西欧编年史往下数，数到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就不免接触到产业革命，并且要问产业革命的背景何在？它何以发生于英国？可是这一来，就接触到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怎样给“资本主义”下定义？

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是指私人所有的，以谋利为目的，采用机器生产和合理经营方法的那种生产方式。我不敢代表全体中国人说话，不

过我分析这种观念的来源，不外（1）工场手工业，咱们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2)使中国人震惊于资本主义的威力的，最初是船坚炮利，后来是它的“商战、学战”的威力（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母校——留云小学的校歌，开头的几句是：“滔滔黄歇浦，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我学会唱这歌，是在1922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究竟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不对？

我也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作过多年的探索，我发现，他的定义，集中在一点上：

>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附注)。

这就是说，凡不是以行东帮工的关系处理雇佣关系，而以雇佣劳动方式，即“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要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的方式处理雇佣劳动的，是资产阶级，不论那是工场手工业、农业，还是机器大工业等等。马克思所以采取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因为他悲叹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自己的劳动所异化了——这是他的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现在读《原始积累章》，看到他从“农民土地的剥夺”开头，看到他把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或几乎唯一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了他的学说的“发源地的秘密”(这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评论黑格尔的用语）之后，就不难理解

了。

可是，坦率地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对这一点是不懂的。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必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兵士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这种自由劳动者也曾经成为手工工场的劳动者，范文澜《中国通史》序言就曾经引证过一些材料。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

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200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5000万人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大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这种确实，也不过是程度上的问题。因为如果它们的人口确实如此不足，就不会有逃亡到城里因而获得自由的农奴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1]；合理经营（包

① 科学技术知识的发达，是因素之一，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南齐祖冲之的数学著作，竟然在唐代失传了，因为没有人看得懂。礼教的中国，这类学术的成就，必然是要湮灭的！

括复式簿记)[1] 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如果这几条是合理的，那么，蒸汽机之类的发明应该归到科学技术这一条概括性更宽的条目中去，这一点，在100多年以后的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3. 经过以上考虑以后，我不免要以中国人的狭隘性，坚持我的资本主义定义了。我的理由还是狭隘的中国人的立场。18世纪末期产业革命以前，欧洲通过航海、商业、殖民确实大大扩大了它的地盘，它在文化上已经有牛顿、莱布尼茨、康德、休谟、洛克、杜尔阁；它已经征服了印尼、菲律宾，并且开始征服印度，美洲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已经有了国债券，有了英格兰银行，有了许多殖民公司。但是当时进步的欧洲对沙皇的俄国、苏丹的土耳其、天朝的中国，还没有显出压倒的优势，相反，那时中国状况和中国知识开始为欧洲人所知道的时候，他们对此还十分歆慕[2]。欧洲文明的潜在优势那时固然已经十分明显，不久就要体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在产业革命以前，也就是在它还没有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前，它还不足以风靡全球，还不足以使“各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之下”“变法自强”。

我这个狭隘的中国人的想法，从另一方面，即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衡量，也许并不算是狭隘的。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

---

① 桑巴特认为复式簿记的发明，其伟大可与血液循环相比。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鼓吹现代化最力、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亲自翻译过复式簿记的书。

② 魁奈的重农主义，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福音的，是中国康熙皇帝的政绩，是中国的重农抑商传统传到欧洲以后启发起来的。

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个大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后代的我们，可指出它的法权体系、思想体系是其后来强大物质力量由以长成的基础，但是当它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前，它还没有证明它自己优越的证据。假如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希腊罗马文明两者间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密的话，我们未始没理由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产业革命以后那种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把产业革命以前的工场手工业，有组织的金融方法，规模十分宏阔的航海、商业、殖民，都看作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准备阶段。

4. 如果我们这样定义也还有几分理由的话，我想进一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发源于英国？

理由不外是上面所举的那些。复述一下：

甲、就历史背景而言，那时的英国承受了古代及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并且，因为英国本身的特殊条件，还发展了这些有利后果。

乙、所谓英国本身的有利条件，有：第一，它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力量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这个统一的王国还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可与上举西班牙相对比）；第二，这个统一的王国作了异常的殖民扩张，但是它不是以建立一个罗马式的拿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它确实有成片的殖民地，即北美，不过，那是古代希腊式的殖民地，——对母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殖民地。

丙、它在航海、商业、殖民扩张初期，虽然也利用了个人冒险的私掠活动，基本上采取富于商业冒险精神的贵族所组成

的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可是，产业革命却不是这些垄断公司的业绩。

这是国家采取商业本位主义国策的又一证明。19世纪中期，穆勒的书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物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这其实是17—20世纪三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以此与中国汉代开始的盐铁国营，及其后连绵不绝直到清代的食盐官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商的传统相比（其实，中国在远古的商代，手工业就是“国营”的），可以更加突出地看出它的特点。

丁、产业革命后，英国进行过多少次战争。以拿破仑战争为例，英法两国在战争中的经济政策成了鲜明的对照。拿破仑在经济上控制一切私商，要他们为帝国效劳，他要金蛋，只是不杀掉金鹅。拿破仑禁绝出版自由，只准有御用的立法团。英国则放纵资本家无限制剥削童工（资产阶级的西方史家至今还以此为历史的羞辱），用公债来搜集所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用公债搜集战费当然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拿破仑的政策的结果是相反的），以收买大陆上的王侯和拿破仑作战，它自己基本上只用海军力量作战，只打了一次滑铁卢战役，那已经是“做结论”的时候了。英国的这种态度，在拿破仑战争以前（亦即产业革命以前）的历次战役中都一样，如反对西班牙帮助荷兰解放之战，如反对路易十四之战，等等。

其结果，英国的对手，采取王朝本位政策的，虽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都相同，却无例外地抑制了发展。而在英国，每一次战争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是产业革命。

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历史，无非想说明：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

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5.“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命题如果是真的，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一系列命题：

（1）历史地说来，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

（2）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俄，到日，这样传布的。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

（3）在具备了所有必要条件中好几项的国家，如英国：产业革命后接受产业革命迅速；而具备条件愈少的国家，接受愈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

接受方式，可以分为法国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国土耳其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

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4）由此可以推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

附带说说，对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委婉地列举证据加以驳斥过。此书论证细致，搜集材料丰富，篇幅不大，倒是值得一看的。

（5）最后，想说一下“忍欲”、“节约”与清教徒精神问题。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其间，并不仅仅是“节约”和“忍欲”，还要加上（a）不是仅仅为了传子传孙，永保富贵，甚至有100亩田就教会儿子抽鸦片以图保产的那种“节约”，而是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企图在一个领域里打出一个天下来的那种事业心。熊彼得曾引北欧航海家庭的门侧题词来说明这种精神：“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b）“上帝的选民”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以上几种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这是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经过一系列历史事变激荡出来的精神面貌。它支持了美洲的拓荒者（Pioneer fathers），支持了克伦威尔的革命，形成了商业事务中的骑士精神。

马克思虽然反对忍欲、节约之说，可是他对于这种清教徒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作过充分的估计，不过，没有也

不会写到《资本论》里去而已。《资本论》全书要论证剩余价值的非正义性，当然不会说到这一点。而清教徒精神事实上也是十七八世纪的产物，到19世纪西尼耳提出“忍欲”之说的时候，资本家老早是世传的“贵族”，不是凭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人物了。马克思对清教徒精神的估计，散见其他著作，也没有作过正面的赞赏。马克斯·韦伯得到马克思的启发，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我仅知书名，没有读过。

应该承认，这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持。没有这种精神支持，资本家哪里会有创事业精神，哪里敢和贵族王权抗衡。其实，即使在这种精神支持下，19世纪英国资本家还是甘愿让贵族出头露面——当首相，当将军与外交官，他们自己还甘愿在政治上当配角。这样看来，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忍欲、节约之说，迄今还是西方经济学家持以为股息、地租是合法权利的凭据，这却应该严厉反对。西方进步经济学家，虽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持否定态度。

这种清教徒精神本身有其残酷的一面。加尔文残杀异教徒比得上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当它被无耻的贪婪资为借口，来贩奴，来残害童工，还说在拯救人们灵魂的时候，基督教徒也指摘他们是财神（摩门）教徒了。

四、余　论

1. 资本主义靠原始积累起家，其初期内部剥削十分严重，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资本的每一毛孔都在渗出血污，这么说是毫不过分的。不过，随着这种剥削积累形成的生产力的逐步

发展，工人生活水平必然逐步提高。恩格斯重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所写的跋，描写了40年间英国工人生活的变化，这是上述命题的第一次历史证明。到本世纪初期，这种历史证据似乎还嫌不足，所以列宁认为，这是英国垄断资本对殖民地超经济剥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60年后的今天，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普遍规律了。

其实，资本主义从英国向各国传布的过程中，这种普遍规律还成为后进国家得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这就是说，先进国家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提高了它们的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它们的物价便宜，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上世纪70年代以后德日两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罗素曾经指出，那时德国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每月工资“不过”70美元（按当时英美水平大概算是低的，我们现在看来则高不可攀了），这是德国化学工业很快独步世界的原因之一。

附带说说，德日两国都在兴起之际取得一宗赔款（德国从普法战争，日本从中日战争），这对它们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不过比英法两国在二三百年间海盗式的商业和殖民掠夺所得，到底要少得多。它们的积累大部得自内部来源，它们还没有19世纪初期英国童工那样的惨剧，俾斯麦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保险制度（那是为了取悦工人，抑制资产阶级攫取政权，推行皇朝本位政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们迄今记忆犹新。不过“二二六”事变的原动力是少壮军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未能在收入较高的现代工业中就业的农村居民，少壮军人的口号是“打下满蒙，殖民满蒙”，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武士道精神，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经过一次战争，日本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技术教育普及，来了一个20年的“神武

景气”，工资水平差异这个因素的作用就看得格外明显了。

工资差异的另外一个因素来自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类型——美、加、澳、新那种类型。其特点是广阔无垠的新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事实证明，这种家庭农场类型的大农经营，比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更加有力，读《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关于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创世记》这一节，必须不要忘掉这件事），造成高工资的底子，它促使工业一开始就不能不实行高度机械化，产生了福特主义、泰罗制度、产业合理化等一套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未见过的东西，这自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激起反应，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不管怎样，总之，资本主义发展提高了工资水平，而不是压低了它。要对此作合乎事实的理论分析，还可以说许多话，因为前面已经说到过，这里就从略吧！

2. 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工资水平，这是事实，是否认不了的。有人闭着眼睛说瞎话，在说“绝对贫困化”，这是违背事实的。

这也是对马克思的歪曲。（1）马克思本人，分析过绝对剩余价值，以明显的文句，分析过工人物质生活即使逐步提高，相对而言，他们还是愈来愈贫困化了。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绝对贫困化。（2）马克思本人，指出工人的工资，被其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但是，他所说的必要，显然是弹性的，换句话说，是水涨船高的。马克思本人，如果认为工人生活水平会从资本主义发轫之初的一般平民生活水平逐步下降到“收租院”的水平，他还能是马克思吗？（3）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在哲学上坚持无产阶级是人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

产品异化出来的残缺不全的人的观点密切相关。从这个命题出发，资本主义不消灭，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不回到社会化的人手里，这种异化不会结束。无论他们吃得也许好些了，它总是处在可悲的贫困状态中。不管我们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采取什么态度，总之，不了解他的这种理论，也就不会理解他的贫困化的理论。

现在人们絮絮叨叨地谈绝对贫困化，正和不谈佛教寂灭哲学，却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谈圣保罗的原罪和救赎哲学，却跪在圣马利亚像前祈祷一样。这种现象必然会有，可是不必去争辩。

3. 不过，在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必然提高工资水平这个普遍规律的时候，必须同时指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要靠职工运动的斗争。还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职工运动不易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提高工资的要求也只能逐步发挥作用。一句话，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贫富不均现象总是突出的。

理由何在，不难找到。要通过资本主义来现代化，必然要鼓励创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积累看作人类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即使他“忍欲”了，这份积累还可以变成坐收利息不劳而获的特权。这必然要鼓励他一方面实行无限制的剥削，一方面把个人生活搞得穷奢极欲。事实上，现在世界上一切新兴国家的现代化，都有这么一个大问题。人类比200年前聪明一些了，残害儿童已经不能忍受了，所以，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1973 年 6 月 11 日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辩证法与神学

一、《反杜林论》以外

（一）《反杜林论》以外的关于辩证法的论证和解释——一个对照

我这里想就《反杜林论》第1篇来探索一下辩证法问题。不过先摘录两段《反杜林论》以外的著作，也许是有意义的。

一段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写于1888年，比《反杜林论》的写作时间1878年晚10年。

黑格尔哲学……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就再也无事可做

了……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上升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另一些，摘自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跋》里提到过它。并赞许过它。列宁也十分重视这本书。

除万有（all）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神，是真理和生命。

那么，这究竟是逻辑还是神学呢？

是逻辑，也是神学……所有的大逻辑家，都很注意神和神德，而所有忠实的神学家，都试图把他们的主张安放在某种逻辑程序上。逻辑按照它的整个的性质，是形而上的……

……企图否认神的领域（celestial region）与理性的领域（rational region）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那些人）都是所谓形式逻辑的信徒……

形而上的逻辑（按：狄慈根此语，系指辩证逻辑或辩证法而言。所谓形而上，是指超乎仅仅物理的东西以上〔Metaphysics〕，非黑格尔用来指形式逻辑的A＝A那种呆板特点的——作者）的目的是要把它的领域扩大到永生之界，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

一切知识的最后的问题它都谋求解决……

……你应该注意，真理的学说的显著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它使人民有逻辑上的依据，好去否认一切教士主义（clericalism）和神秘主义（mysticism），并在这神圣的真理所居住的那个世界中，谋求他们的解放。

狄慈根此书，写于1880－1883年，原名为《论逻辑书——特别论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逻辑》。他把辩证法看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从来没有受到过反对，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译者柯柏年（我所据的是1949年中译本，此书最早译本出版于1929年，再版于1939年）亦然。

《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那段话，是彻底“反神学”（?）的，至少，就措词来说，和我那个《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笔记完全一样。狄慈根公开把辩证法等同于神学，但是未受“斥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神圣家族》——指责逻辑泛神论

原来，狄慈根不加掩饰地，甚至是更加公开地袭用黑格尔的“原意”。而黑格尔的原意，马克思曾经一度指责它为“逻辑泛神论”，然而不久又回到了黑格尔，这就是所谓“费尔巴哈倒脏水，连孩子都不要了，而马克思则批判地保存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的意思。狄慈根的那些话，确实是黑格尔的内核，马克思在《资本论·跋》中用另一种用语说了同样的话。不过，既然马克思是保留其内核而又加以改造，用语就不能像狄慈根那样随便。所以，哲学家们赞许狄慈根的时候，必定还要加上一个保留，狄慈根用语不精确。

现在，让我们先来考据一下“逻辑泛神论”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指责黑格尔，一生中几乎只限于写《神圣家族》那个时期，亦即《费尔巴哈论》里所说的“我们都一下子成了费尔巴哈派”的那个时期。在这个极短的时期中，马克思几乎完全否定了唯理主义，几乎完全跟后来恩格斯称之为机械唯物论的英法唯物论走。《反杜林论》篇末“导言”摘录了一段马克思对英法唯物论的赞美之词，初见于《神圣家族》。还有一件极其有趣的事，边沁，这个英国的所谓哲学激进派头子，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把他骂得极不像样的，在《神圣家族》里也被马克思戴上一顶“唯物论”的桂冠，1892 年恩格斯在“导言”中终究没有把这段赞美之词摘录进去。

那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究竟何以是“泛神”的呢？按照我的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辩证法＝世界模式论。分别说明几句：

1. 黑格尔的逻辑学，不仅仅是研究思维规律的科学，而是整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这还不太确切，下另有说）——的秩序和规律的“科学”。这个世界的秩序和规律的特点是辩证的，所以黑格尔的逻辑是辩证逻辑。

2. 这个世界的秩序和规律的特点是什么呢？(一)质量互变（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存在论”的根本特点）；（二）矛盾统一（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本质论”的根本特点）；（三）否定之否定（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三部分“理念论”的根本特点）。

3. 作为以上三个规律的基础的，还有两条主义：(一)真理不可分主义。这就是说，你研究局部事物的真理，因为它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孤立研究是发现不了它的真理的。唯有

在森林中才有树木，所以，唯有从森林学去研究树木才能懂得树木的真理。这也就是我们反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那条原理。（二）事物真理性的一元主义，而不是多元主义。这也就是说，真理只有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是不行的。这也就是恩格斯以客客气气的方式和赫胥黎争论不可知论是不对的（《反杜林论》书末所附“导言”是针对赫胥黎写的），列宁脸红脖子粗地斥责卢那卡尔斯基（《唯物论经验批判论》）等人的“相对真理论”所本的那条主义。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的“逻辑泛神论”，始终也没有批判我上面所学的三个规律和两条主义。他批判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例如“概念”比具体高，例如黑格尔的“推论”是“本质的铁”等等。马克思按其本性是唯理主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然而当马克思跟费尔巴哈一起反对醉醺醺的思辨的时候，也有一阵子曾经赞美那位认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的哲学是反动的，主张彻底的经验主义的培根。而且，无论他所指的逻辑泛神论，具体地指黑格尔学说的哪一部分而言，反正黑格尔的逻辑学＝辩证法＝世界模式论，确确实实如狄慈根所说，这既是逻辑，也是神学。唯理主义者本质上不得不是神学家，因为正如狄慈根所说，理性的领域与神的领域之间，不可避免地是联系着的。

（三）马克思的哲学是培根和黑格尔的神妙的结合

所以，《神圣家族》时代的马克思，几乎是反对唯理主义的，而就本性而言，马克思这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则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果然，《神圣家族》才写完，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

从否定黑格尔又回到了黑格尔。

《手稿》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被发掘出来，列宁未及见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生前从未发表，查苏利奇等俄国革命家曾指名想读此书手稿，恩格斯不给看（参见《回忆马克思》一书）。《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一直到1888年《费尔巴哈论》发表时附在篇末发表。可是，恩格斯写《费尔巴哈论》的时候，真可以说竭尽了一切力量来遮盖“逻辑＝神学”的性质，简直把辩证法写成了进化论，把黑格尔写成马克思＋达尔文，把马克思写成“反对不可知论的培根”了。

甚至你把《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作极粗略的对比，你也能发现这一点。比如说“按它（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在《反杜林论》中特别着重；在《费尔巴哈论》中，不仅没有这样明示的文字，连这样的精神，都不可能在《费尔巴哈论》的字里行间找出来，唯有极其细心地读《费尔巴哈论》，体会那里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篇章，才可以知道那里在反对不可知论，亦即在十分委婉地主张唯理主义。原因很简单，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科学（不是黑格尔自称的那种科学，黑格尔的科学其实是神学，这里所说的“科学”是黑格尔轻蔑地称之为经验科学的科学，《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用孔德的名词称之为实证科学，其实马克思是很反对这种名称的）发展十分迅速，神学式的唯理主义愈来愈不行时，恩格斯也得注意这种风尚……

而且，事实上“撷取了黑格尔合理内核”的马克思的哲学，也确实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

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是他的唯理主义。略为说得具体一些，是黑格尔的“真理是整体”，黑格尔的一元主义，以及“能

思维的人”，“其思维，最终说来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人”，是客观世界的主人，亦即“神性寓于人性”之中的黑格尔加以哲学化了的新教精神。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都是不可少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加上了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黑格尔那一套，全是在思辩中进行，在思辨中完成的。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辨中拉到实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完成。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是哲学地解决了的。马克思要把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拉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解决。——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中发现了“异化”的秘密，他认为不可能在哲学中解决异化，要在经济学中解决异化。这就是《资本论》的哲学前提。价值，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剥夺者被剥夺，这就是在经济学中解决哲学上提出来的异化的道路。

黑格尔那一套既在思辨中进行，在思辨中完成，所以黑格尔主义有三条极重要的后果。第一，既然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而寄寓了神性的人性，又表现于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之中，那么，人认识真理，就是认识至善，真与善是一元论的，至善的即至真的，至真的也必是至善的（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恩格斯那么反对康德的真善二元论）。第二，黑格尔也讲实践，不过他的实践是思辨的实践。黑格尔的真善一元论，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一致”这个命题，不过他这个命题，只是“理论与思辨的实践一致”，这等于是一句废话，做起来当然不难。第三，在思辨实践上达到真善一致，其实际的道路也是铺得十分平坦的。——赞美法国大革命的黑格尔，只要在《法哲学》上论证普鲁士王国的秩序合于大革命的原则，“真善一致”就达到了。

附带说说，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上论到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那两句名言的时候，给黑格尔涂上了大量的脂粉。只要读读黑格尔的《法哲学》，读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可以知道，这位所谓内心蕴藏“革命愤火”的哲学家，其实不过是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而已。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上述那三条，都接受过来，又都加上了革命的改造。第一，真善一致，即理论与实践一致，接受过来了，不过从此，理论与实践一致就是真刀真枪，“玩儿命”的事情，可不是空谈所能达到的了；第二，实践，在培根，基本上是生产的实践，马克思是革命的实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2 条），可不是纺纱的骡机、蒸汽发动机和电灯电话之类的真理性，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性——请注意，这里用上了“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几个字，要其意味着异化的消灭而言，翻译成“在地上实现天国”，应该确未歪曲马克思的本意；第三，岂但普鲁士王国并未体现真善一致，迄今为止的历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就建立真正真善一致的人类世界而言，迄今为止的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这几句话，见于《反杜林论》一书，你如果拿来与《费尔巴哈论》对比对比，又可以体会出两者实在不是一个调子。

（四）这一结合的后果

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到此为止

的唯物论几乎都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则是唯心论的。现在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不是称做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吗？按照上面我们对辩证法本性的描摹，把它译成唯理主义的唯物论，显然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 条，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可以体会出上述的意思来。

（五）马克思本人坦然承认的辩证法——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

马克思凡写到他的哲学的时候，他都坦率承认这一点。他的最晚的哲学著作，正式发表的是 1873 年的《资本论第 2 版跋》（见于中译本第 1 卷卷首）。在那里，他自认是黑格尔的门人，自认“卖弄”辩证法。在此《跋》中，辩证法究竟是什么，他自己没有回答，他引了一个俄国人的书评所写的他的方法论，这也可以算是他自己所作对于辩证法的定义。这个定义，请注意，和《反杜林论》第 1 篇第 12、13 两章是不一样的，不过，《反杜林论》马克思是同意的，所以《反杜林论》可作《跋》的补充。

另外，列宁再三强调过《资本论》方法论中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这一点，确实体现于《资本论》全书。不过，我们还应该再来琢磨琢磨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只能作这样的解释：（一）历史按照逻辑的必然性而发展；（二）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什么 A＝A、判断、推论之类的“思维规律”，而是中国人所谓的“道”。“大道之行也”的

“道”，是先验的东西。[1]下列一段话要作为上述意思的正面证明微嫌不足，不过也可以嗅出“道”的强烈气味来：

>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跋》）

（六）“破”与“立”，体系与方法

历史的与逻辑的一致，按字面解释，也可以释为“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不是曲解，唯理主义者之所以是唯物主义者，只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一点。

可是，这样一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出的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不免也要见于一切唯理主义者，马克思也不免。

“方法是革命的”，也即意味着，它在破旧方面是锐利的。

可是体系呢？黑格尔固然在体系上是保守的，马克思如何？

让我们摘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几句话：

---

① 中国人所谓“道”，外国人也有现成的名词，叫做逻各斯（Logos），和逻辑（Logic）差一点点。神化的逻辑即是 Logos。《新约》的“约翰福音”首句“泰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个“道”，英译本是 Words，不知希腊文原文是什么字。我猜测还是 Logos。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真的，"破"旧是为了立"新"，马克思是有新可立的。他要立的，是相对于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的社会）的社会化了的人类，亦即"集体英雄主义，民主集中主义……"的人类。

可是，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概念看得高于具体事物，亦即把共性看得可以优于、超越于、可以淹没个性（见《神圣家族》）是不对的。还有一位哲学家（罗素）说，亚里士多德以来，有一派哲学家一直把概念看得比个别具体事物高，其实在各个人头脑里，某类事物的概念，不过是他心目中这类事物的最优型而已。

再说，社会化的人类我们也见过，经历过了。你是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的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复活（见最近的《参考消息》），复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破"的一面。它的"立"的一面，后人固然有歪曲它的地方，然而它本质上是黑格尔主义的，那是无可讳言的。

二、《反杜林论》各章

以上是《反杜林论》以外，拉拉杂杂谈一些与《反杜林论》有关的根本问题。现在，再来按《反杜林论》各章节次序，略加评论。

（一）引论部分——关于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黑格尔用来称呼非辩证的世界观的。

恩格斯在引论中历数形而上学的毛病，你的信里，也谈到甚至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也一概都是“形而上学家”。然而我要对此提出异议。

1. “形而上学”，即对于自然的研究，采取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孤立”地深入钻研下去，而不综合，不在其发展运动中观察的那种方法，不仅在世界科学史中是必不可缺的阶段①；而且，中国人正因为没有这个笨劲，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你读一下《老子》、《大学》、《中庸》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

① 可以读一下周建人译的《物种原始》。如果没有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积累，进化论是产生不出来的，远远不到分类学精密程度的《本草纲目》，从中肯定产生不出进化论来。

我从前说过，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我说的“逻辑”是形式逻辑；也不妨说成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2. 我不同意现在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形而上学家之说。

如果这种说法，不自觉地暗含了自然科学家都不免是反“唯理主义＋神学”的，那我倒同意这个意思。但是，总的说来，自从达尔文进化论以来（或者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指出的科学三大发现以来），自然科学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的阶段了。《费尔巴哈论》写成以来又 80 多年了。这 80 多年自然科学的发展，超越了过去的 3000 年。原子物理学、电子学、控制论、生物科学、实验天文学、宇宙航行，哪一门都不是局限地考察一个小局部，哪一门都联系其他学科才能有所进展，哪一门的新成就都在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宇宙的总看法（即所谓世界观）。不仅如此，本世纪初期，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究，一般还限于了解自然，充其量只限于“了解、控制，以为人类造福”这个观念。现在人类发现，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的改变，对于自然界自身的循环运动的影响，已经不是可以忽略的了。于是发生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甚至宇宙医学问题等等。

所以，自然科学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的范围。自然科学早已从发生发展，亦即从自然史方面去研究自然了。说现在的自然科学还处于形而上学阶段，是绝对的时代错误。

自然科学超出形而上学阶段，与黑格尔没有关系。现在的自然科学是自然史的科学，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黑格尔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反杜林论》，1970 年版第 10 页）

也许所说的自然科学家是形而上学家，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吧。但是，近代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注意黑格尔称为经验科学，恩格斯称为实证科学，自然科学家则自称为实验科学），他们所需要的方法论是“实验逻辑”，辩证法对他们全无用处。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远不是一个偏隘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具有广阔眼界的科学家，他就否认辩证法对他的科学事业有过任何用处。

相反，在辩证法盛行的中国……

当然，科学家不专不能有所发现发明。专了，总不免眼界狭隘，以偏概全。以偏概全，是书呆子的通病，这并不可怕。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天然地成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有这些自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综合的世界观。《十万个为什么》对你的综合的世界观有帮助没有？我看有帮助，比什么辩证法的说教的效果要大得多。

3. 西方科学技术的猛烈发展，是因为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之故。

“辩证法”作为批判的即“破”的武器，是有巨大价值的。一旦它成为统治的思想，它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对不起，我说得也许太愤慨太严重了一些。然而，历史明显地证明，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亦即辩证法未成为统治的思想）之外，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

这是偶然吗？不是。举几个实例就可以知道。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的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苏联先是骂，后来采用了电子计算机。但是，

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

再举一个例，玉米、高粱以及一切植物的品种改良，现在盛行一种新技术，叫做什么杂交，所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辩证法加以指斥、拒绝，有过一个20年代的苏联科学院院长为此送掉了命。现在又默默地引入这种新技术了。然而哲学问题不解决，永远只能引入而不能创新，永远不会有“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呢。

所以，我认为，假如真正的科学家，读了《反杜林论》而抛弃他原来习以为常的方法，而来彻底改造思想，成为辩证主义者，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完蛋了。

4. 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夸张。

事实上，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各有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不是“承袭”得来的。举例说，居里夫人为了发现铀，炒了十吨以上的沥青矿，提炼出来几克铀，费了七八年（?）或更多的时间。这种提炼过程，势必要应用已知的一切化学方法；或者，已知的方法还不够，还要创造出新的化学提炼方法。已知的方法中哪种方法或哪些方法是适用的；如果要用新方法，如何推陈出新；这是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论问题只能由她自己来解决，书本和老师没有告诉过她。当然，她摸索前进的道路，前人已经做过许多工作。比如，归纳法，归谬法，她在学校里已经念过；正如她会说话，这种语言能力是从前人那里承袭来的一样。但是，切合这个特殊

发明的具体方法，是从旧材料中推陈出新来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创造。

方法论就是哲学。我上面这些话，无非是说，每一个人（当然不是泛指芸芸众生）有他自己的哲学。

所以，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是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的。

再说，凡在科学上有创造发明的人，虽然他的创造发明，对揭示大自然的秘密来说，不过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粒沙子”（居里夫人语），然而他总会陶醉于他的成就，总会以偏概全。他既戴上了他自己制造的有色眼镜，他自然会有一种通过这副眼镜所见的世界——世界观。这并无害处。以一个人而论，是以偏概全；多少人的“偏”凑合起来，也就接近于全了——不过要求新闻、言论、出版等等的自由。

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偏（偏来偏去、颠颠拐拐）中蹒跚行进的。

假如上面说的不错，那么黑格尔有他自己的眼镜，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他自己的眼镜，对不对？

人各有自己的眼镜，那很好。可怕的是，有一种钦定的眼镜限定一切人全得戴上，否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①]。唯理主义者总以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

---

① 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会赞成我这种说法。参见《马克思全集》第1卷论出版法的文章。又参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引埃斯库罗斯剧本《普罗米修斯》的“台词”（见本书“《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

（二）第1篇第5—8章——自然哲学

《费尔巴哈论》的副标题叫做《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本文内又正式宣告“自然哲学就是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见该书第4章）。我相信，这是恩格斯跟杜林啃酸果，写他的《自然辩证法》（那分明是不想发表的草稿）以后得出的结果。真的，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多彩，你能添一粒沙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一以贯之，那简直是梦呓。黑格尔写他的大逻辑和哲学全书，本来就是梦呓；杜林跟着效法，更是梦呓。恩格斯跟着啃酸果，一半是不得已，当然不能否认，他也还想要搞出一种指导科学的哲学来。到《费尔巴哈论》，他宣告这是“一种退步”，那算是他的宣言了。

把《自然辩证法》从草稿里硬挖出来，而且大事鼓吹的是德波林，那是一场悲剧。德波林这种“后退”的逆流，是想抬出恩格斯增加哲学的权威，要用哲学来指导一切。斯大林不能忍受这份狂妄，把哲学武器没收过来成为“斯家政治”的工具，其结果就是《联共党史》中有名的那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幕，已经是喜剧了。

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过关于“板田模型”的尝试，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曾指定专人组织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

托尔斯泰说得对，人的自视是分数中的分母，分母值愈大，分数值愈小。居里夫人说“沙子”，我实在不由得敬仰她！

（三）第1篇第3、4、11、12章——辩证法，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

这几章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其间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让我从坦率地指出自相矛盾开始。

恩格斯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先验就是超越于经验，就是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意思。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的哲学体系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这一批评很中肯，很好。

不过，请问：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吗？

恩格斯说能，理由，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

但是，根据我们对于归纳法所作过的透视，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得来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过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你能超过这个或然性，主张你有权“创造”——不对，按照唯理主义，应该说“发现”，至于“创造规律”则是唯心论了。——好，就说“发现”吧，再问一句，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这是哲学的质问。

再来一个科学的质问。质量互变规律。你怎样解释，现在物理学定义逐渐有全归于数量化的趋势——光波、声波、电波、燃点、熔点、氧化点、温度、压力、光谱分析、天体的光谱分析等等。物理学定义数量化≠质量互变规律。

同样的质问可以适用于另外两个辩证法规律。

已经指出过，恩格斯这三个规律，其实是他所指责为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理念论的精华。他指斥说，这种世界模式论是先验主义，他反对这种先验主义。然而一转身，他又把这种世界模式论的精华撷取过来，称之为辩证法，称之为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后来又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呢？

这种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恩格斯所反对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至于黑格尔的唯理主义则全套接受下来了。这就是《资本论·跋》所说的头足颠倒，加以改造的意思。

然而，唯理主义的理性推理（Reason）是人的一种心理能力。你怎样才能够唯理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呢？

真正的，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即一方面承认人的头脑（心智）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等一切方法来了解事物的过程，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哪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

而且，近代科学鉴于观察实验的环境条件，所用工具、方法，对于实验结果都有影响，所以“科学定义”应该是“操作的定义”，即说明实验操作过程的那种定义。这样，就可以使“经验”的主观影响，对于实际结果所引起的误差，都成为可以计算可以控制的。

这是近代科学飞跃进步所用的方法（我所知太少，不能描摹于万一）。假如近代科学死守住辩证法三规律，它老早停滞不进了。

（四）书末“导言”——反对不可知论，非借重唯理主义不可

让我们跳跃一下，跳跃到书末，反对赫胥黎的“导言”上去。

仔细读这篇“导言”，可见那是在反对赫胥黎的。然而其立论很奇怪，它是从“不可知论者不肯肯定回答没有神”开始的。这也许是一个便当的着手方法。

当时的英国不可知论者如赫胥黎发现猴子变人为了不进一步得罪教会，也许仍像康德那样把上帝保留起来，这诚然是一个缺口。不过，请注意，狄慈根公然把逻辑（他说的逻辑＝辩证法＝世界模式论）等同于神学，这也是缺口啊！

至于不可知论者是唯物主义者，只是它坚持经验主义的立场，坚持他所知的事物的特性，是这些特性对感官产生的印象，而不肯进一步认为，这是“绝对真理”，这对严肃的科学工作来说，有什么不好呢？科学家说水，可以有无限多种定义。润我的口，使生命得以产生的元素，H_2O，又进一步可以在原子物理学意义上定义，每一种定义，都可以附加操作条件——即这一定义是在哪一种感官印象上，如何操作，所发现的特性。这样，每一个定义都等于自觉地声明，它没有穷尽该事物的全部特性。——是的，这是拒绝承认它是绝对真理，可是这一拒绝，不是为继续发现可能发现的无穷无尽的真理留下余地了吗？这有什么坏处呢？

是的，布丁的证明在吃。可是倘若吃掉一样东西，就是证明了这样东西的话，人类对于可吃的东西的科学知识不是就会少得跟原始人一样了吗？而人类现在吃得比原始人好得多，精美得多，分明是因为它并不满足于吃的证明。他对吃的证明写

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说这样东西吃起来我的感官印象如何。该物其他特性，我从吃之中未有所见云云。这确实也犯下了不承认绝对真理的罪名，可是确实也给科学进步留下了余地。

“导言”也好，《费尔巴哈论》也好，反驳不可知论的又一途径是“重新制造出来”。可是重新制造就算穷尽了真理了吗？不再该留下一点余地吗？有机合成诚然是巨大进步，有机合成就算是人类掌握自然的顶点了吗？我不相信。我坚信我这不相信是正确的。

所以要反对不可知论是另有原因的——是唯理主义者的一种哲学原因。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反杜林论》第一篇有三章关于道德和法的，这确实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就姑且不论了。〕

三、再超出《反杜林论》

（一）经验主义也能达到上帝——贝克莱大主教

但是，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也有主观主义即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

这种经验主义，借口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唯有他自己的感觉，并通过这种“辩证法”来否定客观实在的世界，借以证明唯有上帝是实在的。

这里首先要指出，贝克莱的这种诡辩，是希腊思想基督教传统中的异端，其实十分近似于印度的寂灭思想。这里略为多解释几句。

希腊思想，从探究客观世界，即从所谓宇宙论开头，无论主张万有不变的，还是主张万有皆变的，反正从来没有想过把客观世界否定掉，而都是从客观世界的存在出发，企图去探究它的究竟的。全能的上帝，是哲学上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的形象化，这也就是唯理主义的实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间全套西方哲学都属于这一派。培根力主经验主义，但还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确实，在西方哲学整个唯理主义优势之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再重复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神学家贝克莱在经验主义的英国，要证明上帝，从唯理主义下手，道途过于迂回，于是从经验的主观化着手，果然他大大轰动了社会，轰动了历史。

然而，从经验的主观性达到否定客观世界，这是佛家唯识论所走的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Ⅱ）的注 3，一条很长的注，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评论。

这虽然是异端，是支流，却被列宁大大利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这是很有趣的事。

（二）四种可能的组合

要对列宁的评论作评论，需要对唯物论或唯心论、唯理主义或经验主义这四者一切可能的组合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可能的组合计有四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有评论和定名，这就是：

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唯理主义的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即本来面目的黑格尔主义。奇怪的是，这两种成分都彻底“唯心”，列宁在《哲学笔记》对之却一唱三叹，称为“唯物主义最多，奇怪，然而是事实”。

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即贝克莱主义，近乎佛家的涅槃理论是希腊思想——基督教的入世精神的异端，轰动过，但未成为一支重要的流派。

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者”。它始于休谟、康德。列宁批评的维也纳经验批判主义，其实是康德主义清除掉不少宗教成分以后的东西，这个流派对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杜威主义也属于这个潮流，不过是维也纳学派以外的一派。

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说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

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

1973年8月4日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论　孔　子

1. 你提的，“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悌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之间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问题在于，在春秋的大乱之世，礼乐崩坏，兼并盛行，犯上作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怎么办？孔子在《春秋》中虽然“天王”长，“天王”短，晋文公召周王到河阳，他还要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但却肚里有数，这个天王不行了，“我其为东周乎”，要另起炉灶，弄出一个代替周天王的天王，或者像管仲那样，兴起一个把天王变成至尊的偶像，旁边有一个事实上至强的霸（主）。所以所谓东周，是把鲁弄成霸主，或者干脆鲁称天王来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肸见召，他跃跃欲试，无非是想以此为开端来建立这个霸业。当鲁司寇后杀少正卯，隳三都，无非是想削平三桓（鲁的公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

先尊公室，然后强鲁称霸。周游列国，到处留心政治，无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张。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这是孔子本人的言论与行动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结论。中国历史正好符合于这个逻辑。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2. 但是，根据以上矛盾，说孔子就是一个假仁假义的人，那不免把他过分小丑化了。在我看来，他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实的，他栖栖遑遑过一生，悲叹自己没有机会行道，并不是“仅仅为了面包”。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把他和苏秦、张仪对比一

下。

他有许多十分庸俗的话，“学而优则士”，“耕馁，学禄”之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政体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你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用语“禄蠹”来批评孔子。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我又要问，“娜拉走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要不做禄蠹，要有一种合适的社会条件。不同于古希腊的现代条件是，尊重每个人的事业，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的是怜悯而不是尊重。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 关于“信”，你的评论也十分尖刻。但是，“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接物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当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弃义，那是应该谴责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当。而且，政令之信的重要性，我们不是亲身体会过的吗？

4. 还有一个小问题。四书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义理”、“夫理人欲”之类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哲学体系，以此解孔子是不行的。

5. 我还发一个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像样）。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地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6. “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历来的评论家，都把孔老二的“爱有差等”、“能近取比”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

是这个意思。这样，姑不说父亲揭发儿子的隐私，儿子揭发父亲的阴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这个前提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那儿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其实，唯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现在天天在嚷嚷的“集体主义”才算找到了根据。若以家庭为出发，向外推，推到天下国家，一旦忠孝不能两全，你取舍据何标准？而且，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现在的人，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然而评孔的人，却很少评到这一条。也许因为要痛斥“忠君”，又有点投鼠忌器之故。

7. 你的两篇东西并非思想批判，而是人物评传的性质。孔子这个偶像应该打倒，写他的评传，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评传似乎也有点这种倾向。这两份评传，机智隽永，比“时论”深刻多了。但是我不免有点因其过分“时论化”而略感遗憾。这是难免的，因为你手头的书太少，比如，《春秋》三传，是理解孔子思想体系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你手头并无此书，关于孔的身世言行，大体只能根据《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论语》之类的注解，所写只能是随笔。从随笔开头，当然会一步一步深入下去。

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

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对此我也有我的辩解：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有问题。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曾经慷慨陈词，西方人打到东方去结果还是要滚蛋，这诚然是历史事实。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带领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国的西班牙边境，东面打到匈牙利的边境，到底这个第三世界还是在发源于“航海、商业、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前面比下去了。可不能忘掉“内因论”啊！

1974 年 4 月 14 日 16 时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你认为科瓦略夫没有提供答案的那些问题（此处系指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我自然也无法提供答案。不过你的那些问题，确实是历史的，也是人类的也许是永恒的问题，史学家与哲学家对此的讨论，盈篇累牍，我自然也在这中间泡了这么几年。答案没有，意见是有的，随便写一些在下面吧。

1. 关于君主专制或统一帝国的问题，历史上见到过两种类型：一是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的类型，即从部族王国并立，经过战国时代，到统一帝国的类型；一是希腊、罗马类型，即从海上文明的城邦国家林立，经过连续的征服以达于统一帝国的类型。一句话，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似乎是于世界上各个文明，几乎可以说是规律。

你还记得，两个多月以前，我跟你说过我的“迷惑”。我写《希腊城邦制度》[①]，本来是有感于在希腊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而且这个波斯

① 《希腊城邦制度》，系顾准遗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帝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而希腊则纵然在自相残杀，还是方兴未艾——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起来了。事实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实在是历史奇迹。可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民族内部最残酷的一场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在这时爆发的。希腊的统一，波斯的征服，只好由蛮族马其顿王来完成。更有趣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希腊的东方帝国也分裂了，而且一直不断在自相残杀，结果当时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世界，竟然要由一个“洋化的土著城邦”罗马来统一……

希腊文明如此卓越，然而希腊人的历史命运落得如此悲惨，这是基督教兴起的重大原因之一。伊奥尼亚自然哲学是兴高采烈的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斯多葛哲学返回到人的内心，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旧约》是用希伯莱文写作的；《新约》最初是希腊文的创作。

这是西方。在中国，老实说，就在武王灭纣、周公平三叔、“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候，中国大地上还是诸国林立。且不说齐、鲁、燕、晋，都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分庭抗礼的，还有徐、楚、吴、越。这些国家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和平的交往和武力的交往，促进文明的进步，也促进了最后的统一——这次统一也是由一个半蛮族来完成的，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在齐鲁大梁邯郸，决不在关中。

所以，在早期文明的历史中，文明的创始和繁荣大都起于林立小邦的局面下的某些邦之中。然而要使这些珍贵的人类精神财产大规模地传播开去，军事征服，以及军事领袖的独裁政制——亦即君主政制是不可缺少的。

事情的“矛盾”还在于：没有大一统，兴起于一隅的文明

不可能大规模传播。然而一旦大一统，原来促使文明萌发起来的那种个人创造性，在军事独裁下也就被压抑下去，那种蓬勃奋发的精神状态就逐渐被“内向”、“精神安宁”以至“天国来世”的观念所代替掉了。在西方，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伦理哲学的抬头。这一趋向，历时五六百年，最终就是基督教的形成。

在中国，秦与两汉，大一统以后的活动方向是开拓疆土，驱逐匈奴，声教文明及于朝、日、越，以及本土的东北、西北、西南、南诸方。这一势头到汉室元、成、哀、平时已见衰落，到魏晋时已经不复存在，于是有“玄谈”，而佛教的引入，与“玄谈”的兴起其实是一个原因……

在西方，这一转向造成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新的精神文明形成起来，脱颖而出，已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其契机还是航海——发现美洲，发现印度航路……

作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对于“小邦林立”的迷信是批判掉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事实上，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但人类进步到现在，则确实完全办得到，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2. 奴隶制度的发生是不奇怪的。不要忘掉，世界上确实有过食人肉的风气。中国史籍上对此记载不多。西方人，在罗马时代，就在当时罗马人占领的北非南面就发现有吃人肉的。16世纪以后，西方人航海各地的记录中，记录此事者不少。人殉，人牺，在早期希腊史籍中还有记载，中国更多记载。此其一。

其次，有一本英国人写的《加纳史》，记载英国人在黄金海岸（加纳旧名）建立商站以后，贩奴贸易的奴隶来源，是黑人

部族把相互征伐中的俘虏拿来卖给英国人的。我相信这个记录的可靠性。因为英国人建立商站在那里，经营大规模的贩奴贸易，如果奴隶要靠他们自己派兵深入腹地去掳掠，你想想，在“土人”的同仇敌忾之下，这个商站怎么站得住？唯有土著自相残杀，掳掠俘虏，拿来换武器、“火水”（酒）和各式各样“珍贵”物品，奴隶来源才会源源不绝……

古典奴隶制的始作俑者是希腊人。希腊人殖民于地中海上的东西南北，他们的文明比土著高出很多，公元前5世纪前，他们没有对土著进行大规模的征服，臣服于各小城邦的土著还是农奴。然而，逐渐他们有葡萄酒、橄榄油、各式各样的珍贵品可以卖给土著，土著把征伐中掳掠来的俘虏卖给他们做奴隶，必定早已开始。公元前5世纪初期，希腊人打退波斯人的进攻，不久转为反攻，尤其Kiwon武功卓著，几次战役获得大量战俘，这是希腊的大规模奴隶制的开始。一旦奴隶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希腊人就要搜罗奴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谈到“奴隶狩猎”，我想其中重要一项，也像英国人在黄金海岸一样，煽惑土著相互杀伐掳掠，收买战俘为奴。

当然，希腊奴隶制盛行的，限于几个大工商城邦——雅典、科林斯等。斯巴达除黑劳士外，很少买来的奴隶，其他如忒拜、阿卡地亚等务农为主的也很少奴隶。雅典等邦，奴隶人数是超过公民的。

罗马的奴隶制是对希腊制度的抄袭。罗马以南“大希腊”、西西里诸希腊城邦，都是工商业的奴隶制城邦。

至于这种工商业城邦的奴隶制以前有没有奴隶制呢？有的。有债务奴隶制，欠债还不清，卖身为奴，或卖子为奴。至于有人起一个名称叫做“族长奴隶制”，即子女事实上是家主人的奴

隶，“家父”还可以收养养子养女，事实上是“家父”的奴隶，那当然算不上奴隶制。债务奴役，与小规模的购买家务奴隶，那是很普遍的，《红楼梦》上还有呢。这些，和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都是不一样的。

3. 马克思的“亚细亚”或“东方”，是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或帝国。那些领土王国或帝国，王朝的威力所寄，在于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这和滨海的工商业城邦，国家的威力所寄是海上贸易和海军是不一样的。这些国家的最大要求是“教民耕战”，耕战的民绝对从属于王朝。你说他是奴隶吗？有功可以授爵。你说他是自由民吗？他又绝不如希腊罗马的公民那样，凡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有参政的权利。他没有“政权”，只是有战功可以授爵。他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的一切财产，王朝随时可以征发。他的产品，甚至不能自由出售。中国很早就有盐铁专卖，埃及的榨油是王朝专利的。在这种情形下，拿西方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来对待这种“赋役农民”是格格不入的。

真的，自由民和奴隶的范畴，不见于波斯、埃及、巴比伦、中国；《旧约》上也没见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起源显然是希腊，是城邦制度中的概念。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做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

4. 所以，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

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

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只会有驾鸯、袭人这类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

5. 人自相残杀，看起来是在逐渐缓和之中。别害怕原子弹，真的，毛主席说过，原始式的刀枪比原子弹厉害得多，所以曹操有"凄怆伤怀"之叹。然而什么时候没有战争了？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相信"战争消灭战争"之说，珍宝岛、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事件证明此说之为虚妄。你说得好，互相残杀的动力是利益和权力的追求。我不知道人怎能不去做这种追求，所以我不知道怎能没有战争。

还有战争。这个世界如果过分太平，大家做起葛天氏之民来，哪还有奋斗、追求、自我牺牲？哪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历史是由事件组成的，没有斗争，就没有事件；没有事件，岂不是就没有历史吗？

1974 年 8 月 31 日

科学与民主

一、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

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呢？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这种对于民主的解释，和上面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号称为反对权威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通常主张，政治上必须保留反对派，实行两党制，但是两党制的实际状况也造成了

那些民主主义者的幻灭。因为两党制只允许你二者择一，好像结婚，候选对像只有两个。你不要这个，只好要那个。如果两个都不喜欢，只好打光棍——放弃公民权。何况这两个党，往往是换汤不换药，随你选哪个，唱的还是那出戏。于是，这种民主，不过是粉饰门面，不过是欺骗。何况，芸芸众生喜欢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存在，足以保障这种秩序。据说，苏联人怀念斯大林，就是出于这种感情。

再说，所以主张把民主放在科学前面，是因为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但是仅仅着眼于这一方面的话，前面两种民主，亦即民主集中制，至少能够部分地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原子弹和卫星上天，分明是在民主集中制下搞出来的。苏联的军事科学，不对，是武器科学，还有许多其他各门科学，50 年来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

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

我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1) 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 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4) 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 A，

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知识、可以是从A的根子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说穿了，这些不过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老生常谈而已。但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也许可以反驳，这么说，还可以归结为民主是科学的前提。这种反驳当然还是有力量的，因为上面的论证，看起来是一种循环论证，你把民主当作前提也可以，把所谓科学精神当作前提也可以。不过我想，把民主当作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

二、哲学上的多元主义

其实，所谓科学精神，不过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做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代替的应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

也许主张人类进步也是一种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列宁反对

相对主义就是这样论证的：相对成了主义，就是一种绝对化的主张。当然不能禁止这种反驳。不过，主张人类进步，主张人类进步而主张科学精神和多元主义，总和主张什么终极目的而坚持一元主义一权威主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说我也是一元主义，那也不妨承认，我的一元主义是多元主义的一元主义。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不过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当时大家承认的一种政治制度，例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这种制度无论何时（哪怕比现在完善得多）也不是绝对完善到无可再改善的。要改善，就要有批评。所以，它也是多元主义的。

至于政府的形式，看起来不能做到大家当家做主，那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100 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而且，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状况下，职务的差别，表现在收入和特权上的差别将愈来愈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这样进展（你听起来似乎是神话，然而这是事实）。那里的经济学，确实还有毛泽东思想的反响——他们在研讨一种有别于家裔的不平等（公爵时代，资本家的遗产，都造成家裔上的不平等）的功勋的不平等如何缩小的问题。不过，这里还适用马克思的命

题，需要物质上的极大丰富才行。

事实上，私有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些。所以，十月革命在全世界的回响十分震动人心，而 1945 年以后，连陶里亚蒂也宁愿走结构改革的道路了。陶里亚蒂是对的。如果他选择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意大利的工人会埋怨他的。不过，在西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现在也并不稳固，至少它在日益削弱。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一、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从一般的古代史著作中找到它的梗概。大体说来：

1. 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本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影响之下的诸古代民族并存的地区，在其中兴起了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征服了迦南，有过一段同民族内诸部族不相统属的时期。后来，强有力的部族出现了“士师”（《旧约》有《士师记》）即法官，是强有力的部族首领，逐渐经过征服吞并，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的统一王国，即《旧约》着重描写的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时期。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和她所占地区是商队贸易的通商要道有关系。商业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上总占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2. 以色列——犹太王国好景不长。她太小，抵抗不了大帝国的征服。公元前597年，这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国所攻破，大部分首都居民（也许还有她的首都以外的居民）被迫移往巴比伦。这是这个民族的第一次民族流放；以后

她还多次被流放过，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于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

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于是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

3. 犹太人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按《旧约》的记载，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民族宗教的态度是不虔诚的，许多人“崇拜偶像”。可是，他们被流放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祭司兼历史家）却着手系统地编写起他们民族宗教的圣典来了。学术界一致地、无异议地认定，《旧约》最前面的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即追叙他们的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第一个民族英雄摩西，怎样把全民族从埃及的依附者的地位中脱身出来，怎样经过从埃及——西奈半岛——巴勒斯坦的长征，征服迦南的历史神话，所谓摩西五书，是他们建国以后第一次被征服流放在巴比伦时编写出来的。

《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巴比伦征服以前，犹太教已经有过一些经典，它的完备化，是流放巴比伦时期搞成功的。

犹太人被巴比伦征服以后，又曾经恢复过他们的国家，不久又被波斯、亚历山大、罗马征服。有过多次民族起义。罗马帝国初期，亦即基督教兴起的时期，还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玛加比”兄弟的起义，当然是被扑灭了。基督教兴起的时期，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摆脱罗马帝国统治是民族的愿望，然而犹太教的上层是妥协派。

犹太虽然复国了，其大多数被流放的人民散之四方做买卖去了，复国后的耶路撒冷，事实上成了散处四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宗教中心。

4. 犹太教义的特色：

A. *民族战神的一神教* 《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据说正确的译音应该是耶威）是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战神，是保佑民族和外族作战取胜的神，而且，除了这个神而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神。以色列——犹太民族和他民族作战曾经胜利过，这就是他们征服迦南地区的时候。可是，在征服中他们也吃过败仗，以后的记录更惨，只有败仗，没有胜仗了。怎样解释呢？失败是背叛耶和华的结果。这种解释，奇怪得很，很灵。而且，这不仅是犹太人保持其民族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后起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神教的特点，和当时的文明民族的希腊、罗马是迥然不同的。希腊宗教没有经典，只有神话，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个大家族，他们和她们有七情六欲，也犯罪，而且也受命运的支配。罗马的宗教，几乎全盘承袭希腊，不过把人名改一下（例如，宙斯，改成朱庇特 Jupiter）。

可是，一神教比多神教严肃得多。犹太教之所以和希腊思想合流而成为基督教，一神教的因素是个重要因素。

B. *反对偶像崇拜* 希腊、罗马的神，是艺术的对象。金星——爱神维纳斯，被雕成一个最典型的少妇裸体像。在我的青春期，走过店铺陈列的维纳斯雕像的最粗劣的仿制品的时候，实在禁不住目迷神眩。当时还有许多民族的神是动物，《旧约》中耶和华最严厉责备的偶像崇拜，是崇拜圣牛——以金子铸成的圣牛像。

犹太教的耶和华，绝对禁止画成画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显现，吩咐他布置的（不是建筑，而是布置一个帐幔，因为那时的以色列人，还在向迦南进军途中——其实是他们上古游牧生活的反映）至圣所里的至圣物，是“约柜”，是上帝吩咐摩西传布的“十诫”的文字记录（写在一块石版上）的存储木柜。

上帝没有形象，后来的宗教哲学家把它解释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具备“有限”的人的形体。这又是它和希腊思想的接触点。

后代的基督教传教士，画成耶稣和圣母的画像，人们要向之顶礼膜拜，宗教的哲学家们斥之为异教风尚。虽然如此，基督教终究是没有上帝的画像——像我们的玉皇大帝之类的。伊斯兰教也承袭了这种传统（附带说说，伊斯兰教的教义，在许多地方承袭了犹太——基督教义。不同处是，基督教宣扬爱，它宣扬征服）。

C. *以色列——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这是民族的战神——上帝的本来特色，因为强烈的民族情绪，一向具备着发展到征服世界上一切民族这么一个至高点的。问题是，选民的观念，在以色列——犹太被征服后，散处四方以后，还强烈地保持下去。于是，以犹太人的现实主义来说，它变成了分散、无祖国状况下保持民族团结，保持民族特色，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武器了。

还不止此。选民观念，逐渐转化成为一种现代的伦理观念；不是选民征服一切人，而是选民解放一切人的那种观念。不过，这到后面再说吧。

D. *严峻的戒律*　始见于西奈山的“十诫”，见《旧约·申命

记》：“一、除我以外，不许有别的神；二、不可崇拜任何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四、安息日；五、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一切所有的。”

其中的第九诫，不久前有人向我慨叹过，中国并无此传统。

诫命多得很。后来成为犹太教徒特色的，有一定要割包皮（叫做割礼），不准吃猪肉，不准吃一切动物的血，不准吃无鳞的鱼等等。这些戒律，后来发展成为犹太人的法律体系。犹太人的律法师，是兼具人间的权威和神的权威的。马克思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律法师；不过也许已经兼任了当时普鲁士的律师，而且也十分文明化了。

5. 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渴求解放和弥赛亚的预言。

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处在以下状况中：

甲、犹太人已是散布在罗马世界的买卖人；

乙、耶路撒冷和周围的犹太区是罗马的领土。散处在世界的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为犹太教圣地，有许多捐献，这个城市很富。

丙、犹太本土不久前经历了一次玛加比兄弟的民族起义，十分壮烈，失败了。

于是，在犹太人中传布着一种弥赛亚的预言，大致是说，犹太人中将要出来一个像古代名王大卫那样的民族救主，实现“上帝的国”，压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毁灭，弥赛亚诞登大宝，世界各处都会有蜜、奶、酒像水一样流的丰饶境况。这种传说——预言毫不奇怪，我们在我国的宗教性的农民暴动中都看见过。耶稣基督就是应这种预言出来担当弥赛亚任务的角色。基督这个

字，就是希腊字的弥赛亚。《新约》的四福音书，就是实在或想像中的一次民族起义流产，其领袖被捕处死的神话化了的记录（附带说说，当时罗马帝国处死叛乱分子，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挂起来，是一种极其通行的办法）。

这次民族起义失败了。可是起义的余党（即十二门徒）还在，他们继续宣传起义的纲领。而且因为起义的失败，是罗马统治者和当权的犹太教领袖合作的结果，继续宣传起义，其矛头也针对犹太教。不久，起义纲领中的反罗马成分全被抹掉，亦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只剩下反犹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一个新的教义系统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基督教。

6. 原始基督教的教义：

A. 耶稣复活和弥赛亚的千年王国　最初，新宗教的教义，着重在宣传耶稣这个弥赛亚，是上帝遣来的他的儿子，是神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死后第三天已经第一次复活，并向他们的门徒显现了。这还不过是序幕。不久，他还要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一切埋在地下的“义人”（也许是死难烈士吧）都要复活，于是要建立起一个“千年王国”。这个千年王国的最初的涵义，也许仍然是以色列人的王国，不过，不久，它的意思就完全变了。

B. 爱和传道　可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太强大，宣传斗争，号召斗争，那是以卵击石。运动需要坚持，需要召募皈依者，因此要宣扬爱。《新约》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已经在强调“爱你的邻人”，要在被压迫群众中扩大新宗教的信徒，更加需要强调爱。于是基督教比之犹太教，亦即《新约》比之《旧约》，强调爱，强调通过爱的精神来布道，来扩大信徒，而不是民族战神的宗教，不是征服之神的宗教了。

不过，“选民”的基本观念还在。现在，不再是老命题“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而是新命题：“信主的是上帝的选民。”

C. 消费共产主义　适应于第二条要求的原始基督教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共产主义的团体。凡“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教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为教徒办免费公共食堂。这一条要求如此之严，以致《新约》记载有富人的教徒卖掉家产，捐献教会，可是自己保留了一点，当使徒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这个教徒就扑地死了。

D. 原罪与救赎　当教义限于以上几条的时候，新宗教还只能是犹太人中间的宗教。《新约》记载，新宗教一开始确实只限在犹太人中；把教义和传教活动扩大到外邦人（犹太人对非犹太人们的称呼）中间去，并为此目的，改变了教义的主要内容，添上了原罪与救赎这一条的是圣保罗。

《新约》说，圣保罗原是顽固的犹太旧教徒，残酷的新宗教的迫害者。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从此皈依了新宗教。基督教义的制订者，事实上不是十二门徒，甚至也不是耶稣基督，而是这位圣保罗。J·大卫把他和摩西并列为基督教的二位启示者。

保罗把《旧约·创世记》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听信蛇的怂恿，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懂得赤身裸体的羞耻（事实上是和亚当性交并生下了孩子），这一段本来平淡无奇的传说，称做人的原罪。既然性交是罪恶，那么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因为人有罪，所以上帝罚男人要满面流汗挣面包，女人要蒙生育的痛苦传种接代。这是《旧约》的提法。这当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代一代活下来的。最可怕的是，原罪还使每一个人的灵魂堕落，死后也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

怜悯每个人都背上了这份原罪，于是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尘世，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为普世的凡人赎了罪。自此以后，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稣的道，他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教义。后代的传教士在布道中绘声绘色地宣扬主耶稣为了救赎世人的原罪而上十字架受难的故事，愚夫愚妇在下面听得涕泪交泗。也就这样，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的范围，传布到“外邦人”中间去。不久，犹太人还是犹太教徒，新宗教成了反对犹太人的非犹太宗教。原先的割礼、不吃猪肉等戒律一律废除，对外邦人无效，犹太人的基督徒还可照办；再过一些时候，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还必须禁绝犹太教的戒律，才准许皈依了。

E. 三位一体　犹太教只有一个耶和华，基督教增加了一个救主耶稣，据说他是上帝的独子。圣灵何能生子，马利亚是否处女怀孕，不仅外行人要问，基督教内为此还经历过长时期的教派斗争。现在，西方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这分明和希腊思想有关，下面再说吧。

7. 罗马帝国精神上的解体，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的异端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原因。

由上可见，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它怎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呢？

原因在于，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罗马没有哲学。假如说也有哲学的话，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现在，罗马把那时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征服的哲学没有用了。脑满肠肥的罗马显贵享乐已经享腻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心于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后，罗马帝国陷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于原来勇敢守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 Proletariat（最下等级）这一段经历，完全消失掉了。凡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后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后代，全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的、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为；有人看来，因为极度绝望而无复可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胫而走了。

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于罗马人，危机也比罗马人来得早。这个文明民族的文明人，在亚历山大征服时已经丧失了城邦的自由，不过还可以随军东征，在新建的希腊化诸帝国中当上一份知识分子当得了的差使。当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以后，有些“哲学家”被贩到罗马成了奴隶，在罗马显贵的宴会上说一些文法、逻辑、道德的箴言作为寻开心的资料，原来的希腊诸自由城邦当然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基督教的传布于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的

混合品。上面所说的，圣保罗的业绩，是《新约》这么记载的。也许，这里存在着某种确实历史的核心。即使如此，《新约》中圣保罗的许多哲学化的启示，也决不是一个粗鄙的犹太人所胡诌得出来的，他至少得到了许多希腊人信徒的帮忙，才写出了那些东西的。

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

〔附注：这一部分，可以参阅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叶启芳译，1955年三联书店就1932年神州国光社第一版修订再版。这本书译得很差，不过大致还可以读懂。〕

二、希腊思想

1. 希腊城邦。

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于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这个文明的一支，西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另一支东迁到中国，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于中国）。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航

海和手工业为生。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巴比伦、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人、“斯基泰”人、柏柏尔人等）。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的巴息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2. 思考宇宙问题，而不是“史官文化”。

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 宇宙是什么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是静止？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止。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也涉及到一切流变的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 数学神秘主义。

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书其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是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又，据说，后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

卡儿以前将近2000年。

4	3	8
9	5	1
2	7	6

C. 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专著。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

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法学中的名词 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后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 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而且，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中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

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于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于一个超人的力量，对于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没有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天那么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只能观察到他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么超脱尘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就是希腊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是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

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的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 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么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

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来克服［食欲和情欲］……［这种结局就是涅槃］。"（《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文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107页）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预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他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

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 30—40 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 上面扯得远了一些，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后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的第一个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去了。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兔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称之为自然界

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感到神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思想的基督教？

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1. 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罗马天主教的中心设在前帝国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国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纪，著名的哲学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现在国际通用的动植物学名，还是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英、德文，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罗马帝国覆灭了，世俗权威用蛮族的日耳曼文，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蛮族显贵，最初都是目不识丁的）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

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老文明的老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2. 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做过许多坏事情。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了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为实验科学的最早中心英国皇家学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是带着感情来鼓吹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他痛诋希腊思想以静观宇宙为极乐，痛诋他们不关心改进人们的工具以增进人类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

四、我不过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于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至于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句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原载《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